

第十期 200 年 月號

# 10

中國與社會主義（一）

打造第一個全球裝配線

三個中國兩次轉型（一）

香港今日有雷暴

送行散記

白色的青春，黑色的記憶（下）

定價 90元

【《弱勢群體之聲》第一集】

ISSN 1811-9344



9 771811 934006

# 第三屆 夏潮報導文藝營 2004

- I 活動時間：2004/8.27~2004/8.30
- 2 活動地點：天母農訓中心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七段113號
- 3 主辦單位：夏潮聯合會、人間學社、台灣立報社
- 4 協辦單位：傳記文學社、人間出版社
- 5 報名資格：大專院校在學學生、中小學教師或紀實文藝工作者
- 6 報名費用：學生 2000元、教師暨社會人士 3500元
- 7 招收名額：報導文學組50名 / 報導攝影組50名 額滿為止，錄取先後以繳費為準
- 8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8月20日截止
- 9 繳費方式：郵政劃撥戶名：夏潮聯合會 / 帳號：19639094
- IO 召集人：陳映真
- II 營長：藍博洲
- I2 駐營作家：報導文學組：汪立峽、范振國、林深靖  
報導攝影組：李文吉、黃志翔、吳德淳
- I3 講師：報導文學：陳映真、鍾喬、成露茜、藍博洲、鄭鴻生、楊渡、楊祖珺  
報導攝影：郭力昕、鍾俊陞、黃子明、蔡明德、莊正原、張照堂、關曉榮  
紀錄電影：井迎瑞

【課程內容】

【報名表】

[http://www.xiachao.org.tw/i\\_signup.asp?type=out&classified=41&SignUpForm=no](http://www.xiachao.org.tw/i_signup.asp?type=out&classified=41&SignUpForm=no)

夏潮聯合會 Chinatide Association

Tel: (02)2375-9558 / Fax: (02)2735-9035 / E-Mail: xiachao@giga.net.tw

>> 社會主義探索

01 中國與社會主義 (一)

市場改革與階級鬥爭

著■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

譯■陳筱琳

>> 全球化批判

12 打造第一個全球裝配線

台灣通用器材1964-1990

■陳信行

>> 大陸思潮

26 三個中國兩次轉型 (一)

——前言

■祝東力

>> 香港觀察

31 香港今日有雷暴

■周良沛

>> 歷史檔案

46 送行散記

■袁庚華

52 白色的青春，黑色的記憶 (下)

一個與台大青年有關的

「二二八」往事與「白色恐怖」的回憶

■陳英泰

>> 文化廣場

63 【《弱勢群體之聲》第一集】

\* 父親的腎，  
小東的大學

■浪淘沙

歡迎捐款贊助 電話：02-2911-19803670  
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                               |             |           |
|-------------------------------|-------------|-----------|
| 零售                            | 90元 / 本     |           |
| 訂閱                            | 台灣地區 (一般訂戶) | 一年 1,000元 |
|                               | (榮譽訂戶)      | 5,000元    |
|                               | 歐美地區        | 一年 50美元   |
|                               | 大陸、港、澳地區    | 一年 40美元   |
|                               | 亞洲地區        | 一年 45美元   |
| 【美金支票請寫明 Pay to Huang Te-Pei】 |             |           |

發行人 范振國  
社長 黃德北  
總編輯 杜繼平  
執行編輯 陳乃慈 宋文揚

發行所 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社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284巷12號  
編輯部 台北縣新店市德正街19弄60號3樓  
電話 (02) 8914-7520  
傳真 (02) 8914-7720  
電子信箱 or117199@y3r00.com.tw

北市建商商號092字第255100號

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制度究竟是官方所宣稱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大陸經濟改革的目的到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還是復辟資本主義？多年來在中國內部與國際政治、學術界迭有爭論。美國左翼理論刊物《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今年的七、八月合刊本刊載了精研東亞經濟的馬克思主義學者Martin Hart-Landsberg與Paul Burkett全面評述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長文。文中批判了新自由主義、市場社會主義、國家中心論等左右各派學者對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錯誤認識，並期望通過釐清理論與分析上的混亂，探索邁向社會主義之道。全文論證嚴謹，批判深刻，頗有洞見，值得關心中國與社會主義前途者細讀。本刊自本期起將分三期連載譯文。【編者】

# 中國與社會主義 (一)

## 市場改革與階級鬥爭

著■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 / 譯■陳筱琳

### 前言

中國的經濟經驗至今依然對困難重重的社會主義建設有足多可供借鑒之處。然而，當前的經驗大體上是反面教材。不幸的是，中國政府的「市場改革」規劃本說是要為社會主義恢復生機活力，卻使國家墜向越來越資本主義化、也越來越受外國支配的道路，對國內與國際都造成了龐大的社會成本。更加不幸的是，許多進步份子（包括許多仍支持社會主義的人）依舊為中國的經濟政策辯護，並鼓勵其他國家採納類似的政策。

我們認為，這種情況反映了大多數人對資本主義的動力和社會主義嚴重的認識不清。如果我們要在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上有長足的進展，就必須釐清這種混亂的思想。我們誠摯地希望這份對中國「市場社會主義」經驗的研

究能對此做出雖小但有意義的貢獻。

許多人士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經驗，包括中國在意識形態和經濟上對當前世界的重要性。我們特別要感謝Mike Lebowitz, Barbara Foley, Leo Panitch, Sam Ginden, Patrick Bond, 李明騏, Andong Zhu, David Kotz, Victor Wallis, Susan Williams, Stephen Frost, and Tim Pringle。我們尤其要感謝Kor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編委們刊登了我們先前的一篇文章，其中包括了這本書的一些主要觀點的早期版本。謝謝Aimin Chen提供了我們《中國統計年報》的資料，以及Andrew Nash和每月評論出版社的全體工作人員提供的協助與鼓勵。我們也感謝我們的家人——Sylvia Hart-Landsberg, Leah Hart-Landsberg, Rose Hart-Landsberg 以及

Suzanne Carter, Patrick Burkett和Molly Burkett。最後，我們要對中國的勞動人民謹申謝忱，不僅是由於他們過去為改造社會所付出的心血，也由於他們持續不懈地反對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資本主義，為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 緒論：中國與社會主義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建立之後的三十年中，中國與社會主義這兩個詞看來彷彿會永遠相連，成為一個鼓舞人心的統一體。中國在1840-42年與英國的鴉片戰爭中被迫蒙受戰敗的恥辱，從此承受著不斷擴張的租借條約港體制的禍害。中國人民不只為帝王及之後的一連串軍閥暴政統治所苦，更遭到把中國瓜分為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荼毒蹂躪。漸漸地，從1920年代開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組織蜂起的廣大人民抵抗外國的宰制與剝削，並對抗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最終在1949年取得勝利，黨宣示它不僅要終止人民的苦難，更要建設社會主義，讓人民當家作主。

無庸置疑，中國革命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壯舉，革命後的數十年中，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達成了不少重大的成就。然而，我們認為，這不應該讓我們忽略三個重要的事實：第一，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中國人民還遠未實現社會主義的希望；第二，從1978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進行以市場為基礎的改革，改革據稱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事實上卻導向相反的方向，使得中國人民付出了沈重的代價；最後，世界各地的許多進步人士仍支持中國的改革，並從中國的發展中汲取教益，對中國出口導向的快速經濟增長，他們有的認為這證實了市場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有的則認為，不管是什麼性質的國家，國家政權積極指導經濟能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獲致成功

的發展。

雖然我們過去也曾深受中國革命的鼓舞，但好一陣子以來，我們一直都認為，進步人士這樣繼續支持中國與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嚴重誤解了中國的改革經驗，更重要的是，這會大大妨礙真正推進中國與其他地區的社會主義所必要的理論與實際的認識的發展。

如我們在本書中所要論證的，我們認為，中國的市場改革並不通往社會主義的復興，而是通往徹底的資本主義復辟，包括日益嚴重的外國經濟控制。重要的是，這個後果並不僅僅根源於單純的貪婪和階級利益。只要一往市場改革的道路啟程，改革過程中一個接一個的每個步驟主要是由改革本身所造成的緊張與矛盾驅動。中央計畫的削弱導致更加依賴市場與利潤刺激，這又接著鼓勵給予私有企業優於國有企業各種特權特惠，也日益給予外國企業與市場高於本國企業的優惠。正確理解中國改革過程的動力可支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市場社會主義無法穩定成形。然而，由於許多進步人士大多仍然認為中國在某種意義上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往往未能具有這個洞見。這種狀況無可避免地導致對社會主義的意義認識不清，從而強化了反社會主義者的意識型態觀點。

另外許多進步的學者與運動者認為，討論社會主義的意義與世界各地人民所面對的發展難題毫無關連。他們從中國的持續高速出口增長的紀錄總結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的典範，其經濟增長的戰略可以也應該讓其他國家效法。我們認為，並在本書中論證，這種對中國的禮讚是一個嚴重錯誤，不僅反映了對中國經驗的誤解，也反映了對作為國際體系的資本主義的動力與矛盾的誤解。事實上，檢視中國的經濟轉型對該地區的其他經濟體的影響，就可以明白，中國的經濟增長強化了競爭壓力與危機趨勢，危害了該地區各地的工人，包括中國的工人。

要不是我們在2003年5月到古巴參加一個國際馬克思主義研討會（註一），我們對左派與進步人士的不同意見或許永遠不會形成一本書。在古巴時，我們希望能夠學習到古巴如何因應它所面對的經濟困難，以及該國政府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與堅持如何形成其因應之道。我們一再聽說，許多古巴經濟學家將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增長戰略視為一個可以為古巴採用的誘人典範。

我們曾經希望這不是事實。但是，在研討會上，論及古巴面臨的難題時，幾位古巴經濟學家公開支持中國以外國直接投資（FDI）為基礎的出口導向的快速增長經驗，視之為古巴在當前國際形勢下維繫其社會主義規畫的唯一希望。雖然這幾位經濟學家不過是在重複我們從其他國家的進步人士口中聽過的論點，但是，這些說法出現在一個討論馬克思主義對當代的重要性的會議上，而且這些經濟學家在彼時彼地發此言論也得不到什麼好處，聽來格外令人難受。菲德爾·卡斯特羅（古巴總統）也在會議上，而古巴政府已經堅決拒絕了市場社會主義。

我們當然不是首批以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批判中國發展的社會科學家。（註二）不過，我們清楚瞭解到中國對決定關於社會主義與發展的辯論正日益重要。而且，我們認為，對於中國改革後經驗的認識不清，標示了更深層次的對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理論與政治的淆惑不明，嚴重傷害我們爭取將世界從異化、壓迫與剝削解放出來的集體事業。因而，我們冒昧提出我們對中國與社會主義的研究成果，我們的批判集中在中國市場改革過程的經濟動力、社會後果與政治影響。雖然我們的作品聚焦在中國問題上，我們的希望和意圖是讓我們在此提出並探索的課題對中國以外的國家中關心社會發展與鬥爭的人們也具有重要性。

註一：The "Conference on the Work of Karl Marx and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 held in Havana, Cuba, May 5-8, 2003. Paper can be found at [www.nodo50.org/cubasigloXXI](http://www.nodo50.org/cubasigloXXI).

註二：See, for example, William Hinton,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Maurice Mei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 Robert Weil, *Red Cat, White Cat: China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6); Gerard Greenfield and Apo Leong, "China's Communist Capitalism: The Real World of Market Socialism" in Leo Panitch (ed.), *Socialist Register 1997: Ruthless Criticism of All That Exist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7); Barbara Foley, "From Situational Dialectics to Pseudo-Dialectics: Mao, Jiang, and Capitalist Transition," *Cultural Logic* (2002), <http://eserver.org/clogic/2002>; Liu Yuf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China'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Links*, no.21 (May-August 2002); Richard Sm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China's Environment," *New Left Review* 222 (March-April 1997); Eva Cheng, "China: I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evitable?," *Link11* (January-April 1999).

## 第一章 中國如何發展至典範的地位

中國改革後的快速經濟增長使許多進步人士認為，中國的經驗證明在既存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裡另有可行的經濟增長之道，中國堪為一個發展典範。有意思的是，雖然這些進步人士大部分大都不願意承認，但許多主流的經濟學家也同樣認為中國是個發展典範。

中國增長的經驗之所以獲得讚頌的基本事實是廣為人知的：高速的經濟擴張、快速上升的外銷、以及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表一與表二提供了這些趨勢的一些指標。根據官方資料，中國不但在1985至1995年的大部分期間享有兩位數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率，同時在1997-98的東亞危機當中和之後也維持超過7%的年增長率。出口在擴張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從它高度的增長率和它對GDP之比口

表一：中國實際GDP與出口指標

|      | 年均GDP實際<br>增長率 (%) | 年均出口<br>增長率 (%) | 出口 / GDP<br>之比% |
|------|--------------------|-----------------|-----------------|
| 1985 | 13.5               | 4.6             | 9.0             |
| 1986 | 8.9                | 11.5            | 10.5            |
| 1987 | 11.6               | 27.5            | 12.3            |
| 1988 | 11.3               | 20.5            | 11.8            |
| 1989 | 4.1                | 10.6            | 11.7            |
| 1990 | 3.8                | 18.2            | 16.0            |
| 1991 | 9.2                | 5.7             | 17.7            |
| 1992 | 14.2               | 18.2            | 17.6            |
| 1993 | 13.5               | 8.0             | 15.3            |
| 1994 | 12.6               | 31.9            | 22.3            |
| 1995 | 10.5               | 23.0            | 21.2            |
| 1996 | 9.6                | 1.5             | 18.5            |
| 1997 | 8.8                | 21.0            | 20.4            |
| 1998 | 7.8                | 0.5             | 19.4            |
| 1999 | 7.1                | 6.1             | 19.7            |
| 2000 | 8.0                | 27.8            | 23.1            |
| 2001 | 7.3                | 6.8             | 23.0            |
| 2002 | 8.0                | 22.1            | 26.2            |

\*\$US. FOB.

來源：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2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2, <http://www.adb.org>, and Asian Recovery Information Center Indicators, 2003, <http://aric.adb.org>.

益增加顯然可見。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UNCTAD) 的數據顯示，2000年，中國出口佔全球6.1%，緊迫在美國、德國和日本之後，位居全球第四大出口國。在1985至2000年期間中國的出口增長居全球之冠，比第二位的美國高出兩倍多。(註一)

外國直接投資 (FDI) 流入中國的淨值也暴增，從1985年的10億美金到2002年超過500億，佔此時期全國資本投入的一個重要部分。「即使在2001及2002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流量分別降低約1/2和1/3時，流入中國的

表二：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 (FDI) 指標

|      | FDI (美元) | FDI年均<br>增長率% | FDI / 總<br>投資% |
|------|----------|---------------|----------------|
| 1985 | 1.03     | -8.4          | 1.1            |
| 1986 | 1.43     | 38.3          | 1.6            |
| 1987 | 1.67     | 17.1          | 1.7            |
| 1988 | 2.34     | 40.4          | 1.9            |
| 1989 | 2.61     | 11.5          | 2.3            |
| 1990 | 3.49     | 33.7          | 3.5            |
| 1991 | 4.37     | 25.2          | 3.9            |
| 1992 | 11.01    | 151.9         | 7.3            |
| 1993 | 27.52    | 150.0         | 12.3           |
| 1994 | 33.77    | 22.7          | 17.3           |
| 1995 | 37.52    | 11.1          | 15.4           |
| 1996 | 41.73    | 11.2          | 14.9           |
| 1997 | 45.28    | 8.5           | 14.9           |
| 1998 | 45.46    | 0.4           | 13.6           |
| 1999 | 40.29    | -11.4         | 11.3           |
| 2000 | 40.80    | 1.3           | 10.4           |
| 2001 | 46.77    | 14.6          | 10.5           |
| 2002 | 52.77    | 12.8          | 10.4           |

註：FDI根據收支平衡帳的詳值計算，總投資是固定資本形成的總額。

來源：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2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2, and Key Indicators 2003, [www.adb.org](http://www.adb.org).

投資仍然持續擴大。」數量多到去年中國成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首要目的國。」(註二)

然而，這些只是表面看到的事實，這些事實並不能說明為何從左派到右派的發展經濟學家都據此而共同稱許中國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本書的以下幾章將著力於批判對中國經驗的這種觀點，但重要的是，我們先須探討產生這種觀點的變遷中的全球歷史脈絡。這樣才能夠幫助我們釐清許多理論和政治上的混淆，並搞清楚我們推進社會主義事業所必須克服的難題。

## 中國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1989年後蘇聯解體，前蘇維埃共和國和東歐的前蘇維埃衛星國又採納了新自由主義政策，起初令新自由主義圈子瀟灑洋洋自得的勝利氛圍。這些前「社會主義」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的建議與支持下，快速終止計畫經濟、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並開放進口市場和外國投資，似乎驗證了新自由主義「歷史終結」的想法。不幸的是，這些「休克療法」造成了重大的經濟崩潰（特別是在俄羅斯），時至今日東歐的工人還深受其害。這些挫敗對主流的經濟發展思想產生了兩個作用。

第一、它們激起了關於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適當步調、次序和制度要件的辯論。（註三）保守的新自由主義者，例如 Jeffrey Sachs，將休克療法的災難後果怪罪於政府的腐敗和對改革的決心不夠。而新自由主義者的左翼，譬如 Joseph Stiglitz，則質疑立即全盤自由化和私有化是不智的。後者推薦一個較為審慎的改革計畫，主張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和信心應優先於貿然的貿易自由化和短期的資本流入。

然而，儘管有這些不同，這兩派新自由主義者同樣忠於競爭的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和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些終極目標。因此，兩者都視出口競爭和吸引FDI為成功發展的關鍵。就這點來說，主流派在發生休克療法的災難之後，對經濟發展問題的辯論實際上釐清了新自由主義共識的核心要素。

第二、在新自由資本主義之外「別無出路」（TINA）的思維持續當道下，後蘇維埃國家轉向自由經濟的失利促使新自由主義者去尋找新的成功故事，以樹立可讓其他國家效法的榜樣。從過去他們想利用南韓作為自由市場的樣板國家（儘管南韓的貿易與FDI顯然並不是採取漸進或他種自由市場的政策），可以明顯看出這種策略是出於投機心態。問題是當時沒有其他顯著的資本主義發展成功的案

例可用（註四），因此，在1990年代早期，當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主要靠外國直接投資和製造業出口而獲致快速的經濟成長時，南韓馬上失去樣板國家的地位，由這些新興的跨國資本的輸出平台取而代之。之後，東亞危機發生了，於是又需要尋找新的樣板國家。拿中國作為典範既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保守派及其左翼在策略上的歧見，也反映了兩者的根本共識。（註五）

保守派新自由主義者對東亞債務危機的反應完全是一副投機嘴臉。他們唾棄這些陷於危機的國家——就在幾週甚或數日前還被讚許為自由市場的成功故事——認為他們是腐敗透頂的「戚友特權的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t）體制，亟需改造成全盤的自由市場。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深陷危機的政府聽從了他們的建議，在蕭條並債務累累的經濟體中實施了貶值、金融財政緊縮和引起混亂的私有化計畫。一直要到類似後蘇維埃休克療法的災難儼然成形時，他們才稍稍收手（而大部分有厚利可圖的東亞企業卻被外國投資者給收購了）。

同時，為了保衛他們政策的利益，新自由主義的保守派將注意力轉移至墨西哥。在1990年初期，他們曾建議墨西哥向東亞學習，墨國稍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失敗也被他們怪罪於腐敗和戚友特權成風。然而，墨西哥在1996和2000年期間還是維持了經濟的正成長。更重要的是，墨西哥是透過開放外國直接投資和貿易、壓制工人的工資要求並一將國有企業與銀行私有化，把經濟改造為製造業的出口平台，才有持續的經濟增長。這樣，墨西哥變成了新的樣板國家，而且，比東亞更被看好。

可是墨西哥乍得的聲譽不過是曇花一現。在2001年墨國陷入了衰退，很大程度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它大為依賴出口到今日已陷入衰退的美國。然而，即使美國開始了微弱的復甦，墨西哥卻繼續停滯，因為越來越多的國外



出口製造商開始移往工資低得多的中國生產(註六)。保守派自由主義者最先的反應是譴責墨西哥腐敗，對成本效益和自由市場的改革也不夠盡心。然後，他們開始引用中國可觀的經濟記錄做為新自由主義(尤其是「毫不動搖的堅持改革」)的威力的證明(註七)。世界銀行表示，如果中國成功而墨西哥失敗，那是因為前者更有效地「從一個不友善的投資環境自我轉型」、更堅決地「在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擁抱全球化。」(註八)

新自由主義的左翼對東亞危機有不同的反應：他們怪罪於過早放寬國內金融和(尤其是)短期的境外資本流動的管制。Joseph Stiglitz和其他人也批評IMF和東亞政府所實施的緊縮的宏觀政策(尤其是高利率)、匯率調降，以及躁進的私有化和放鬆管制。他們認為這些只會加深這個地區的衰退，使得國內和區域的金融體系更為不穩定，進一步削弱企業的信心。

新自由主義的左翼批評這些對策是正確的，即使他們對危機本身的原因的分析極為膚淺——他們忽略了許多關鍵因素，諸如競相爭取FDI、以外商為基礎的出口生產大量增加進口、區域和全球的生產過剩，還有與這些及其他的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的矛盾有關的資本市場自由化(註九)。不過，對我們目前的課題來說，左翼新自由主義者對危機的分析的重要之處是，它也導向對於中國的正面描繪。而這種描繪與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教義並無根本的歧異，此即「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極有可能使窮人受益。」(註十)

Stiglitz因此提出中國政權對資本的管制及擴張的宏觀政策來解釋中國得以免除東亞危機的最壞影響。(註十一)以此為根據，他推而廣之把中國描繪為「一個成功整合進全球市場的典範——但卻是用不遵照華盛頓共識的陳腐見解的方式達成的。」(註十二)根據這個分析，「中國採取私有化和減少貿易障礙不過是

以防止社會結構在這過程中裂解的漸進方式實行的。在幾乎不受IMF的指導下，中國達到高增長率同時減少了貧窮。」(註十三)不同於俄羅斯休克療法的經驗，Stiglitz說：

「中國將創造競爭力、新企業和工作等置於私有化和改造既有企業之前。中國瞭解宏觀穩定的重要性，從來沒有混淆目的和手段，也沒有過度對抗通貨膨脹。它瞭解到如果要維持社會穩定，必須防止大規模的失業，創造工作機會必須與企業改造同時並進。中國的自由化是漸進的，並且確保將被置換的資源重新配置到更有效的用途上，不任其荒廢閒置。」(註十四)

事實上，Stiglitz「1998年在北京的談話，稱中國是目前為止，低收入國家邁向市場經濟最為成功的。」(註十五)

這樣把中國經濟描述成順利而低成本的市場化是片面的理想化的說法。然而，它可以讓Stiglitz和其他的左翼新自由主義者振振有詞地主張在短、中期實行不完全受制於市場的自主政策，卻仍然欠言忠於把市場、自由貿易和FDI(簡言之，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的分工)作為經濟發展的唯一可行之道的信念。Nicholas Lardy對新自由主義共有的這種核心觀點在中國的應用作了有用的概括：

「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持續強勁看好。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前二十多年經改的積累結果。最重要的是，價格自由化逐漸進展至今，幾乎所有商品都已經由市場來制訂價格。同樣重要的是，改革大大加劇了競爭，不但是製造業，而且在建築業，以及服務部門的許多部分的競爭都加強了。價格普遍由市場決定和競爭性的市場改善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外貿部門在加強國內市場競爭的作用特別重要，但往往被低估了。」(註十六)

這就是中國作為(至少到目前為止)首屈一指的新自由主義樣板國家的形象。

## 中國作為進步的典範

由於號稱社會主義經濟體的前蘇聯和東歐解體，使得許多左派處於招架無力的守勢。自然地，左派經濟學家開始對中國感到興趣，雖然其原因（至少就表面來看）與新自由主義是逕相對立的。俄羅斯式的「休克療法」在意識形態和結構上都有急遽的轉型，中國與之迥然不同，政府依舊宣稱盡心建設社會主義。此外，中國較為漸進的改革政策也造就了快速而且持續的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改革採取中央放權和市場導向的特色更加吸引了許多左派，特別是在學術圈裡面。主流經濟學家一直認為中央計畫和國有制是沒效率的，東歐政府放棄社會主義而擁抱資本主義似乎又證明了這個觀點的正確性。對許多左派來說，中國的改革規劃一開始似乎在資本主義和中央集權的國家社會主義之間提供了「第三條路」。國家雖然繼續維持它在國有企業裡的核心角色，卻減少經濟的中央計畫，強化地方政府的權力，創造了新型態的企業組織（包括了小私有企業以及集體的鄉鎮企業），並且提倡根據利潤與生產力分發工資、加強市場關係以刺激所有企業（包括仍佔主導地位的國有部門）的效率。這些「市場社會主義」政策似乎得以免於一般對中央計畫的批評，同時在日趨由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學術界裡，這些政策也比較容易用主流的市場分析的論述來辯解。

在1990年初期，許多進步人士和左派學者在他們的著作裡，即使對未來抱持謹慎態度，大部分基於中國強勁的經濟表現已經顯示其對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行性甚至優越性的堅定信念。譬如M. J. Gordon就說：

「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經驗顯示了可稱之具有『市場社會主義』特色的政策提供了一個可行和成功的出路……雖然這些改革可能不是在他處該被完全照搬的模式，它們說明了一條中間道路是可行的。」（註十七）

同樣地，Victor Lippit也以中國經驗來質疑「冷戰已經結束而資本主義大獲全勝」的想法：

中國的經濟成功迫使我們更仔細地思量廣為流傳的社會主義終結論。中國的公共政策是為了建立一個市場社會主義的體制，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和私有企業在其間可以並存。如果這種混合的生產方式可以維持下來，如果對國家經濟和政治生活的人民／民主控制可以建立起來，那麼很有可能目前就是社會主義轉型的時期。如果相反地，資本主義企業凌駕國有和集體企業，資本主義轉型就排上了日程。重點是，鹿死誰手，尚未得知。既然社會主義發展的可能性還在，考量中國的案例可以在思考所謂資本主義已然勝利之說時，提供一個全新的觀點。」（註十八）

總之，中國市場社會主義改革的表面成功不但給了許多左派新的希望，認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不是真正的歷史終點，它在重新詮釋全球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時，也提供了正面的參照點。（註十九）

從分析和意識形態上，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產生共鳴的，不僅是學術圈，在一些僅存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中，對中國模式的興趣也很濃厚，特別是越南和古巴。畢竟，蘇維埃體制崩潰之後，古巴遭受了嚴重的經濟震撼。它亟需能夠創造外匯收入來彌補在市場和國外援助上的損失的新策略。

古巴政府以及古巴經濟學家們很自然地心儀中國的持續經濟成長，更驚訝於中國日益成功地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並製造工業品外銷。在初步研究之後，菲德爾·卡斯特羅在1995年訪問了中國與越南，古巴政府並制訂了一個深受中國經驗影響的古巴經濟重整計畫草案。（註二十）雖然古巴政府後來宣布不會追隨中國和越南走上市場社會主義，古巴經濟學家們繼續

仰慕中國得以「整合進全球製造業生產和貿易的網絡」，一位古巴經濟學家稱這樣的整合為「今日發展的必由之路」。（註二十一）

事實上，許多古巴經濟學家依然持續呼籲採取一整套政府政策來幫助古巴吸引與全球生產網絡相連結的更複雜的製造加工業，以作為觀光和其他當前的外匯來源的補充。（註二十二）雖然這些經濟學家堅決否認，但是這個論點明顯地是要求古巴採納一個外銷導向、外國驅動的增長策略。這個策略將要求增強市場力量、創造一個混合型經濟、以及放鬆國有企業的中央管制——這些顯然都受到中國模式的強烈影響。

中國的改革過程以削弱社會主義為代價而強化了市場力量與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古巴政府不願表態正式承認中國是個典範是可理解的。（註二十三）更廣泛地來看，在整個1990年代，當改革的後果愈來愈明顯時，認為中國正在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左翼人士減少了。但是，這個趨勢並沒有嚴重動搖較廣泛的進步圈子，他們仍然視中國為經濟發展政策的正面模式。

視中國為典範的想法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證據已然確鑿之下，仍能不為所動，是中國外銷與增長的成功及左翼的幾個歷史—知識傾向相結合的結果。在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曾分析先前資本主義勃發之際竄升的新興國家與區域中心，但一些依舊公開主張社會主義的人士，即使承認中國已經偏離社會主義，也鮮少分析中國的轉型對於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不均衡發展與更迭有何影響。（註二十四）

這種大規模、結構性的戰略—歷史性論述在1989年之後發展出來的「歷史的終結」氣氛之中已經不流行了，尤其是在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院化相聯繫的後現代思潮興起的影響下。因而，許多社會主義者認為，我們在發展理論與政策分析上，所能望者最多不過是反對

新自由主義、主張政治民主的防衛性鬥爭，而不是對資本主義的正面攻擊。這種觀點固然不必然導致對中國模式的全面支持，卻易流於不對中國的發展戰略提出整體批評，也不設想非資本主義的出路。

同時，另外許多進步人士已經對（蘇聯崩潰之前與之後）的官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徹底失望與疏離。這個群體非常自覺地希望從東亞找到一種社會經濟模型以用來對抗新自由主義並另尋出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日本是最受青睞的典範。進步人士拿日本的國家強力干預、號稱和諧的職場社會關係、充分就業、相對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優越的外銷成績常做證據，來主張日本的體制比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式資本主義對工人更友善，而且更有效率。在這種「進步性競爭」的觀點中，日本經驗顯示，為了人道和經濟的理由，一個關注社會的國家與大公司體制的資本主義是可以而且應該追求的。（註二十五）

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日本經濟顯然進入了長期的停滯。進步性競爭的擁護者逐漸轉移目光到南韓，並偶而關注一些新興東南亞外銷平台，尤其是泰國和馬來西亞。之後，1997-98年的危機來臨，這些國家陷入了困局。對這種進步觀點造成更大挫傷的或許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本國危機的對策是，大體接受新自由主義對危機的解釋，並採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

許多進步派被迫尋找另類模型，他們既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工具，也沒有階級政治的觀點（必須要有這種觀點才會從工人—社區對抗全球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立場出發去尋找替代模式），這些進步派自然被吸引到中國模式。中國日益遵循類似當年東亞成功故事中的增長模式，但是，與那些國家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中國拒搞魯莽滅裂的自由化，因而安然渡過了區域性危機，只經歷了些微的動盪。

事實上，這些進步派用來合理化他們仰慕中國體制的論點和新自由主義左翼非常類似，這也說明了為什麼Joseph Stiglitz的著作在左派中日益受歡迎。和Stiglitz一樣，這些進步派把中國的持續經濟成功歸功於它在貿易與財政金融上較有控制的自由化。同時，與Stiglitz一樣，他們稱許中國依賴外國直接投資，而非（中國政府依舊嚴密管制的）不穩定的短期資本流入。他們也都同意，要不是中國實行了抵制貨幣貶值的關鍵決策，東亞危機會更糟糕得多。

就這樣，進步派試圖利用左翼新自由主義者的分析來重申一些他們早期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進步性競爭論點。中國快速地增長，而且至少在口頭上還承諾堅守一個社會化的（國有和集體）經濟部門與計畫。但是，中國也已經放棄了中央管制並增強了市場的力量，甚至成為全球頂尖的外銷國並吸引了大量的生產性外國直接投資。

一大批的進步/左翼力量因此轉而為中國經驗背書，不太在意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一些學者甚至把他們對中國現行的經濟活力的讚賞延伸到遍佈整個「大中華經濟圈」的華僑商業網絡。（註二十六）中國革命遺產的意義大多被貶低，只著眼在它創造出強有力的國家機器與其他條件，使中國的經濟蒸蒸日上，富有競爭力的作用，而不注重它賦予勞動人民與社區權力的潛能。中國過去在財富和收入分配以及大眾生活水平等領域的成就會被提到，多半是用來鬆散地連接到中國如何能成功地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例如，Walden Bello寫道：

「中國的經濟活力與一件我們在南半球的人民往往忽視的事情是分不開的：19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的一場社會革命消滅了土地與收入最不平等的分配，1970年代晚期市場改革被引進農業部門時，這場革命就為中國做好了經

濟起飛的準備。……同樣，中國也強調堅決從外國投資者手中奪回國家經濟控制權的解放運動，對未來的經濟發展所作的關鍵性貢獻。中國是一個強國，從革命中產生，並在數十年的熱戰與冷戰中淬練成鋼。……中國與大多數南方國家極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同外國資本之間的關係。北京面對外國投資者時非常強硬，而且在他與國際企業界的關係中佔上風。然而，外國投資者仍然爭相湧進中國，無視各種管制。……尊重是中國政府從外國投資者得到的待遇，也是我們的政府無法得到的。在國家經濟利益的問題上，中國與我們這些國家的差別在於一個成功的革命民族主義鬥爭已經建構成為一個明智的政府。」（註二十七）

以這種方式，進步性競爭思想把社會主義與革命從人類發展與解放的工具轉化為資本主義發展與競爭力的前提。擁抱這種觀點的人士往往忽視的一個事實是：外國投資者之所以會尊重中國政府、願意忍受對FDI的種種限制，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政府願意提供大量便宜又高生產力的勞動力。換句話說，強調中國革命後的成就同其當前的資本主義成功之間的表面聯繫，轉移了注意力，使人看不到這種成功的前提：一個愈來愈無保障的勞動隊伍，其自我組織的努力不斷被全球最威權的國家政權之一所壓制。

### 在中國問題上的思想混亂

進步派和新自由主義者共同擁抱中國顯示了後冷戰時代存在的分析與意識形態上的混亂。不幸的是，在回應資本主義的矛盾之際，一忽兒吹捧這個樣板國家，一忽兒又吹捧另一個樣板國家，對左派的傷害往往遠大於主流的分析家和決策者。一般的理由是，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力量握有權勢，可以主導對事件的詮釋，從而控制意識形態的衝突。

更具體的原因是，一個又一個地追尋國家

典範易於使人誤以為根據個別國家的資本主義增長經驗可以建立起進步的政策綱領。正如馬克思、列寧與托洛斯基所認知的，問題在於如果不從更廣闊的區域與全球層次考察資本主義的動態變化與矛盾，就無法理解個別國家的成功故事。在資本主義的不均衡發展與危機之下，國家典範式的思維很快就導致一個接一個無休止地追尋成功的故事，而這些故事一個比一個更成問題。最終結果是，我們完全喪失了另類的視野、失去了理論的清晰度，也無法得到基層民眾的政治共鳴。

我們之前對中國上升到典範地位的描繪主要集中在新自由主義和進步人士圈子內的大略傾向。實際上，不管在左翼或右翼當然都不存在對中國問題完全一致的共識。然而，聚訟紛紜對進步派的損害往往比對新自由主義者還大。

新自由主義者常常對某個國家在自由市場改革上的進展程度有著不同意見（對一些人來說，再怎麼解除管制和私有化都嫌不夠徹底），但萬一他們當前的樣板國家陷入始料未及的危機，他們的分歧就會極便於新自由主義見風轉舵。雖然他們現在奉中國為典範，但也不難找到一些新自由主義者的警告：如果改革過程未竟全功，貪污腐敗不根除，未來可能有挫敗。同時，新自由主義者現在用中國的改

革經驗來批評古巴不將其經濟更徹底地市場化。（註二十八）如果中國的狀況惡化了，他們總是能找到另一個自由市場的成功故事以用於與古巴和其他「落後」國家對比。

然而，對有志於推動徹底變革、建立一個以工人—社區為中心的經濟體制的人們來說，分析上的歧見往往涉及集體價值觀、遠景和策略的不同認知，這些不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是不可能輕易扭轉的。畢竟，對進步人士來說，不可或缺的是用清晰而一致的價值觀、遠景和策略鞏固起來的運動。但是，維護現狀者卻恰恰相反。對護衛現狀者來說，群眾在政治上渙散是一個正面價值，而成功的典範很快速地一個換過一個所造成的思想混亂只會更促使民眾中心無主、渙散無力。

總結來說，我們不僅不同意那些把中國視為發展典範（不管是不是社會主義）的進步人士，我們還認為他們推導出這個立場的過程凸顯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進步圈子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拒絕。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既是理解資本主義，也是建設足以超越資本主義的運動的最有效的框架。因此，本書對中國的探討遠不只是關於一個國家的經驗的學術辯論，而是為了發展可以幫助我們改造世界的清晰理論和戰略觀點。◎

譯自：《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2004年，7-8號。

## 註釋

註一：1.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2 :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New York : United Nations, 2002).

註二：Nicholas R. Lardy,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 Threat or Opportunity?," Economic Commentar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August 1, 2003, p. 1.

註三：Ronald I. McKinnon, The 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2nd ed.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四：Martin Hart-Landsberg, The Rush to Development :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Struggle in South Korea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3).

註五：Paul Burkett and Martin Hart-Landsberg, Development,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 Learning

from Japan and East Asia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93).

註六 : Martin Hart-Landsberg, "Challenging Neoliberal Myths : A Critical Look at the Mexican Experience," *Monthly Review* 54, no.7 (December 2002).

註七 : Stephen Roach, "The Hypocrisy of Bashing China," *Financial Times*, August 7, 2003.

註八 : Shang-Jin Wei, "Is Globalization Good for the Poor in China ?"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39, no.3 (2002) :27.

註九 : Burkett and Martin Hart-Landsberg, *Development,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chap. 11-12.

註十 : Eyal Press, "Rebel with a Cause : The Re-Education of Joseph Stiglitz," *The Nation*, June 10, 2002, 13.

註十一 :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 Norton, 2002), 125-26.

註十二 : Press, "Rebal with a Cause : The Re-Education of Joseph Stiglitz," 13.

註十三 : Ibid., 13-14.

註十四 :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84.

註十五 : Vanessa Lau, "Forgotten Generation," *Dollars and Sense* (March-April 2000), 11.

註十六 : Lardy,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2.

註十七 : M. J. Gordon, "China's Path to Market Socialism," *Challenge* 35,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2): 53.

註十八 : Victor D. Lippit, "But What About China?," *Rethinking Marxism* 6, no.1 (Spring 1993): 128-29.

註十九 : John E. Roemer, "Can There be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in *Market Socialism : The Current Debate*, ed. Pranab K. Bardhan and John E. Roemer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John E. Roemer, *A Future for Socialism* (London : Verso, 1994); Paul Bowles and Xiao-yuan Dong, "Current Success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New Left Review*, no. 208 (November-December 1994).

註二十 : Julio Carranza, Luis Gutierrez, and Pedro Monreal, *Cuba : La Reconstrucción de la Economía* (preliminary draft) (Havana : Centro de Estudios sobre

America, January 1995); Rolando H. Castaneda and George Plinio Montalvan, "The 'New' Cuban Economic Model (Or Socialism With Cuban Characteristics)," in *Cuba in Transition : Volume 5, 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uban Economy*, 1995.

註二十一 : Pedro Monreal, "Cuban : The Challenges of Being Global and Socialist...at the Same Time,"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5, no. 1 (Spring-Summer 2001): 16.

註二十二 : Ibid.

註二十三 : Maurice Mei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New York : Hill and Wang, 1996); Robert Weil, *Red Cat, White Cat : China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6).

註二十四 :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On Colonialism* (Moscow : Progress Publishers, 1974);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Marx and Engels on the United States* (Moscow : Progress Publishers, 1979);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V. 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5 (New York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3); Leon 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rospects* (London : New Park, 1962).

註二十五 : Paul Burkett and Martin Hart-Landsberg, *Development,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chap 4.

註二十六 : Constance Lever-Tracy and Noel Tracy,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Mainland China : An Emerging Economic Synergy* (London : Macmillan, 1996); Constance Lever-Tracy and Noel Tracy, "The Three Faces of Capitalism and the Asian Crisi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31, no. 3 (July-September 1999).

註二十七 : Walden Bello, "China at 50 : A View from the South,"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1999, <http://focusweb.org/popups/articleswindow.php?id=251>.

註二十八 : Castaneda and Montalvan, "The 'New' Cuban Economic Model" ; Roger R. Betancourt, "Cuba's Economic 'Reform': Waiting for Fide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Cuba in Transition : Volume 9, Ni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uban Economy*, 1999.

# 打造第一個 全球裝配線

台灣通用器材  
1964-1990

■陳信行

「全球裝配線」(global assembly line)是關於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最突出的一個映象。無論是讚頌、是詛咒，是用追憶已逝年華的哀傷語調、展望未來商機的勃勃雄心、還是更複雜而批判地尋找出路的態度，各種談論全球化的論述中，不可或缺的是一種前所罕見的工業化的過程：依賴大量低薪低技術勞力生產商品的跨國公司，將原來依著大工廠制的邏輯集中在一個地理空間的生產線拆成零零碎碎的片段。然後，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般，「全球裝配線」的各個段落追逐著低廉勞工、優厚獎勵投資措施、以及經貿優惠條件走遍全球。在激烈競爭的市場壓力下，全球裝配線不可能駐足在一個地方太久，久到它會成為當地社會的一部份。而透過先進的通訊與運輸技術，分散在全球各地分別從事零件、部件的生產與組裝的生產線以人流、資訊流和物流互相連結起來，最終組裝成一件件商品，銷售到美國、歐洲等大市場上。成衣、鞋、消費性電子產品、電器、電腦、家用五金、玩具……，資本主義中心國家購物商場中販賣的一切，現在似乎都是透過這樣的全球裝配線誕生。

對於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社會大眾而言，「全球裝配線」的出現往往意味著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以國家界線為範圍建立起來的，後來常被稱為「福特主義」的社會經濟體

制的危機。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社會保障、透過勞資團體協約建立起來的階級妥協體制，這些現在都時時面臨崩解。而臨著時時打算出走到低工資國家的資本，國家政權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逐漸從維持階級關係的穩定蛻變為不擇手段吸引投資。

相對地，接納「全球裝配線」的貧窮國家，也不見得會由於工廠的出現而擺脫貧困。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主流「國家發展」意識型態中的工業化，最終總要能夠打造一套從原料到市場的完整的工業經濟體系，擺脫對其他國家的依賴，「富國強兵」、「超英趕美」。但是，「全球裝配線」所棲身之處——目前全球各地(主要集中在含中國沿海地區的東亞、東南亞與南亞、中美洲與加勒比海盆地、以及非洲南部)的三千多個加工出口區、自由貿易區、經濟特區、以及更多的保稅加工出口工廠(maquilas, export-processing plants)等，完全不像傳統煙囪聳立的工業區。如菲律賓經濟學家Antonio Tujan 所說，這些幾乎完全依靠進口物資組裝的工廠基本上很難說有製造任何東西，與其稱之為「工廠」，不如說是「勞工倉庫」。(註一)它最主要的出口產品不是成形的商品，而是在製程中物化為商品的一部份的勞動力。出售勞動力的投資所在國，除了台灣、南韓等少數先行的範例之

註一：引自 Klein, Naomi (2003), *No Logo*. 徐詩思譯，台北：時報：頁 271。

外，在加工出口工業化的過程中，往往除了在國際競爭之下愈來愈低廉的工資之外，並沒有多賺到什麼。

然而，即便如此，伴隨著「全球裝配線」而來的社會變遷，卻是不可抹滅的。在加工出口廠的工作機會吸引之下，成千上萬的各國勞動者離開農村中的家園、穿上了制服、每日打卡上下班、聽著領班主管的指示在裝配線上幹活、靠著工資養活自己與家人。他們所經歷的社會距離是巨大的。離開了原來以層層疊疊的家族鄰里鄉黨及各種特殊主義人際關係所交織起來的、由技能與在地知識所規範的舊的在地經濟活動，在加工出口廠裡工作的工人現在成為一個無差別的「一般勞動力」，對雇主以及雇主之上提供訂單的客戶來說，只是一件商品，常常得拿來和地球另一邊的另一個工人比較他的價格與效益。相應地，對工人來說，工作這回事也必須從安身立命的「職業」（以及通常配合工作的居住地點等生活安排），變成隨時拿來計較盤算、合算就待下、不合算就離開的單純謀生手段。

這種雇主與受雇者、資本與勞動力都自由流離、不拘於任何空間、歷史與社會限制、彷彿在牛頓物理學中無摩擦的理想狀況中相碰相吸相斥的勞動力市場，或許存在於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模型中，也或許是資本主義愈來愈深化的過程中社會變遷所指向的方向，卻遠遠不是當前任何特定時地的現實。一個社會的工業化及其人口在這個過程中成為工人階級，是一個廣泛地牽動經濟、文化、社會的各個層面的大轉變，也同時受著這些層面上的既成歷史條件和各種角色的主觀介入的制約與形塑，即使是「無根」的加工出口工業化也是如此。

現代台灣社會史的考察，或許是理解這一波全球化之中「跨國裝配線」的社會效應的一個特別有利的研究取徑。台灣擁有全球第一家「跨國裝配線」式的工廠——1964年設廠的台

灣通用器材（General Instrument, Taiwan, GIT）——以及第一個加工出口區——1965年設立高雄加工出口區。作為第一個追求加工出口工業化的國家，台灣過去近四十年的發展歷程或許在無法複製的歷史條件下不會重現在其他社會，但是，對於這段經驗的深入探討卻能夠提供對當代世界的重要洞見。

本文嘗試以台灣通用器材公司從1964年設廠至1990年代縮減規模的這段急速擴張膨脹時期的招工模式作為切入點，來對加工出口工業化所帶來的社會影響作一個比較立體而多面向的描繪。作為第一家採用加工出口模式的電子廠，通用器材創新地結合其投資地的各種社會條件，打造出一個適應「全球裝配線」的工人隊伍。在這個過程中所創造出來的各種機構（institution），在之後四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將會被不斷地在各地參照使用。

### 台灣通用器材——第一家加工出口廠

泰勒主義精細分工下的裝配線給予工人的勞動經驗常常是不斷重複的割裂片段，使得勞動者與勞動產品之間極大限度地分離。這種工人與產品分離的工作方式是被稱為「勞工倉庫」的加工出口廠的特色。

在這個面向上，美商通用器材公司有著顯著的代表性。本研究三年多以來所訪問的多位通用器材資深及退休員工中，能夠說得出自己在職位上製造的產品的屈指可數，而且多半是在中級主管職以上。這並不僅僅是全球分工安排之下台灣廠的特色通用電子這家公司自創立至今一貫的性格。創立於1930年代、於1940年在紐約股票上市的通用器材一直是一個電子零件與部件的生產商，而從來沒有步入任何品牌商品的市場。

在1947年的一份商業期刊報導中，通用器材被描述為成功地趕搭上新興的電視與FM收音機市場的零組件生產商，產品包括收音機線



圈、調諧器(tuner)、唱片自動換片部件等等。(註二)之後的歲月中，通用器材不斷地在它的產品項目中加入新電子科技產物：積體電路、半導體、衛星電視機上盒等等。然而，直到1985年，華爾街日報仍然形容通用器材的產品是「電子裝置的大雜燴」(a hedgpodge of electronic devices)，生產著有線電視裝置、賭馬下注場儀器等一般消費者難以辨認的產品和無數部件。(註三)在二次大戰後RCA、GE、菲力普、西門子、松下、SONY等大公司主導的電子產品市場中，通用器材一直不是一個醒目的角色，這家歷史悠久的公司一直到1996才被列入S&P 500的指標。

在通用器材的成長歷程中，台灣的投資經驗是具有關鍵地位。從1964年創設而迅速回本獲利的台灣廠開始，通用器材很快地將其海外投資擴展到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墨西哥等處，將其從一個年營業額僅僅5千萬美元的小公司轉型為1980年代初年營業額達10億美元以上的大公司。(註四)

雖然通用器材的公共形象如此模糊，它在台灣電子業以及整體加工出口產業的發展中都佔著關鍵性的角色。現在被尊稱為台灣科技產業教父的李國鼎在回憶台灣出口電子工業的創始時說：

通用電子公司負責人在1964年來看我，那時我還管投資，他說日本的家電業已經擴充得很快，到臺灣來做，有比較利益，可以外銷回美國市場。通用這位負責

人很有眼光，他說這個案子核准後就要盡快開工。

核准後，我們的建築師、工程師一起配合他們信，結果比他預期的提前完成，他高興得不得了。10月開工，招了300個女工，產品一個是電視的調頻器，一個是映像管上的零件，兩樣都跟電視有關。後的產量很高。他就跑到美國找做電視的RCA、摩托羅拉(Motorola)，勸他們到臺灣裝配，結果中心廠都來了，我們原料的零件廠都擴充了，變成一個系統。

果然，我們的輕工業發展得很快，擴充的工廠的產品都有競爭力，出口快速地成長，到了70年代就開始有順差，這是很大的轉變。

後來，艾德蒙的董事長告訴我，說應該找生產映像管的廠到臺灣設廠，如此一來就可以做電視，領先別人，早一步出口。那時日本的廠已開始在我們這裡設廠，怎麼辦？我去找亞太國務卿墨菲商談，1969年，RCA來了，飛利浦也來了，兩家設廠都核准了。因此整個帶動了消費性電子工業，形成非常完整的一個系統。所以當時在香港、新加坡做不到的，我們能做到，競爭力很強。(註五)

事後回憶或許略過了許多過程中的坎坷與種種矛盾。1964年6月5日，在新店寶斗厝美商通用器材投資的「台灣電子公司」開工典禮中，時任經合會(即前美援會)副主委的李國

註二：“New Radio, Television Fields Opening for Gen. Instrument.” *Baron's 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ial Weekly*, Sep. 1, 1947: 27, 35.

註三：Sandler, Linda (1985) “General Instrument Is Viewed as Asset Play, But Many See Next to No Chance for Success.” *Wall Street Journal*, Aug. 8, 1985: 1.

註四：李國鼎(1984)〈台灣通用器材公司來華投資的故事〉《通用之聲——台灣通用器材公司慶祝建廠廿週年廠慶特刊》11/30/1984: 2, 5.

註五：李國鼎(n.d.)〈台灣是怎麼工業化的〉資訊工業策進會，李國鼎紀念網站 <http://www.iii.org.tw/ktli/special/economic/03.htm>

鼎發表演講，表示：「針對美援的終止，最有效的辦法是以投資代替貸款，以貿易代替援助。我們目前的經濟發展，需要吸引更多的國外投資和發展高級工業品的輸出。」（註六）

在吸引外資前來利用台灣廉價勞動力的目標之下，李國鼎等人大力主張以各種租稅、土地廠房與其他優惠措施協助外商。當時的財政部以及其他政府單位頗有不同意見。例如，1966年聯合報引述「此間工商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權威人士」說：享受優惠條件的外商及其合資公司有些不見得外銷，反而與國內廠商競爭日漸狹窄的國內市場，該位人士還要求，像「台灣電子」這樣的純外銷廠，絕對不可允許其中途變卦。（註七）該篇報導的副標題是「民族工業根本不容動搖！」即使在1960年代堅定地反共親美的國民黨政權之下，「崇洋媚外」之類的標籤仍然會被視為嚴重指控。1964年立法院審查《加工出口區設置條例》時，經濟部仍需要在其立法說明中一再申明：此一特區的設置不牽涉到任何主權或治權問題，純粹是個行政措施。

無論如何，「民族工業」的呼聲終究比不上招商引資的熱潮，各式各樣的免稅、退稅措施在兩、三年內成為定局。很快地，北部隨著通用電子而來的一系列美商電子公司，以及中南部投資於高雄、楠梓與台中潭子三個加工出口區的日商公司迅速地成長，新店通用器材公司（註八）從一個廠擴展到八個廠，雇用人數也迅速地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前的1973年達到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九人。加上陸續成立的基隆七堵與淡水兩個廠，通用器材的雇用人數幾達兩萬人。台灣全島各處的求職青年男女紛紛湧

入這些工廠，開始雇傭勞動的生涯。到2004年初，通用器材的直接員工識別證編號已經達到19萬5千多號、間接員工達1萬2千多號，加上短期契約工500多人，估計四十年來有超過21萬人曾經為通用公司雇用過。

### 「高科技」與特定管道的勞動力供給

光從主要報紙分類廣告來看，通用器材設廠的前四年，其社會衝擊是很難察覺的。1969年通用器材刊登它的第一份報紙徵才啟事以前，報紙招工廣告的通例是雇主不具名、待遇不詳列，僅略列工作內容與要求的性別、年齡與學經歷等資格限制。圖一的裕隆汽車廣告是一個例子，雖然這家公司並不吝於列出自己的名號。這樣的廣告所展現的是一個不對稱的交易過程——買方要求知道賣方的所有相關訊息，而賣方在面試之前還沒有機會知道賣方開出的價碼——包括薪資、福利、工時等。這是一個賣方市場。

圖一：1962年裕隆汽車的招工廣告

裕隆汽車公司  
地址：台北市上環路224號  
電話：2240  
徵求：凡具有初中以上程度，年齡在18歲以上，30歲以下，身體健康，品行端正，能長期工作者，均可應徵。  
應徵日期：自即日起至10月31日止。  
應徵地點：本公司人事課。  
應徵時請攜帶學歷證件及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二張。  
本公司為發展業務，特在各地設立分公司，現正積極徵求各類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待遇優厚，福利完善，有意者請速來函索取簡章及應徵表。

台灣新聞報民國51年10月24日

1969年以前招工廣告的闕如顯示了當時通用器材公司主要的招募管道來自特定關係，無須透過媒體向非特定大眾招工。在訪談中，通用的資深員工屢次指出：第一批員工中技術人員的來源主要來自退役空軍通信人員與鄰近的

註六：〈李國鼎強調以投資代替貸款 以貿易代替經援俾適應美援終止情勢〉1964-06-06 / 聯合報 / 05版。

註七：〈吸引外資利弊得失大家談 經濟發展康莊大道外資來台設廠 產品限供外銷民族工業根本不容動搖〉1966-01-29 / 聯合報 / 13版。

註八：該公司在1966年從「台灣電子公司」改名為「台灣通用器材公司」以延續「五年免稅」的優惠條件。

裕隆汽車公司，作業員則來自附近的社區婦女。在「人求事」孔急的買方市場中，雇主招募員工似乎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然而，作為一個國家扶持的新興產業，再加上「電子」的高科技形象，如何供應通用器材「高水準」的勞動力在1960年代是已經合會為主的政府機構注重的業務項目之一。

1965年，省教育廳在通用器材廠址跨過景美溪對岸的省立景美女中設立了一所技訓中心，以便：

……為台灣電子公司培植所需要的技術人才。這所技訓中心，將分期訓練製造電視機、收音機零件的女性技術人員八百人至一千人，由設於新店大坪林的台灣電子公司供給教學器材及師資，訓練完成後，即由該公司錄用，每月薪資自七百元起計算。（註九）

當時正是通用器材要開始積極擴廠的時節，該廠打算從500人擴充到1500人。同時，經合會也向聯合國申請專案，要在交通大學內設立一所電子「電子技術應用研究中心」，以供應迅速擴張的電子工業技術人才。（註十）在之後的歷史中，通用器材的確成為了台灣許多電子技術人員的搖籃，其中包括後來成為通用器材總公司總經理，隨後成為台灣積體電路公司董事長的張忠謀。

在初出現在台灣島上的電子業所給人的「高科技」想像之中，電子廠的員工應該是受過嚴格訓練的高級技工，非從嚴格篩選的、國家設立的特定管道來不可。這種想像很快地在通用器材營運與員工隊伍快速的膨脹中消失了。從1969年開始，招募成為通用器材人事部門的首要業務。隨著加工出口工業整體的擴

張，「人求事」成了「事求人」。

## 大招工年代

單純以市場邏輯來看工資，從1964年迄今四十年來，電子廠的工作並不特別吸引人。除了在1977到1984年間台灣外銷電子產業的高峰期之外，通用器材日班作業員的起薪一般都在全國製造業員工平均薪資的一半以下。

然而，就業這回事，無論在工人主觀意願中或是客觀事實上，都不會單只是一個勞力換取工資的交易，而是整體生活方式的改變，尤其對於第一代從農家出身的求職者而言。於是，當「事求人」的大招工時代來臨時，類似通用器材這樣的大電子廠的招募作業吸引求職者的手段，就逐漸從不說明待遇而被動的啟事、到清楚地明列待遇、乃至勾畫出一個就業可能帶來的文明都市生活方式的積極宣傳。在高潮時，通用器材等電子公司各式各樣的主動招工作法更動員起了從國家到國民黨地方黨部、學校到教會等「民間社會」機構。

從1969年開始，到1985年通用器材在自動化與業務衰退之下第一次大裁員為止，電子及其他加工出口工廠報紙招工廣告在一個年度之內的分配有一個明顯的模式，姑且稱之為勞動力市場的「春節行情」。1969年春節過後，是報紙分類廣告的第一波歷史高潮。通用器材的第一份招工廣告就是這時出現的：

圖二：通用器材公司1969年春節後的招工廣告



出處：中國時報58.3.22 八版

註九：〈景美女中將設 技訓中心一所〉1965-08-27 / 聯合報 / 02版。

註十：〈經合會將請聯合國協助設立電子研究中心〉1965-12-30 / 聯合報 / 02版。

這第一份招工廣告仍然遵循之前「某大公司徵作業員」的徵才分類廣告的普遍模式，不打出公司名號，但已經詳細地列出薪資條件以吸引應徵者。這份廣告在中國時報上一直刊登到四月底。顯然招募的男性員工仍然不足之下，通用器材在四月底有刊出了新的廣告，這次明白地以公司名號及「台灣最大的電子公司」作為號召。

圖三：通用器材公司1969年四月的招工廣告

出處：中國時報58.4.28 八版

1971年的春節過後，通用器材的缺工現象顯然比往年更為急迫。在這年的招工廣告中，起薪比兩年前增加了25%，依學歷而分的薪資差別取消了。根據一位世居木柵溝子口（離通用器材約2公里）的受訪者表示，大約1970年代初，庄裡每戶人家只要有女孩子的幾乎都到「電子公司」上班了，連中年婦女也去了。本地勞動力來源的枯竭使得通用招工的報名地點除了新店寶斗厝的本廠（「欣欣客運站牌『電子公司站』」）之外，還加上了新店、三重的公立就業服務站，以及國民黨在鄰近的新店、烏來、平林、深坑、中和、永和、土城、三峽、板橋等方圓50公里之內的鄉鎮市民眾服務站。類似地，1972年在桃園設廠的RCA公司的招工廣告列出的報名地點包括了遠達嘉義、羅東、花蓮的就業服務站。到了1974年，通用招工的報名點除了大台北地區之外還包括了桃園、苗栗、台中、虎尾、羅東、嘉義。

圖四：1971年通用器材的招工廣告

出處：中國時報1971.2.27 六版

這份廣告從當年2月1日刊登到27日，行文之中最具有急切感，也帶著加工出口工業高度去技術化的精神的，是這一句：「報名經錄用後，可即刻開始工作。」1971年四月六日，通用器材的廣告打出「公司以最低費用供給高級宿舍」，而且「星期日照常報名」。翌年1月21日底，時序又接近春節時，通用的廣告除了宿舍之外，打出了「備有福利餐廳以成本價供應餐點」，而且錄取最低年齡降到15歲。（註十一）再過一年，1973年的春節前，當通用再度把錄取年齡往下降，開始雇用14歲童工時，它所標榜的福利設施包括福利餐廳、診療所，以及各種交通伙食津貼。當時，大夜班仍然限男性，而且「特歡迎無專門技藝之役畢青年」。

1973年底，新店地區四家公司有三家登出了徵人啟事：

圖五：1973年通用、正大與裕隆的招工廣告

出處：中國時報1973.12.3 十版

註十一：通用招收14足歲女性作業員至1981年，才重新調回15足歲，之後到1987年又調回勞基法規定的16足歲。

通用器材這時的起薪比起兩年前調高了將近一倍。但是顯然勞動力市場上性別差異被視為理所當然，正大尼龍的男操作員起薪比通用的日班女作業員還高了65%。兩家公司都詳細地列出了各種福利措施作為招徠誘因。低價或免費膳宿、學費補助、員工旅遊、定期電影欣賞等等在當時的大公司似乎已經是常態，而以女工為主的通用器材還列出了「家事補習」做為員工福利。而向來以福利優厚著稱的裕隆汽車反而只簡單地列出高額的薪資。

「女性宿舍、冷氣廠房、勞工保險、免費醫療、家事補習、各種休假、年終獎金、加班給付、職務晉升」是第一次石油危機前後通用招工廣告的常見字句。隨著通用來台投資的桃園RCA、增你智(Zenith)、艾德蒙(Admiral)中和德州儀器(TI)等美商電子公司的廣告也非常類似。以1974年1月27日RCA的廣告為例，除了空調廠房、現代化宿舍與餐廳之外，還列出了「康樂室、圖書室、縫紉室及各項補習班、與附近8所學校建教合作可學費分期付款」。

從廣告看來，通用器材、RCA等公司所要打造的工廠體制(factory regime)類似1930年代獨立產業工會興起之前的美國大公司推動的「福利資本主義」(welfare capitalism)——私人資本為工人興辦福利設施，以現代文明開化的價值與風格揉合著家長制照護的姿態規訓多數為初走出家庭的年輕勞動隊伍。(註十二) 1970年代中期，RCA公司的招工廣告就不斷以「歡迎妳加入我們溫馨的大家園」作為廣告詞，而飛歌電子則是「年輕女性的福音」。

「大家園」的說法在通用器材倒是沒有其他北部大電子廠那麼常見。作為一個零組件供應商，通用器材的生產規模數十年來不斷地隨

著訂單而波動。市場景氣對於RCA等產品製造商的衝擊往往放大地影響著供應商，又轉而以更大規模衝擊供應商的工人。從1974年石油危機開始，通用器材不定期地以 lay-off 暫時資遣的方式縮小雇用人數以應付訂單縮水，之後，在訂單狀況旺時又再雇回前員工，年資照算。人員來來去去的狀況使得通用的工作對於工人們一直保持著一種臨時性。

大招工的1970年代勞動力市場開放程度比起1960年代實在不可同日而語，年齡、技藝、出身、人際關係等特殊主義的錄用條件在加工出口廠暴增的對於低技術勞動力的渴求之前都變得不重要了。但是，黨國控制的時代氣氛依然濃厚。直到1980年代末解嚴之前，警備總部派駐在通用器材公司的安全室主任一直是少將以上退役人員擔任。1973年考進通用的一位技工表示：

進通用的時候是經過考試的。並不是一群人，而是比如說當天有兩三個人去報名，便當天考試。一進去的時候要先填一堆資料，而且是非常詳細的，包括姓名、性別、身高、體重、哪一個國家、什麼樣的髮色、膚色、眼睛是什麼顏色的，家裡有那些人，之前在哪裡工作過，怎麼進去的，做什麼，什麼時候離開，為什麼離開，還可以查到嗎？因為公司會去調查。另外會做一些測驗。寫自傳，考作文，題目是我的家庭，另外還會問對國家的看法。就是要問你黨派的問題。這些人是政府安排的，因為怕有間諜，而且當時還會考一些關於保密防諜的問題，像是非題，比如說保密防諜是妨害國家安全的事嗎？

但是，過度誇張黨國控制的縝密程度是不正確的。這位受訪者同時表示：這些問題「只要頭腦比較清楚的人都答得出來」。森嚴的意

註十二：Vallas, Stephen Peter (1991), *Power in the Workplace*. Albany: SUNY Press.

識型態控制成為戒嚴時代台灣的普遍狀況時，「思想檢查」也同時變得形式化而沒有太多實質的篩檢作用。同時期應徵作業員的受訪者倒是常常表示，他們連形式上的考試都沒有，只有經過簡單的資料審查和性向測驗以分配職位，往往在應徵當日就上班了。

「春節行情」在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的兩年較不顯著，但是之後幾年仍然繼續發燒。從招工廣告看來，1981年是台灣勞力密集製造業基層員工勞動力市場的「春節行情」是最激烈的一年。當年春節前，桃園的美商增你智公司就開始刊出了專門針對女性的招工廣告：「進了增你智，才知道她的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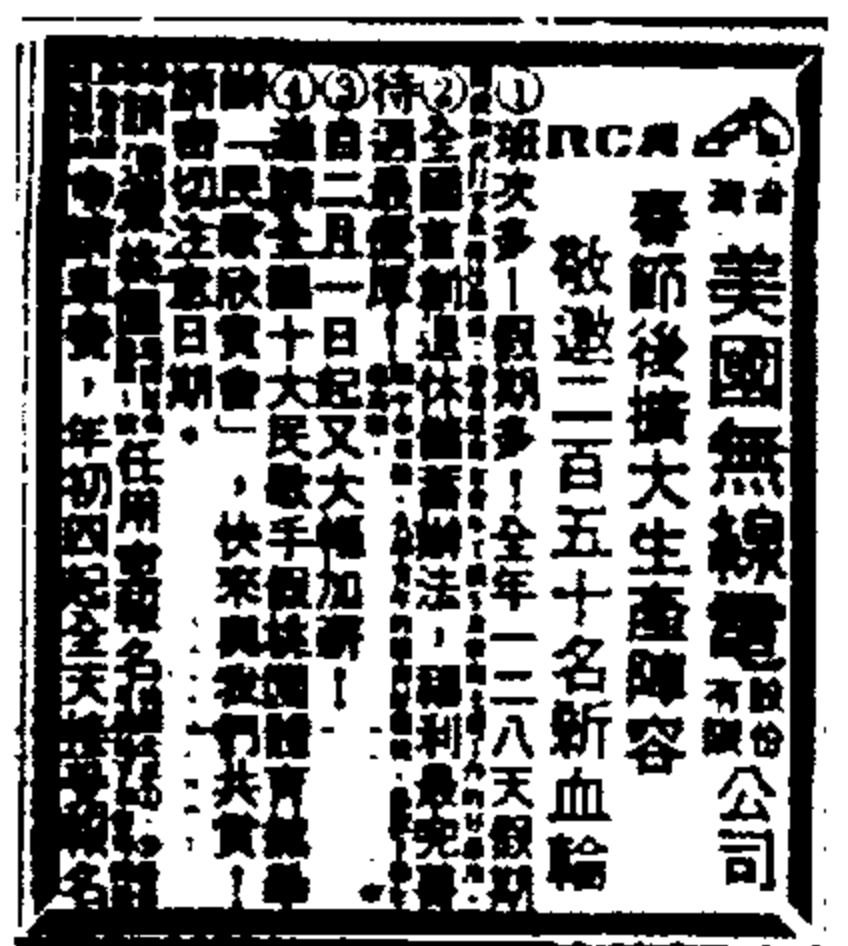
圖六：1981年春節前夕美商增你智的招工廣告



出處：中國時報 1981.2.1. 十一版

在當年的各大報春節專號中，北中南三地的大工廠就不斷刊出「恭賀新禧」徵員工的廣告。春節過後，RCA公司為了徵募兩百五十名員工，甚至還邀請了「全國十大民歌手」在桃園體育館舉辦了民歌演唱會。

圖七：1981年春節後美商RCA的招工廣告



出處：中國時報 1981.2.9. 七版

「春節行情」展現的是一個以農村出外人員為主、流動性極高的勞動力市場。工人們春節前吃了尾牙酒宴、領了年終獎金，回家過了年之後，往往會深刻地考慮未來前途問題，從而決定跳槽換工作。她們最重要的社會連帶仍然是家庭，與公司之間幾乎不會有太多感情。1970年代政府與企業喜歡高舉的口號「以廠為家，以廠為校」似乎暗指：透過種種招工管道，離開農村家戶與社區的移民工人會進入另一個類似家庭或學校的特殊主義社區。「春節行情」的現象說明了現實狀況並不是如此。電子廠的工作，對許多工人來說，到底只是一個工具，通過這段經驗，她們要應付家庭與個人的經濟需求、累積一些積蓄、學習如何成為都市人，以便之後走到另一個社會位置去。

### 上天下海尋「人礦」

1973年開始在通用器材人事部門工作的C小姐回憶當時在新店周邊社區招募女工的急迫情形。她說，當時公司：

……派遊覽車到溪坑、石碇把人接來，我們那時很缺人（1973年），餐廳管理員說，我們那邊有很多媽媽，想來工作，後來透過鄉長，大家相互口傳，到鄰里長、村里幹事處，會有一些表給她們填，不識字的我們也收，早期打卡她們會在卡片上做她們認識的記號，我記得在淡水廠就有一個叫阿霞，她就劃一隻蝦子，我們也有不識字的做到退休，我們這個月就有一個，這部份以家庭主婦小夜班為主，煮好飯放餐桌後出來，一部專車接她們來，送她們回去，（以前石碇到這裡沒有公車）現在沒有了。

工廠設到家門口，從農村社區家戶中招募原本不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剩餘勞力」，這原本是「全球裝配線」地理移動的原理。相對於從產業革命以來就有的盛行城鄉移民模式——

勞動力從鄉村移往都市追逐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工作機會——加工出口工業化是資本從都會移往（世界體系尺度上的）鄉村追逐資本主義不發達地區的便宜勞動力。李國鼎等外銷導向發展模式的提倡者常喜歡不經意地把這種行動比擬成採礦：未進入資本主義就業市場的人彷彿是藏在地下的礦石，需要資本把他們開採出來才具有意義。所以他常說：「當年台灣什麼資源都沒有，只有人力資源。」（註十三）

然而，隨著這種模式的成功與設廠地點雇傭勞動的發展，市場供需又向勞動力的一方傾斜時，以今日「全球化」下的通例，資本就必須再度動身，往更便宜的國家地區而去。在這點上，作為加工出口先驅者的通用器材在台灣漫長的四十年歷史並不尋常，正如同加工出口發展模式帶給台灣的工資高度成長，在全球範圍看來，並不尋常。

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全球景氣熬過了第一次石油危機的衝擊之後，外銷導向的台灣工業開始面臨到愈來愈嚴重的「缺工問題」。因應著在地便宜勞動力的枯竭，通用器材採取了兩手策略：一方面深入地在新店地區挖掘尚未被利用到的「人礦」，另一方面往全台灣範圍積極招工。

1978年通用器材的介紹親友獎金計畫是第一種策略的一個例子。根據當時聯合報記者徐榮華的報導：

……設在台北縣新店鎮的台灣通用器材公司，日前發出了一項通告，宣布鼓勵員工介紹親友到廠工作，並實施介紹獎金計畫，直到人員缺額補足為止。

通用公司的獎勵辦法包括，凡新店廠員工及生產線管理員，如能介紹一位年滿十四歲至四十歲的八小時日班女性裝配

員，而工作能滿三個月者，可獲得六百元的介紹獎金，介紹人數愈多，領得獎金數額愈大。該公司並歡迎在校男工同學工讀，家庭主婦也可在兼顧家務的情況下，利用部分時間工作。

徐榮華接著說：

通用公司的介紹獎金計畫，祇不過是當前製造業普遍現象的一個例子。據瞭解，密集於南京東路的多家電子公司也常提供這種獎勵，不過，由於此類勞力資源的流動性很大，很難達到補足缺額的目標。尤其是八小時及四小時日班需要的人數更多，更難補足，日前，台灣艾德蒙海外公司遣散員工，領得遣散費的工人，一出公司大門，就為預先等候在外的其他電子公司拉去，這種現象已不足為奇。目前一般輕工業勞工報酬略嫌偏低，應是造成供需不平衡現象的主要原因。一個操作員每月祇能拿到三、四千元的薪資，如何養家活口？難怪專職的勞工愈來愈少。（註十四）

另一方面，通用公司的人事部門不停止於被動地等著人們上門應徵，而開始主動到中南部各縣市招募國中畢業生大量北上進廠工作。負責校園招募工作的C小姐說明通用公司1970年代初第一次嘗試的主動性招工工作：

……經過公司的評估認為：南投、雲林這兩個地方最沒有工廠，而且人口也比較集中，不像花蓮，人口太分散，就到那邊大量招募，我們先與校長接洽，這方面由上面階層負責，我們只負責幫著他們帶學生上來。我們利用文宣、宣傳車、透過麥克風介紹通用公司；整個過程我都有參與，遊覽車浩浩蕩蕩載著小朋友上來，都

註十三：有趣的是，在歐洲語言中，「開採」與「剝削」同樣都是exploitation。

註十四：1978-12-15 / 聯合報 / 第五版。

是國中畢業生，告訴它們來台北建教合作，白天工作，晚上去學校上課，公司供應膳宿，它們可以選擇就讀的學校，學校也各憑本事去拉學生，學費我們會先幫它繳，家長把孩子送上來都不要煩，吃、住都在這裡，有很多孩子在這裡把學業完成，有的甚至於念到專科畢業，後來做工程師現在好像在做經理，也有的最後把家人全部接上來，都很不錯。

那批上來大約6-700人，現在我們車蓬後面整排都租下來給它們住。還雇了3-4個媽媽專門照顧這些孩子，逢年過節，這些孩子剛上來，想家哭的厲害，這些媽媽都會跟我們報告，讓我協助它們，後來我們的mother hen（註十五）就訓練生產線上的領班來擔任，這些領班把它們像自己的姐妹一樣照顧，在過節的時候也會把它們帶回家。就這樣把這些人安定下來。男的有的做到當兵，女的也有的現在還在公司做，都做媽媽了。

除了南投與雲林之外，通用器材做過的主動性招工最遠的到達澎湖馬公。1984年，公司甚至提供馬公地區到台北就業的女性免費單程機票。

### ■八：1984年通用器材徵澎湖地區女工的廣告

出處：中國時報1984.4.1 十一版

**台灣通用器材公司聘**  
女性從業人員  
△八時日班（兼收男生）  
△歡迎馬公地區未婚女性，供單程免費機票、  
△公司派專人於四月中旬至馬公面談，請函台北市○○○號信箱轉用郵）  
報名須知：  
一、凡欲應徵者，請於四月十日前，將履歷表、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二張，寄至台北市○○○號信箱。  
二、應徵者須為未婚女性，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  
三、應徵者須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  
四、應徵者須具有良好之體格，無不良嗜好。  
五、應徵者須具有良好之工作態度。  
六、應徵者須具有良好之溝通能力。  
七、應徵者須具有良好之團隊合作精神。  
八、應徵者須具有良好之學習能力。  
九、應徵者須具有良好之責任感。  
十、應徵者須具有良好之誠信度。  
另徵西餐女廚師：  
中學程度，35歲以下，二年以上廚師經驗。

## 「文明」的生活——宿舍與學校

對於戒嚴時代台灣社會的工業化與工人階級形成的論述常強調國民黨政府的政策與意識型態宣傳的關鍵地位。在這個論點認為，森嚴的戒嚴體制加上黨國機器選擇性地宣傳傳統中國文化中勤儉打拼、尊重權威的美德塑造了這一代台灣工人階級溫馴的性格。女工，在壓制性的政治與文化之上更必須承受政府所推崇的保守父權傳統對年輕女性所加上的重重桎梏，因而特別無力無心反抗。

這個說法除了忽略了工人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之外，更容易把複雜的社會過程簡化為一個彷彿全知全能的行動者——國民黨黨國體制——的主觀行動，而忽視了：任何一個全面性的社會變遷都必須牽涉到種種性質角色各異的機構與個人行動者，即使在其中有一個或一群明顯的主導者。比較成熟的歷史研究有責任要打造出比較立體的再現。

在通用器材公司四十年來打造出一個適應加工出口工業的工人隊伍的過程中，除了跨國資本本身與扶助資本的政府之外，教會與學校（尤其是私立學校）扮演著重要的配合角色。

通用器材公司設廠之後兩年的1966年，當雇用人數突破兩千人，愈來愈多外地女工北上就業時，公司與天主教新店教區的德籍神父萬德華合作開始募款興建一個現代化的「職業婦女公寓」。「公寓興建會」以「福利資本主義」的風格盛大地在台北上流社會之間組織起來，名譽會長由婦聯會會長蔣宋美齡擔任。（註十六）1968年5月，後來命名為「德華女子公寓」落成時的盛況，可以由聯合報的報導中看到：

該座職業婦女公寓的落成典禮，由籌建的天主教聖言會會長萬德華神父主持，

註十五：母雞，通用公司的美籍管理人員如此稱呼負責照料帶領年輕工人的較資深女工。

註十六：〈建女工宿舍 通用公司捐款百萬〉1966-12-23 / 聯合報 / 02版。



婦聯會總幹事皮以書代表該公寓興建會名譽會長蔣夫人剪綵，台北市長高玉樹，省議會議長謝東閔，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教廷駐華大使艾可儀等多人均在典禮中致詞，他們對於萬德華不辭辛勞籌建該座職業婦女公寓的博愛精神，同表敬佩。

萬德華神父在報告籌建經過中說，他在倡建「台灣職業婦女公寓」之始，美國名導演懷斯，正陪同該公司電影明星麥昆來台拍攝「聖巴羅砲艇」影片的外景，懷斯和麥昆獲悉這項善舉後，首先熱烈贊助，共捐獻一百萬元，使得這座婦女公寓能夠順利完成，因此，萬德華神父即以該公寓的藍圖彩色畫一幅相贈。

這座婦女公寓設有花園、涼亭、圖書館、閱報室、保健室以及電爐、電冰箱、電視機、電話等各種現代化的設備，環境幽雅，起居舒適，婦女每人每月只需繳納一百六十元以下的租金就可以進住。（註十七）

直到1990年代中拆除改建為高層住宅大樓為止，德華女子公寓一直是通用器材公司的特約宿舍，公司補助中南部北上就業女工住在十二個人一間的房間。德華這個教會主辦的慈善機構不僅提供住宿，還試圖提供一套完整的、在保守的現代化意識型態定義下的都會女性養成計畫。通用招工廣告上所宣傳的「家事補習」正是由德華負責提供，參與的學員不僅是宿舍的居住者，還廣受許多不住在宿舍的通用員工的歡迎。一位木柵出身、1975年進入通用擔任作業員的受訪者表示：

家事補習是在德華公寓那有烹飪教室，開烹飪、英日語、緞帶花、縫紉、插

花等課程，我記得那時我下班後去上完課才趕去學校上學。

落成典禮時擔任司儀的一位美籍女性艾琳達後來在1975年選擇了住到德華公寓內從事她對台灣女工的田野研究。美麗島雜誌社成立後，亟欲從事社會實踐、接觸女工的幾位美麗島女性工作人員，包括呂秀蓮、陳菊等，透過艾琳達的介紹到德華公寓內舉辦過幾場談現代女性問題的座談會。然而，德華所提供給女工的現代化教育終究有個限度，它始終沒有成為黨外民主運動的某種組織基地。艾琳達在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之後中斷了她的研究。部分研究材料過了20年後才呈現在她的文集《激盪！台灣反對運動總批判》中。（註十八）

比起教會宿舍影響更廣的是通用器材與鄰近的私立高職合作發展出來的建教合作計畫。從1975年開始，通用器材的招工廣告開始以「按志願保送夜間部就讀」作宣傳。與通用合作的學校包括了新店文山地區的開明、南強、滬江、景文、莊敬、強恕等校，公司提供從500元到1000元的獎學金，但其他學雜費必須分期付款。1978年的廣告宣傳：

保送升學：南強、開明、景文及滬江四校任你選讀一校夜間部，志願選科：有機工、電子、電工、冷凍空調、汽車修護、會統商科、美工及普通高中等科、任你選讀一科，學習一門專技。學校鄰近工廠，放學上班最方便。（註十九）

根據一位1976年由苗栗通霄國中畢業，經通用的國中校園招募作業北上就業的受訪者表示：

建教合作其實就是公司把學校當成員工宿舍。遊覽車載我們到公司的時候，一

註十七：〈婦女公寓 完成奉獻儀式 接受進住申請〉1968-05-26 / 聯合報 / 04版。

註十八：台北：前衛，1998。

註十九：通用器材招工廣告，中國時報1987 / 12 / 17 / 11版。

下車，就看到一排各學校的攤位。人事職員告訴我們依自己的意願選擇一家，我就選了景文。當天就住進景文的宿舍。白天上班，晚上回學校上課、睡覺。當然累得時候就沒力氣讀什麼書啦。但是住在宿舍裡比較單純，有教官管，公司和家裡也比較放心。後來台北熟了，我就和同事搬出來租房子住了。

在加工出口工業化中大量由農村家戶湧入工廠，最終成為都會居民的這一代工人嵌入都市社會與雇傭勞動生活固然不是——如「現代化」教育的設計者往往如此期望的——嚴謹的社會工程計畫的產物，但也不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過程。國家、資本與類似教會、學校等社會機構所共同塑造的這個過程還需要對現有的人量資料的進一步分析，這是未來的台灣勞工史研究者值得探索的一個切入點。

## 大招工時代的終止

1984年，台灣通用器材建廠20年廠慶時，甫從德州儀器轉任美國通用器材總公司總裁的張忠謀（他在赴美之前也曾任台灣通用器材的工程師）對全體管理人員發表了訓話。在演講中，他歷數了當時世界經濟各種不穩定的因素及其對公司營運的影響。然後，他表示，通用公司必須「以傳教者的熱忱」降低成本。「假如每年售價降低20%，成本也要降低20%」。降低的方法主要靠機械化、自動化。（註二十）

張忠謀的講話符合了後來大大盛行的「摩爾定律」——電子產品的價格與成本必須高速地下降。廠慶之後，自動化果然雷厲風行地在台灣通用器材推行了。加上美國通用總公司在1985年因為投資有線電視器材的失利而緊縮業

務，台灣通用的雇用人數從近兩萬人銳減到3000餘人，之後，在1980年代開始美國的企業購併風潮中，通用器材被轉賣了兩次，台灣通用的員工人數持續下降到今日的1千餘人，而大部分勞力密集製程被轉移到1990年代初設立的天津廠。

除了員額緊縮之外，影響通用器材招工模式在1990年後轉變的主要因素有二：外勞的引進與城鄉移民的終止。

1980年代中隨著泰北難民來台，通用器材公司雇用了愈來愈多、最終達三百餘人移民來台的緬甸華僑。聚居在中和華新街一代的緬甸華人或許是唯一在台灣形成異國移民聚落的族群。更大量的外來移工是開放外勞之後引進的泰籍工人。1964年通用器材設廠之後所引發的台灣島內的城鄉人口流動，在1990年代更醒目地跨越國界發生在這家公司。而在台灣本地居民方面，從通用設廠以來二十餘年的城鄉移民已經使得台灣在1990年代成為一個都市社會。都會區人口家戶遠超過農村居民，而城鄉的社會界線也逐漸地消失。這時候，通用器材的招工手段從1969年以來的全島大招工逐漸轉回主要靠透過夾報與派送傳單等管道的鄰近社區招工為主。因為，據該公司一位退休職員表示：「會來通用作的都是本地人，不會有人專程從中南部上來求職」。

值得注意的是，在90年代的招工廣告，在內容方面，又回到1960年代買方市場的形式：僅列出職缺與資格、不詳列待遇。「人求事」！

至此，加工出口工業化的過程對工人階級來說螺旋狀地回到原點，從1960年代的「人求事」，經過二十餘年的「事求人」，在二十餘萬人通過了通用器材，其他7百餘萬經過遍佈全

註二十：張忠謀（1984）〈張忠謀博士對本公司管理人員演講〉《通用之聲——台灣通用器材公司慶祝建廠廿週年廠慶特刊》11/30/1984：4-5。

台的各種在加工出口工業化中興起的企業的雇用經驗，成為基本上除了自己的勞動能力之外無可出賣的都市工人階級之後，供需的天平又傾回到了資本的那一邊。

### 戒嚴與加工出口工業化下的工人

1975年1月16日星期四中午，數千名通用器材的員工放下工作，走出廠房。公司門口的新店寶橋路上擠滿了人。一群憤怒的男女工人蜂擁到人事處去，據一位當時的職員回憶：高大的美籍人事經理擋在辦公室門口，生怕工人們搗毀辦公室。公司剛宣布：由於1974年石油危機的影響，通用器材獲利未達預期，往年都加發半個月薪資的端午節獎金（一說中秋節獎金）一律取消。成立甫滿五年的通用器材公司產業工會幹部們於是發起罷工。

一位當時的工會幹部回憶當時的心情，說：「我就是看不慣那些洋鬼子欺負咱們中國人！」但是，這絕不單單只是一個本地工人對抗跨國資本的民族主義鬥爭，也不僅僅是個爭取經濟利益的勞資糾紛。在戒嚴體制下，在外國資本和國民黨政府的詭譎聯盟中，沒有什麼事是單純的。同一位幹部接著說：「工會馬上通知憲警單位到場處理，防止資方的人馬鬧事。」當天晚上，在情治單位的協調之下，勞資雙方達成了協議。

通用器材產業工會成立於設廠五年之後的1970年。最初的爭議議題是職工福利金問題。根據戒嚴時代的《工廠法》，工廠生產的下腳料變賣所得必須提撥為職工福利金。通用公司顯然並未照做。在幾名多半是外省籍、軍方退役、有黨政關係的技工推動之下，工人們進行了幾次抗議行動，並登記成立產業工會。一些當時的女工還記得工人們躺在下腳料上阻止公

司將之載運出廠變賣。

資方原本拒絕承認工會，最後，根據當時報紙上簡短的報導，在政府「相關單位」的協調下，資方妥協，承認了工會，解決了下腳料問題。1973年是通用面對台灣政府對其挑戰最明顯的一年。那一年初，淡水的飛歌電子廠爆發十餘位女工中毒死亡的慘劇，台灣省工礦委員會因而加強對各大電子廠的安全衛生檢查，還於6月對通用處以停工7天處分（雖然之後沒執行，因而引起員工抗議）。

根據當時的工會幹部與人事職員表示：1975年的罷工之後，通用器材公司與工會簽署了團體協約。之後，一直到1998年，通用的新東家決定擺脫工會幹部而提供具優惠退休，75年建立起的穩定廠內勞資關係體制才終止。

通用的罷工與工會成立歷史耐人尋味之處，不僅僅是它違反了我們一般對嚴禁群眾運動的戒嚴時代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即使至少有五千餘人參與了那次事件，至今台灣社會中仍普遍並不知道這回事。（註二十一）當時的媒體完全封鎖這個消息，而黨政情治單位的介入顯然是以防止事件擴散為最重要任務。

但是，無庸置疑的是，不管類似通用器材的外資公司如何在其廣告中打造「溫馨的大家園」、「年輕女性的福音」等形象，並進而運用與學校、教會、黨政社會團體等機構和其人事政策嘗試落實其承諾，「全球裝配線」終究是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充滿著雇傭勞動本質上的階級矛盾，這些矛盾不能抹滅，只能壓抑或轉化，壓抑不了，就會以各種形式爆發。

從通用器材在1975年之後的近三十年的平靜看來，圍繞著該廠所打造出來的各種勞資關係與勞動控制機構，包括工會，在壓抑轉化階

註二十一：在文獻上最重要的來源是艾琳達1975年罷工之後對相關人士的訪問，之後在1970年代末期幾份國外刊物報導了此一事件，陳玉璽1981年訪問了艾琳達，並將之收錄於其著作《台灣的依附型發展》（台北：人間，1992）中。

級矛盾這點上，是有效的。雖然對於通用器材的個案研究還有許多疏漏之處及更多尚待整理解讀的資料，我們大概可以得出兩個暫時性的結論：

- 第一，從招工開始，透過各種廠內福利措施與建教合作等機制，通用器材公司大致成功地協助走出農村的青年男女將自己打造為適應都市生活形態與雇傭勞動的工人。更重要的是，通用器材公司發展的前二十年，台灣都市就業機會的大量擴張所造成的「大招工年代」使得其招募來的工人有可能將通用的工作機會視為轉往其他工作與社會位置的跳板，從而不用面對個別廠內每日生產中的階級衝突；
- 第二，當大大小小的廠內階級衝突無可避免地累積時，戒嚴體制容許、甚至支持的工會，通過有限度的抗爭折衝，成功

地化解了大部分矛盾。從加工出口工業化政策肇端伊始，國民黨政權中對外資投資疑慮的潛在力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必要的輔助角色，通過限制外資工廠的勞動行為，穩定其勞資關係。

問題是，這樣的歷史是否可能在其他的時空條件下重現。我認為是不可能的。張忠謀1984年要求通用器材員工「以傳教士熱忱」推動的不斷降低成本現在成為全球三千多個加工出口區中無數工廠的信條。而在全球規模的「人求事」市場中，限制資方勞動行為的政府措施往往馬上會被國內資產階級譏為愚蠢、「破壞投資環境」。另一方面，一個又一個國家經歷了愈來愈短的「大招工年代」，打造出大量除了雇傭勞動別無生路的都市工人階級隊伍，使得「事求人」年代的種種顯得愈來愈遙遠。◎

## 稿約

歡迎踴躍投稿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以5,000字

以內為宜。

- 二、理論文章以10,000字為度，特殊狀況不在此限。
-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 六、來稿請於每月十五日前寄達。

# 三個中國 兩次轉型 (一)

# 前言

■祝東力（北京《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副主編）

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了《中國史敘論》，這是他原本打算撰寫的中國通史的導言部分。在這篇「敘論」中，他把整個中國歷史劃分為「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和「世界之中國」三大階段。茲不避繁冗，將其要點轉錄如下：

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統一，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戰勝土著之蠻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據各要地，由酋長而變為封建。複次第兼併，力征無已時，卒乃由夏禹塗山之萬國，變為周初孟津之八百諸侯，又變而為春秋初年之五十餘國，又變而為戰國時代之七雄，卒至於一統。此實漢族自經營其內部之事，當時所涉者，唯苗種諸族而已。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統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瑣競爭最烈之時代也。又

中央集權制度，日就完整，君主專制政體全盛之時代也。其內部之主要者，由豪族之帝政變為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則匈奴種西藏種蒙古種通古斯種次第錯雜，與漢種競爭。而自形質上觀之，漢種常失敗，自精神上觀之，漢種常制勝。及此時代之末年，亞洲各種族漸向於合一之勢，為全體一致之運動，以對於外部大別之種族。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又君主專制政體漸就煙滅，而數千年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此時代今初萌芽，雖閱時甚短，而其內外之變動，實皆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別為一時代。（註一）

梁啟超從大處著眼，以中國地緣環境的逐次變遷作為其歷史分期的主要標識，同時，按照當代學者許倬雲的歸納，「也隱隱以封建、

註一：梁啟超：《中國史敘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年版。

帝制及立憲三種政體，作為三個時代主要政治形態。」（註二）也就是說，既著眼於中國外部的地緣處境，同時也兼顧內部的制度建設。需要指出的是，這裡的中國地緣環境的變遷與各個時期不同政體的嬗替之間，並不是簡單的並存關係，而是彼此高度互動和呼應的，甚至可以說，不同政體是對於變化了的地緣處境的應對方式。例如，在中國民族內部融合及認同尚未完成的時代（「中國之中國」），也許只能採取各地方高度自治，即封建藩的政體（封建）；在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往衝突的時代（「亞洲之中國」），實際上只有巨型帝國才能抵禦北方游牧民族頻繁的南下攻勢（帝制）；而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時代（「世界之中國」），只有全民參與的政治，才能實現全社會力量的充分整合與動員（立憲）。

梁啟超的歷史分期方式長期受到冷遇，一百餘年來被排斥在主流學界的視野之外。實際上，他的優點恰恰在於建立了一種「統一的中國史敘述」，即將從古到今的中國歷史概括為逐次放大的「三個中國」，將它們貫串為一個整體。特別重要的是，這種「統一的中國史敘述」使我們能夠從宏觀的歷史視野重新理解中國的「近代」。以所謂「半封建半殖民地」界定的中國「近代」常常游離於「中國通史」的整體敘述之外，因此，哪怕是煌煌十卷本的《中國通史》，居然也沒有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的篇幅；另一方面，即使把中國近代史「寫進」了中國通史，也似乎只是一種外在的拼接，在那裡，中國近代以來的問題、線索和邏輯都迥然異於以往的中國史。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近代」就仿佛是從一個偉大的整體之上脫落下來的殘缺部分。這種斷裂的歷史敘述當然有其客觀基礎，這就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入侵所造

成的中國文明史的創傷和斷裂，以及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對「傳統」的拒斥和批判。但是，由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文明從「崩潰」到「重建」的根本性轉折終於發生了。創傷漸漸癒合，斷裂正在修復，從而使我們能夠將近代以來「殘缺的」中國歷史同整體的中國歷史重新整合起來。在中國的綜合國力迅速成長的21世紀初葉，這種「統一的中國史敘述」的深遠歷史意義正日益凸顯。

在梁啟超寫作《中國史敘論》的時候，中國的近代尚未充分展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更遠未成型。因此，梁啟超當年所身處的與其說已是「世界之中國」確立的時代，毋寧說仍是「亞洲之中國」解體的時代——更不要說梁啟超所謂的「乾隆末年」了。實際上，從宏觀的歷史脈絡看，「世界之中國」的確立乃是發生在上述中國文明從崩潰到重建的轉捩點上，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今天，在梁氏歷史分期的基礎上，綜合後來的歷史經驗，我們可以嘗試做出新的歷史分期。如果刪繁就簡，把遠古僅僅作為「前史」，而以早期國家的建立即「文明史」的開端作為歷史敘述的正式起點，那麼，我們似乎也可以把夏禹（西元前21世紀初）、秦始皇（西元前221年）和毛澤東（西元1949年）分別設定為「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和「世界之中國」的三個起點。有趣的是，這「三個中國」都以一個「巨型工程」作為它們各自歷史的奠基禮式的開端：夏禹治水初步奠定了古代中原地區農業文明的基礎，並由此形成了早期國家政體；秦始皇的萬里長城確立了古代中華帝國的北方疆界，把農業文明同游牧民族區隔開來；而毛澤東時代構造的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現代工業體系，則不僅為中國贏得了

註二：許倬雲：《歷史分光鏡》，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頁。許倬雲是為數很少的對梁氏的分期給予重視的歷史學家之一。

國家安全，取得了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立身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構成了其未來發展的前提。如果這「三個中國」構成了長時段的歷史文本中的巨型詩篇，那麼夏禹、秦始皇、毛澤東便分別是其三個頭韻！

## 二

從「中國之中國」到「亞洲之中國」，以及從「亞洲之中國」到「世界之中國」，中國歷史經歷了兩次斷裂，或者說，兩次轉型，這就是春秋戰國時期（西元前770-221年）和近代時期（1840-1949年）。（註三）應當說，構成這兩次轉型主要內容的並不僅僅是長期的戰亂和割據，因為長期戰亂和割據幾乎也是中國歷史上每一次王朝週期末尾時的常見現象。實際上，正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激烈變遷才標識了這兩次轉型的根本特徵。例如，眾所周知，第一次轉型就是以血緣宗法為基礎的西周封建制土崩瓦解，而轉為皇權—官僚集團的中央集權制，同時伴以思想領域內的諸子百家爭鳴。第二次則是君主專制政體宣告結束，而讓位於迄今仍未定型的共和、民主或憲政制度，同時，自晚清以來思想界風雲激蕩，直至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仍論爭不休。正如直到漢武帝時期，中國歷史的第一次轉型在政治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領域才真正完成，而今天，儘管「世界之中國」的時代已經確立，而我們所經

歷的第二次轉型卻仍未徹底結束。

那麼，中國歷史上的這兩次轉型是孤立和偶然的嗎？換句話說，它們與更為廣闊的世界史是否相關？或者說，中國史與世界史是什麼關係？中國史能否被整合進世界史？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在前人基礎上曾提出著名的「軸心時代」（Axial period）概念，認為在西元前500年左右或西元前800年至200年的時期內——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這一時期。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像中國一樣，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懷疑主義、唯物主義、詭辯派和虛無主義的全部範圍的哲學可能性。伊朗的瑣羅亞斯德傳授一種挑戰性的觀點，認為人世生活就是一場善與惡的鬥爭。在巴勒斯坦，從以利亞經由以賽亞和耶利米到以賽亞第二，先知們紛紛湧現。希臘賢哲如雲，其中有荷馬，哲學家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許多悲劇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註四）

就是說，從中國到印度到西方，這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在精神上的覺悟、突破和飛躍發生在同一時期。與此同時，在現實政治領域，則是戰亂、擴張和征伐，是一座座城邦和

註三：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稍後，夏曾祐於1902年完成了《中國歷史教科書》（1933年改名《中國古代史》，由商務印書館列入大學叢書出版）。其中，關於中國歷史分期問題，他認為：「中國之史，可分為三期。自草昧以至週末，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為近古之世。」（《中國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頁）似乎不過是沿襲了當時日本學者流行的觀點。但在具體論述中，夏曾祐一方面指出「中國五千年之歷史，以戰國為古今之大界」（第164頁），另一方面又指出「道光以後，與天下相見，數十年來，乃駸駸有戰國之勢」（第10頁）。以戰國和晚清為中國歷史的分期界線，頗有見地。

註四：卡爾·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雄、俞新天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頁。該書德文原版問世於1949年。

一個個地方小國被消滅和兼併。這種精神的和政治的急劇變遷構成了人類文明史的第一次大轉折。結果，「在中國（秦始皇帝）、印度（孔雀王朝）和西方（希臘帝國和羅馬帝國），幾乎同時興起了主要靠征服起家的強大帝國。」（註五）

在不同文明區的意識形態領域和政治軍事領域，幾乎同時出現了相似的精神事件和政治事件。這說明，即使是在各文明區彼此隔絕的古代，也存在著某種整體的世界史，其不同部分彼此之間有著深層的關聯。那麼，這種「同時性」的根源究竟是什麼？或者說，這種「深層關聯」的內涵和基礎究竟是什麼？雅斯貝斯沒有給出解答。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古代世界，就會發現，在雅斯貝斯所說的「軸心時代」稍前或同時，還有一種構成各文明之基礎的事件被各種版本的歷史書籍所不斷記載，這就是「鐵器」的傳播：大約西元前1200年，位於中東的赫梯帝國滅亡後，冶鐵技術從那裡向四周漸漸傳播開來。鐵器傳播到印度大約是西元前800年，到中歐是西元前750年，到中國是西元前600年。鐵器在各地幾乎立刻使用於軍事目的，從而極大地加劇了當時戰爭的規模和烈度。而且，鐵器應用於生產，也迅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當鋤、斧、犁等農具同武器一樣，也能

用鐵來製造時，立即產生了深遠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影響。」（註六）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正是鐵器的傳播和使用構成了世界史上的「軸心時代」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轉型的物質基礎呢？也許，無論是精神上的突破，還是統一帝國的建立，都是各文明區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領域對於「鐵器時代」的回應方式？

中國歷史的第一次轉型，即春秋戰國時期對應於世界史上的「軸心時代」，這個「軸心時代」只發生在古代文明的幾個核心地區，如西方、印度和中國，其他部分地區則接受了上述核心地區的文明成果，否則，便被甩出了世界史的主流進程之外，如美洲、澳洲和黑非洲。（註七）與此相對照，中國歷史的第二次轉型對應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時代，這個體系無遠弗界，任何國家和民族只要尚未滅絕，均被「拖進」了這個體系。這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註八）

註五：同上書，第12頁。

註六：L.S.斯塔夫·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頁。中國使用鐵器的時間應更早，春秋（西元前770-475年）時大多數諸侯國已有小中型冶鐵工場。到戰國（西元前475-221年）中期，冶鐵業已成為最重要的手工業部門之一，齊國臨淄的冶鐵遺址面積竟達40多萬平方米。

註七：雅斯貝斯：「生活在軸心期三個地區以外的人們，要麼和這三個精神輻射中心保持隔絕，要麼與其中一個開始接觸；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們被拖進歷史。」（《歷史的起源與目標》，第14頁）

註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頁。當然，軍事征服仍然是這一切的前提條件。



自1500年地理大發現以來，歐洲主要通過工業革命取得了世界霸權，逐步建立了一個囊括全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也使中國結束了「亞洲之中國」即作為古代東亞朝貢體系之中心的時代，而向「世界之中國」的時代過渡。如果說，世界史上第一個「軸心時代」或第一次大轉折的物質基礎是鐵器的傳播和使用，那麼，我們現在則面臨第二個「軸心時代」或第二次大轉折，其物質基礎正是現代工業體系的建立。

### 三

從「亞洲之中國」過渡到「世界之中國」，應當在這個意義上理解中國近代以來的一切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心理和文化現象。以這種新的眼光反觀歷史，甚至二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也常常呈現出「近代」的面貌。例如，在我們所關注的意識形態領域，從晚清到五四，再到中國革命時期，出現了以進化論和階級學說為理論基礎的反傳統主義思潮。作為歷史轉型期的思想，無獨有偶，在戰國時代，同樣可以見到這種反傳統主義的「前身」。例如以法家為代表，所謂「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商君書繆斲k篇》）這種厚今薄古的思想出現在戰國時代，至秦始皇時期，甚至發展到「以古非今者族」（《史記·秦始皇本紀》），即以暴政強力推行「歷史進步觀」的地步，從而根本區別於以「尚古」為特徵的、在後世長期佔據主流的儒學保守主義。與此相聯繫，甚至歷史分期的觀念也在戰國時代首次出現了。像「上古」、「中古」、「近古」、「上世」、「中世」等歷史分期概念，屢見於《商

君書》、《韓非子》、《周易·系辭》等戰國文獻，並被梁啟超時代的中國和日本學者廣泛採用，以轉譯西方歷史學的相關範疇。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只有歷史發生斷裂，或者說，發生急劇變遷的時代，才会有「歷史」，才會產生同以往時代在觀念上區隔開來的需要，歷史分期的概念範疇才會應運而生。

我們把1949年確定為近代以來中國文明從崩潰到重建的轉捩點。但實際上，如上所述，從「亞洲之中國」到「世界之中國」的過渡並未徹底完成，我們目前仍處在轉型過程中。這種轉型體現在各個方面、各個領域，並且依據各個方面和領域的特殊情況，又可以分解為不同的演變階段。本書將選擇一系列主題作為特定的觀察角度，對這一巨大歷史轉型過程的各個側面進行描述和分析，這些主題包括：第一，「反傳統話語的根源」，將探究20世紀中國反傳統主義思想在政治、軍事和經濟領域的深層原因，並為理解中國近代歷史轉型的各個側面提供一個分析的基礎；第二，「知識份子與革命」，討論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身份變遷和激進化過程，分析這個階層的不同價值取向對於中國革命的正反兩方面作用；第三，「家的解體與恢復」，以家庭為中心，透視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的崩潰、潛隱和重建，討論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關係，特別是家庭對於中國社會及其轉型的社會保障和心理保障作用；第四，「毛澤東時代的『身體』」，將集中於個人，論述在近代轉型過程中身體、性別、欲望和美感的演變，並對正在展開的消費社會進行理論和歷史的反思；第五，「九十年代的思想」，在分別討論了階層、家庭和個人之後，以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建立為中心，評論9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野和變遷，並對中國轉型期的未來趨向做一展望。◎

原載於《蘋果日報》，  
七月二日。

# 香港今日有雷暴

■周良沛



## 一、天氣預報：香港今日有雷暴 維港上空，萬里無雲

一早，電視、報紙、地鐵車廂裡的電子快訊之熒光屏上都預告：香港今日有雷暴。

本來，夏日雷暴，港人習以為常。可是，這是「七一」的公眾假日，真怕它來掃興。然而，天之酷熱，之濕悶，都說是多年少有，真願有場暴雨清涼清涼空氣。何況，已經不是在

國內，在港臺，早就嚷著香港「七一」有百萬人遊行的先頭「雷暴」。用港話說，「舊（頭）年五十萬，今年翻一翻」。真像京戲的開場鑼鼓，戲沒上場，已經敲得震耳欲聾，不論相出將入，或是將出相入的表演，必然不同凡響。為此，各種各樣的說法，「炒」得熱鬧非凡，全球熱傳。說的，各自懷著不同的心情在說著；聽的，各自懷著不同的心情在聽著。「七

」的香港，世人關注。可以說，她是該歡快的，香港回歸七周年的紀念日；卻又是憂鬱的，是面臨百萬人遊行之陰影的日子。此時此刻，平日習以為常的用語，聽得人也會敏感、象徵化了，例如早上天氣預報中的「雷暴」二字。為此，它對我有份不該有的敏感，又是必然的不安。

本來對我毫不陌生的香港，卻又對她好奇、不安地陌生了。

頭天，朋友們為這天「公眾假日」個人活動的安排征詢意見：

「周（先）生，你想參觀駐港部隊軍營，還是看遊行？」

「都不放過！」

「你累得過來嗎？」

「不是一個上午，一個下午，正好接上茬！」

翌晨，想避過天熱人熱，人流車流的高峰，天很亮了，卻還有點沒有陽光的朦朧，雖然有點驟然走出室內冷氣的悶熱，海上的波浪又送來微微的清風。集合地點，正是上環臨近維多利亞港的街市，海空，萬裡無雲，隔道水波不興的海灣，再看對岸九龍那些在高樓之中再向雲天高聳，樓形規範得如幾何圖形，牆面以現代建材、塗料不知在閃光，還是幽暗在它灰色中的現代建築，我才看到真正的港九。市內的高樓大廈，在內地早不稀罕了，膨脹的人口也擠得比這裡熱鬧。然而，從這香港島望去，面前是海，有海的遼闊，能避風的港灣，又沒波濤的洶湧，岸上因海繁榮的，聳立的氣派、壯觀的大廈，也氣派出香港的風度。晚睡的都市，不夜的城，此時，街上行人無幾，車輛零落，來去寂寞。高樓在晨光中，已不像在霓虹中閃爍得五顏六色。她也像海上徐徐飄來的清風，少了份熙熙攘攘的熱鬧，少了份紅燈綠洒的紅綠，樸素、清新、寧靜、安祥。這個對我一點也不陌生的城市，頭次見她洗去鉛

華，清朗于晨光中寧靜的祥和，很難相信，今日會有雷暴將至。

## 二、紫荊廣場的升旗儀式險遭未遂的衝擊

### 國旗輝煌赤柱軍營

我們要去的軍營，在赤柱半島，是香港半島中的半島。車窗外，海空無雲，碧水無垠。海岸的坡地上，車道不直，欠平，坡級的綠叢中，民居、別墅，乃至監獄錯落，間或也有從百尺穀底突出矗立於路面的大廈，真是現代的郊野。

營區，在這曲徑通幽之處。由此，我想到一位在九龍塘浸會大學聯福道校區的教授，說他隔條馬路的對門，就是一座軍營。港九的市面上看不到一個駐港部隊的官兵，他好理解，可是，隔路相鄰的軍營，多少天，多少月，都聽不到裡面任何聲音，對面的樓，除廊道外樓梯上下電燈常明，這邊也看得清清楚楚之外，房裡的窗口，總是漆黑。長夜無燈，他無法想象那些官兵在做什麼，怎樣生活。想來，真是神秘兮兮，恰似這曲徑通幽之所在的「幽」境。然而，原來英軍的赤柱軍營，駐港部隊接收後並未翻修、改建，也沒什麼比內地營房更「現代」之處。對於我這行伍出身的老兵，它既有幾分軍營的親切，也有幾分陌生。如今的兵，尤其是這駐港部隊的兵，首先全是有較高文化程度的年輕人，個頭都在一米八上下，身材、五官、氣質，在我眼裡，個個都比那些頻頻上鏡的明星、模特要「帥」氣得多。一進大門，一排士兵指揮車流左右揮動戴著白手套的雙手，如放飛一隻只振翅欲飛的白鴿；那接待、講解的官兵之微笑的真誠，對我們老人，真像見兒孫繞在膝前般的安慰；他們現場做的小菜、糕點，對於全是美食家的港人，可以悠然品出道不盡的情致；書畫室他們揮毫題書的風流，恍惚眼前不在軍營。然而，他們一個個

確實是兵，是帶槍的人。今日，他們所用的手槍、衝鋒槍、機槍，還有手攜的、輕型的反坦克火箭，全擺在室外球場的桌子上，任何一位前來的參觀者，都可以自由地拿在手上琢磨，或瞄準方向扣動彈槽無彈的板機，再向一旁的官兵詢問它的性能與使用方法。港人大多數對警匪片太熟悉，有的已是他們消遣的文化夥伴。影視中真槍真刀幹起來的「刺激」，也能緩解，或振奮生活壓力太大的疲憊。若非影視的道具，用起它來，是會流血、死人的。此刻，它在那些好奇的中小學生，也在那些生活得很艱辛的中年人，還有歷經滄桑、兩鬢斑白的老人手上，卻像兒童玩具似的，在他們各自的手上玩著。和平的日子，酷熱的陽光也是和平的，若為防務和安全，這可以當玩具耍的，是武器，是可以使人流血，致命的。此刻，它在這些老、少爺兒們的手上像兒童玩具一樣的玩著，也玩得他們在這些「玩具」前，全成了一夥老老小小的「兒童」。武器與和平的辯證法，此時是不用任何說教地「玩」得一個個開心透了。一切，都太新鮮、太新奇，可天太熱了，人也太多了，看得，玩得披身大汗也玩不過來。室內有冷氣，是內地營房所不及的。開放可以參觀內務的官兵宿舍，是惟一可以找到的避暑地，可人流不休，無法久留。於是，大家都擁到一塊大場地的四周之防風林下。場上有好幾個球場、操場，還有閱兵台，按傳統，該稱「校場」。場上的一角雖有足球賽，去看的人並不多，多坐在樹蔭下喝飲料、聊天，涼快涼快的等待下面的重點節目。我前面兩位元在袖上貼有社團標誌之紙貼的老太太，興致蠻高地正對著兩頁社團印發的歌譜，我一眼瞥去，清清楚楚。一首是《歌唱二郎山》，一首是你愛我愛得要死，我愛你愛得要命的情歌。我想，前者是為回歸後瞭解內地的傳統，後者是為港九的時尚，社區文化的選擇，同樣新潮。兩個老太太並不動情，一手在膝頭打著拍

子，可以說是極其認真，乃至刻苦地在學和練唱。我正無事可幹，很自然地跟著哼哼，也為熟悉它而流暢地唱了兩句，那個頭髮全白了的老太太回頭瞥我一眼：「你也會唱？」「我五十年前去過二郎山，在修築康藏公路的工地呆過！」他呆呆地，不解地看著我：「你說的，我不懂！」她搖搖頭，又不以為然地掉過頭去了。她是不會懂的，殖民教育讓他們對歷史和當代的許多問題，不是瞞著不說，就是扭曲了人說。一條康藏公路，正面，負面，都當不了大事說。今天將這首與它有關的歌，和最刺激的「愛得要死」合在一起唱，還是由這麼兩位老太太在頂認真的唱，真是港九很特殊的文化現象。「二郎山」也讓她慢慢瞭解，慢慢唱吧！

我們隨地而坐地等著十一點五十分的升旗儀式時，信訊時代敏感、快捷發出的資訊信號叫我坐立不安了。早八點特區政府在紫荊廣場有三千多嘉賓出席的慶回歸七周年的升旗儀式，有四架掛有國旗、區旗的直升飛機飛越廣場上空，維多利亞港的海面消防船如噴泉噴水時，「四五行動」成員，包括「長毛」梁國雄，「長毛女」雷玉蓮及古思堯等十多人，抬了一個兩側寫著「高度自治入上為安」、「香港一國兩制千古」的小型木制棺材模型沿途叫喊，要去衝擊紫荊廣場的升旗儀式。途中「多次與警員發生碰撞，擾攘不休，情況甚為混亂」，等他們到達灣仔會議道示威時，典禮已完畢。隨後，「長毛」燒毀宣讀完了的《聲明》並要點燃棺材模型，才被警員勸止而散。這「香港一國兩制千古」八個字，無疑是想給「一國兩制」掘墓。報上還刊出過五十歲的電腦繪圖員俞敏儀的照片，那是個吃得很肥的女士，若照她不滿教育改革「提倡母語教學簡直多餘」的話去改，只能廢除漢語。任何一個民族，若無自己的母語，還有她能獨立存在的文化基因麼？對有民族感情者，有些報刊以大標題稱其為「親中派」者，儼然以一個有他外交

對等地位者的口吻自居，在它背後，讓人可想的東西真是太多。此時此情，香港今日又在軍營升旗，在場的可能有百樣心思，心潮卻一樣難平。

這裡雖然沒有直升飛機飛過上空，可三軍儀仗隊在軍樂聲中由遠而近，向前推來人壯神威的隊列愈近愈高大，越來越清晰時，軍樂的銅管上陽光閃耀，它噴出樂音強烈的節奏，起落儀仗鏗亮的靴子落地錚錚有聲，周圍的一切，在軍人的步子所邁出氣氛之嚴肅而莊重、威武。人們由於想看個清楚，而到欽敬的致意，全體起立了。看來，思想為它非物化的無形，表露出來必然成為一種形式，形式煥發出它內核之莊重、崇高而輝煌時，又凝重於回歸的思想。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升得很高很高，在悶熱得窒息的正午，迎著高天的風屹立，似在挺進地挺立而飄揚，隨之，大家都找到一個、一致仰視的視點，真是眾望之所歸。

哦，旗正飄飄。

心熱了，感情的高溫在蒸餾自身而淨化。這些官兵再次接受港人的檢閱時，我已經不僅從他們的微笑像看到自己孩子似的親切。一個個一身迷彩服，似在戰地，在叢林，不是鋼盔，卻和它一般模樣，是用迷彩服布料所縫貼在看以很原重的頭盔。一個個肩跨手握亮得發藍的衝鋒槍，腳踏一雙看來粗笨所突出它厚重感的皮靴，上下和視覺的比重渾然一體。不是微笑，是嚴肅、莊重、逼人的陽剛之氣，對於男女比例嚴重失調，陰盛陽衰時，一個個都像二戰勝利後許多地區視同尊神般所樹起的雕像。隊列訓練和兵器操作表演後，緊急出動的演練，看得人都傻眼了。一聲口令，場上的官兵突然消失，幾輛軍用卡車緊迫而來，那轉眼不見的官兵，一眨眼功夫，快速，閃電式地，又轉眼之間全副武裝地出現了。參觀內務，看到那些疊得非常整齊、規範、劃一、豆腐乾式的枕被，叫平日為生活中各式的多樣，多元，

並自由得隨意，又隨意到懶散的市民，為這單得整齊、劃一的「豆腐乾」所構成幾何圖形的藝術方塊，早已成了他背上的背包。他們爭先又有序地跳上那本來就沒熄火的卡車、大車也隨即加大了馬力，風馳電掣，隆隆地飛奔著去執行任務。

車聲隆隆，掌聲震天，人們「呵呵——呵」地，如《聖經》所說，諸天在歡呼！為這半島有保障的安全防務在歡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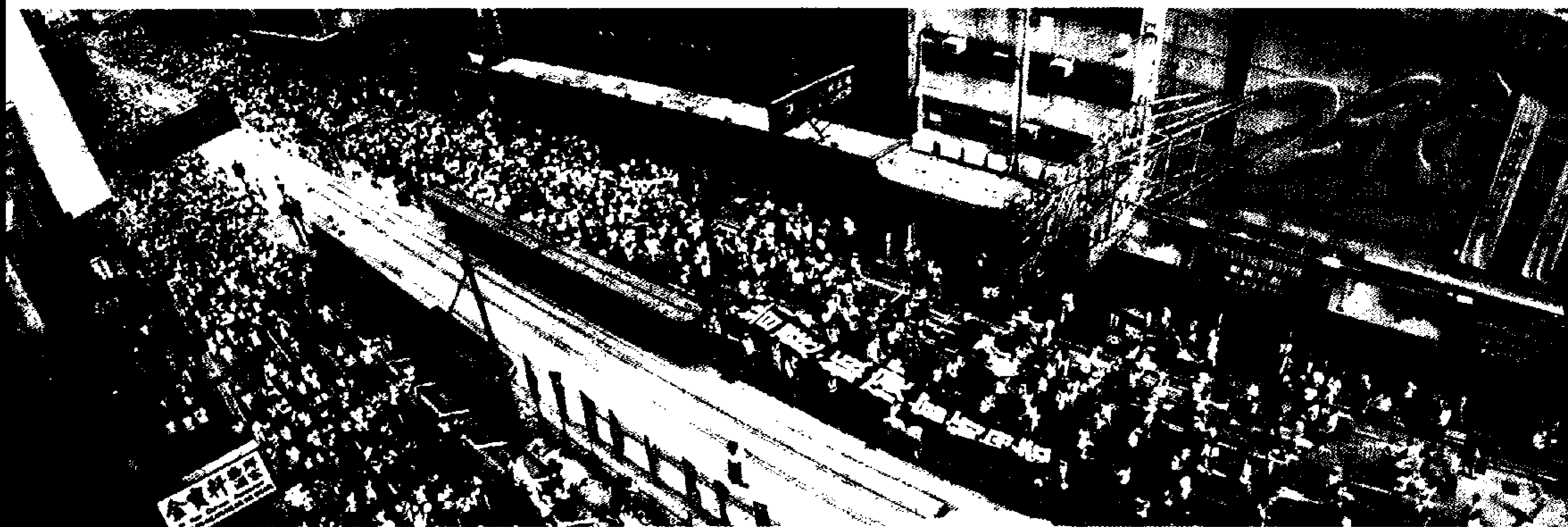
我想起過去有首朗誦表演的長詩，臺上的演員在近似音響效果的鼓音之隆隆聲中，一個接一個，一聲連一聲，相互交替、複和、混聲、疊加，高聲如雷：「我是風」，「我是雷」……。這些官兵，也是風，也是雷啊。我們鄉裡人稱「雷」為「雷公」，是懲惡的，善良的百姓，總信作了惡會遭雷劈！它不同於天氣預報中的「雷暴」之「雷」吧！

對於飲食細膩到厭食，生活平靜到無聊，或遠憂到平靜中的隱患，安定中的不安定所賴於的強力之防務，軍營此時已不再像他想著的，神秘於聯福道那不見燈亮的窗戶，而是公開亮相在面前了，是面紗揭開的驚喜，是為之所來，所見，所思而結的果，各自的豐收，已成歸途轉動車輪的歡聲笑語。有人惋惜自己的朋友沒能回來，錯失良機。

「誰叫他磨磨蹭蹭，興致一來，臨時要票，替他去哪裡弄呀？」

「票是限量的發，排在前的領到了，後頭的趕來也沒用，總會有先有後，有能領到的，就有領不到的！你擔心他沒來愁他沒處去呀，他說了，這裡來不了，他就去遊行！」

好一個好自由的香港人吶，他可以自由得自己無需什麼思想、作為規則規範自己的行動方式，不僅愛怎麼就怎麼，也可以不明白所以如此之所為。他如果就為沒有領到那張參觀軍營的票，賭氣參加下午的遊行，那麼，軍營多多開放，多發放門票，密切了軍民關係，絕對



軒尼詩道上的遊行隊伍，既壯觀，每排並不超過二十人。原載於《蘋果日報》，七月二日。

是大人的好事。可上午與下午的活動，不言而喻，內容、性質完全不同，乃至有些說不清的問題，就為賭氣，怎麼協調自己的心情呢？

唉，何須杞人憂天啊！我自己不是趕了上午又趕下午麼？除了職業的天性，總願以親身的體察來判斷眾說紛紜的故事，自己思緒紛紜，不也是一時難說明白的麼？

### 三、遊行人數的秘密和秘密公開的真相

因為事先已被放出遊行人數達百萬的空氣所困擾，內地《參考消息》上的外電消息也是這麼說的。至於「政府調查指四分（之）一人會上街，」確實是令人「十分驚訝的高」（註一），六百萬人的香港，那四分之一，已不至百萬了。自己年過古稀，怕中途體力不支，或遇到自己招架不住的陣狀，故而約了年輕的小饒同行。他年輕，已在負責一家刊物，年輕而不嫩。雖沒專門的採訪任務，卻有與我相近的職業本性，此行，還不完全是捨命陪君子，加以他有頭年看遊行的經驗，叫我走得心裡踏實多了。

從地鐵本該人不多的起點站上環上車，雖然擠上了車，可那麼多年輕人從檢票閘一過，就跑起來了，港人稱之「升降機」的電梯也不

是搭著扶手順著走，而是幾步當一步，在正當運轉的電梯上大踏步、跳躍式的，也不管別的橫街直闖了。平日走進地鐵感到比外頭陰涼多了的涼快，哪怕上下班人流高峰，進進出出雖有匆匆趕路的緊張，也是井然有序，此刻，卻突然為他們如此這般，而感到它不再陰涼，倒是情緒為此的悶燥，以及打破了原有秩序的紊亂。我有些緊張了。車一啟動，車廂裡電子螢光屏上以「天地有正氣，真理擁抱聲音」的「雷霆881商業一台」已顯示：遊行隊伍已從原定的下午三時提前出動，因此擁擠在灣仔、銅鑼灣地鐵的人員走不出去，故而這兩站不停車。這怎麼辦呢？小饒說，它在哪一站停，我們就在哪一站下，好在每一站相隔的路不長，也不會有計程車，我們辛苦些，步行往回轉好了。可是，為什麼遊行提前了呢？若說組織這一活動的，簡稱「民陣」的「民間人權陣線」是非政治的，誰也難相信。這麼一個大型、且是政治性的遊行，事先沒有任何跡象而改變行動計劃，不會是無緣無故的吧。小饒說，香港不是北京，一百萬人，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一站，百萬人既輝煌了廣場，又閃開它的寬闊，《蘋果日報》頭天頭版頭條以大標題相約《維園見》之「維園」，是香港最大，不收門票

的公園，它有六個球場，爆滿，也只能容五六萬人。每次遊行，裡面人滿，就得從前門外的高士威道輸送，前面的往外走，後頭的跟著往上續，幾十萬，一百萬，都得這樣。維園只能部份的集結、周轉，這倒是個辦法。「龍頭」（先頭）提前走動，自然是維園擠不下了的應急措施。對於看熱鬧的人，正是有熱鬧可看。

太意外了，到銅鑼灣，車門開了，車停了一陣，大家從原先準備在此下不了車的打算中突然清醒過來，人流狂潮一般往外湧。那些小夥子又是連走帶跑地橫街直闖的往前沖了，我避開他們，走出車廂再回頭一看，裡面幾乎全空了，沒有幾個人是往前再走的乘客。

是車門太窄，多兩個人同時進出就很擠，出了地鐵，上了大街，為遊行封了的路，沒有車兩，也不見摩肩接踵的往來，反而顯得特別寬敞了。

「今天怎麼啦？去年這裡是水泄不通呀！」

「不是提前行動了嘛？前面的都走了，我們沒趕上趟！」

這遊行人數統計，事後看，大有學問。七月二日，《蘋果日報》的《7·1大遊行專輯》，一張對開報紙的兩面隻對開印了兩張很能顯示遊行氣勢的兩張照片。報頭只印了兩行字：《中國人的驕傲 / 香港53萬人上街》，噴發編者傾向之熱情，是以客觀求公正的報業所少有的。（註二）五日，《星島日報》的《港聞》版《學者指7·1遊行不足20萬人》。按語道：「民間人權陣線公佈七一大遊行人數為五十三萬人，再受質疑。港大統計精算學系高級講師葉兆輝在本報來論，指出遊行人數介乎十四萬至十九萬，不超過二十萬人，並指出民陣的方法除了重復計算了最後一程人數外，以最高密度即十七萬人作計算基礎也有謬誤。」（註三）接著，理工大學客座老師李偉鵬，利用「太空科技衛星圖片分析軟體」之所顯示的，也告之媒體。由於「不斷有學者質疑」這

數位及點算方法。民陣發言人之一的孔令瑜出席一個論壇後表示：「民陣公佈的數位絕對不是權威，歡迎各界發表意見及討論。」另一發言人胡露茜則表示：「現時沒有一個絕對正確的計算方法，故不會另行計算遊行數目。」副發言人譚駿賢說：「現時點數人數的方法，是在有限資源下的惟一方法，他承認，在計算時沒有考慮密度問題。」「倘若數位的差距太大時，會再作公佈」。從幾位發言人並不完全相同的口吻看，將隊列二三十人一排翻倍的以六十人一排計，不該是難免的失誤。幾乎可以看作「犯上小學數位錯誤」尤其是質疑不斷後，孔令瑜以威脅口吻說：「那些學者說話應該負責任，他們說只有二十萬人，怎對得起參加遊行的市民！」（註四）則太霸道。就是不是五十三萬，而是二十萬人，他們又都是奔著你去遊行的麼？這點，誰都不要自作多情，自欺欺人了。拼命膨脹、誇大數位，無非為自己樹碑。誇口「百萬」，別人也不是那麼好「蒙」，但死撐著說五十三萬，不是他等所套用的「民意」比頭年更高漲了麼？不然，怎麼向當局示威呢？可是再往下說，只有十來萬，同樣顯得情緒化，是為另一種需要所說，這樣的話說多了，別人就什麼都不信你了！因為，我畢竟在現場看過那種陣狀。

#### 四、遊行的「龍頭」像要上任的新官之三把火

出維園，從高士威道的過街天橋看，由於高度有限，基本也像在行列中平面看到前面的重重背影，但它畢竟又高了個兩三公尺，視線又開闊些，那些全穿白T恤的，也是黑壓壓的一片。街邊兩側插得很密的，福建同鄉會慶回歸七周年的旗幟，那也不是幾十，幾百，是片旗海，是道風景，可惜，這時誰也不會去看旗上的印字，倒為遊行隊伍壯威增色了。這道街，畢竟不是九龍尖沙咀的彌頓道，畢直一

條，時有彎曲，人流折到視力所不及處，更有人海茫茫之感，加上左側還有條東西向的橫道沒有封閉，不知是出門擠來看熱鬧的，還是從隊列裡跑出來找陰涼的，也是滿滿的，如同跟那南北向的隊伍所銜接起來的又一路人馬。已經午後的四五點了，維園裡的人，基本出來完了，隊伍還像不會移動的原地不動，有的已蹲下來坐在原地。高樓東西向的陰影下自然可以涼快些，何況擺冷飲的攤檔還以支援遊行、折扣優惠在叫賣，更是生意多多，人群蜂擁。《蘋果日報》凌樹輝航拍金鐘道上之廣角俯視的人流，張家駿拍的軒尼詩道上《浪接浪的遊行人士》，後者，已經明顯看出人群的疏朗，每排人數不僅沒有達到六十，二三十個人也成問題。但那是十裡長街上一條長龍似的人流，宏觀看，無疑十分壯闊、壯觀。

那有「鐵蝴蝶」之稱的「前政府高官」任關佩英；那有人見了不客氣地說：「又出黎做騷」，也被說成「轉軚」作「從運動最前線退下來的準備」之「低調不帶口號」的劉千石；還有到美國參議員聽證會求助幫他干涉香港內政而早為國人所知的李柱銘，顯然也是配合這回遊行，哪條路上也可以從彎道轉角的欄杆靠人行道的一面，看到他與楊森接受法律諮詢的大幅廣告照片，即便被路人，可能是頑童在上面塗了個墨黑的大眼眶，或是摳去上面的雙眼，也是西服領帶，一表人才的標準照。至於原來聲言要來遊行的演藝人岑建勳，記者知道他將「獲發回鄉證」而在遊行隊伍找不到，我就更看不到這位先生了。莫說原本素不相識，若無報紙「炒」作此事，見了面若只說他的名字，我也不知他是誰。此時難找他，是他更務實了。

至於那些出語驚人的大幅標語，無緣在非龍頭隊列中見到。它製作的精緻，大幅之巨型，絕非這遊行隊伍中絕大多數為個人行為者之能力所能及的，你要沒有一派一黨，作

好了送給你，你也沒那個氣力抬得它出來，還要上街遊行的。它顯然是有組織的人士為先頭的「龍頭」壯威而排頭亮相的，像要上任的新官之三把火。早上衝擊紫荊廣場未成的古思堯，蹲在一個帶站轆的大木籠裡，寫上早上棺材模型上相似的咒語，加上「奄嘛呢叭咪牛」的紅字寫在黃標上，由一個形似北方的農村老漢，許多人說，他是在多種遊行的場合都可看到的一個人物，用繩索像拉纖似地拖著它走，無疑是遊行中的一大噱頭，引人注目。那些也是香港的名人、政要的照片或漫畫，還有人頭模型，均被冠以「港奸」的惡名、和帶有人身攻擊的詞語在上面亂塗亂畫，不能不叫我大吃一驚。去年，我就為寫過一篇絲毫不涉及個人，完全針對作品批評了幾首所謂「獲獎」的長短句而被作者以損壞名譽之「罪」告上法庭，人居然在初審中勝訴。我到中級法院反訴，整整折騰了一年才改判。但折騰得人已心力交瘁，患場重病。這些疾呼「民主」者，不知是否知曉，當代無論哪個民主國家，其「民主」都是在「法治」的原則下所有的。若依「法治」原則，這些被污蔑為「港奸」者，以那些我再引用也可能犯有同罪之嫌的人身攻擊之言，若對簿公堂，定會百分之兩百敗訴，不送進赤柱監獄，也可以要他付出讓他破產的鉅額罰金。因為它造成的影響太大，已不是在幾百、幾千、幾萬人中可以消除的。這正是彰顯人權的民主，若人民所爭取的真正的民主又真正到手了，就不可能有他眼前為所欲為的「自由」了。

## 五、遊行隊伍是五花八門還是百花齊放

我是正三點趕到維園，「龍頭」早已上街風光。人流波湧，一路都是維持秩序的警員，他只讓你走在遊行隊伍裡慢慢往前蹭。靠小饒拿出工作證來予以通融，才走出臨時用紅白相





這是否算有人說的「中間路線」？原載於《東方日報》。

間的塑膠繩所扯起的隔離帶，得到一點自由的空間，可以前後走動。知道有政府飛行隊的直升機在遊行隊伍上空監察遊行而盤旋，但我只能偶爾聽到一點嗡嗡聲，也難分辨是機場的航班還是飛行隊的直升機，在高樓的峽穀仰望藍天，完全像井底之蛙。靠近隊伍兩側人行道旁的警員，包括他們共同執行任務的同事都有中暑的扶在一旁坐了下來，要見隊列有人倒下，就馬上跑去，幾個人不是抬，就是背，就是抱到附近的救護站。還在維園沒出門，我就看見幾起這樣的事。不知是怎麼統計的，公佈中暑的人數，這天已是六百多。警員自然得有應對各種變數的任務，但見他們不時攙老扶幼的，可以看出，他們還是盡力維護著遊行是和平遊行。有的報紙說到金鋪關門之事，真巧，我跟小饒從一家金鋪前過，幾位站在店門口既是無生意上門，也是出來看熱鬧的店員，忙著迎過來勸我們進去看看，說他們的貨，款式新，價錢公道。我對著店口沖出來的冷氣之氣浪猶豫了一陣，又忙著避開這份勸買的熱情跑開了。

這樣的日子，他開的又不是冷飲店，有再急的需要，誰也不會找這個時候來選金銀首飾。從這個意義講，老闆真該歇業，省下水電費，還可以給店員補假。但他照樣開門了，為這和平遊行創造了相應的氣氛，是該感謝他的。倒是有些人鋪，有人進去不是購物，而是避暑。大銀行的銀櫃前的堂面人，有的三五成群坐在地上，職員、保安也不來趕，比在超市、商場，還得走動或站著是更好的休息。就是灣仔天橋上，民主黨人在他們拉開的橫標後給橋下走過的人大聲「加油」打氣，跟著也有人上去掛上顯然是臨時應對，不像前者那麼大幅和經過精心製作的，反對遊行的標語。並持手攜式的擴音器批評民主黨的李柱銘、司徒華等頭面人物。雙方針鋒相對，又各說各的。軒尼詩道兵器廠街的遊行路線附近，也有人不入隊列，頸上掛著一幅署名司徒華、李義光等等等等，寫著「要穩定，要民主，反對七一遊行」的橫標，他對著遊行而過的人，大聲疾呼，說要往政府總部評理，警員也未勸阻。「邊（哪）個

對香港有利就系（是）香港人，邊個對香港不利，就唔系（不是）香港人！」（註五）他聲音激昂動情。過他面前的也照走自己的，有的還點頭示意，報以微笑。要在臺灣大選期間，雙方說著說著，用他們的新聞用語，是會用起「股體語言」，手推身搽，或腳踢拳打，大打出手。相比，這裡還有「和平共處」的氣氛，釀出和平的芬芳。

然而，和平的氣氛絲毫也減不去問題的火藥味。聽說，事先有關方面曾勸阻不要提些「不恰當」的口號，但人家堅持要喊「還政於民」，否則，「組織的活躍性和自主性就會喪失」。（註六）隊列龍頭特別醒目的，以黑底白字約有十幾尺長的標語則挑戰性的舉起。回歸前，殖民時期，沒聽過今日那些自詡為「愛香港」者喊過這樣的口號。擺脫殖民統治的地區，原宗主國總得埋下些定時炸彈作他告別的禮物。印巴之間的克士米爾的衝突不休，總像患下拖得人難以安寧，難以診治的慢性症。香港回歸後的有些麻煩事，也是一時還沒能擺脫它的陰影。然而，回歸了，要它還政於「民」，那它肯定不是人民政權。不論是否同意這種判斷，從正，從負面看，問題都是一樣嚴重。在軒尼詩道，不知是利用原有的什麼建築，還是專為遊行製作或改建的，一個約有四五米高的平臺，我想得到，上面手持喇叭像戰爭時期在戰地喊話的那個人，肯定是個搞運動的名家，可惜不知其尊姓大名。由於隊伍慢走，近乎原地不動，他是滔滔不絕地對台下演講。很難聽全他說什麼。但有人注意到了，悄聲的在說：「還有人給他打扇子送茶呢？」這34°C的高溫，早已考驗出各自的身價，我這鄉巴佬看著有些人手裡像拿著個手電筒似的，在亮得刺眼的陽光下，還以為他們像抗戰時的馮玉祥白天打著燈籠去見蔣介石呢。經人指點，才明白，那是帶噴水的電動「風扇仔」，真是老天要熱，也苦不到有錢人。但比起這個站臺演講的，他

們還不到那個檔次，他自然該有為他打扇子送茶的。可能他太激動了，或是擴音的功能太敏感了，被他聲音熱情地響得「炸」機「炸」耳，反而什麼也沒聽清。這位先生很懂演講的藝術，每到自己認為重要的，或要別人特別注意之處，他就使勁把聲音儘量往高處挑而像重錘似的猛猛的落下，下面的人不論是否聽清他說了些什麼，也善意的回應，也像起哄似的，都「呵——呵呵」的鬧叫起來，濃濃的氣氛，對演講者，無疑是現場的鼓舞，很大的安慰。隨後，我聽清了再也忘不了的一句話：

「他們是改良主義，我們是要革命！」

「革命」！「革命」！少年時我為她所激勵而改變了一生的命運，為了推翻那個製造分裂，內戰不休地加害於民的政府，那個媚外喪權，挾洋自重而黨同伐異的大獨裁者。今日特區政府，不論多麼不足，也是那麼個政府麼？去年遊行，是為經濟下滑，今日經濟復蘇，又說「經濟的改善並不能『買斷』港人對特區管治下的不滿和對民主的訴求」，還說「派糖果沒有用了，因為香港人長大了」。（註七）聽著這麼說，「由於有人存心挑撥離間，令中央誤解港人不愛國，搞獨立」（註八）。想著也許都有誤會，致使問題更複雜了。然而，不是哪幾個人，你們出現在媒體前，在文宣的書畫中，都是大包大攬的，以這次遊行都團結在你們的口號、旗幟下白居，那麼，什麼什麼「京官」、「親中派」、「土共閉嘴」、「糞話」等等，與這和平遊行的文明很不相諧。拉出些還未成年的中學生對媒體說：「望推翻人人對普選概（這個）決定！」這又是為什麼？「人大」是全國最高的立法機構，當今世界，不論多麼「民主」的，西方國家，也無法擺脫它而講「民主」。「一國兩制」，首先是有「一國」，才可能談，和有「兩制」，它的權威若視為「糞」土，別的話也就很難，和無需往下說了。若像臺灣的街頭運動，視其為「語言暴力」，則可

對罵對打。而那些出面的、站臺的大人，會有他講話的「藝術」，有應對政府各種，也包括講話的謀略，為給自己說的話，作的事留有迴旋的餘地，推出些不懂事的孩子出來代言，以不負責任，這也太不人道，太殘酷了！

誰真能代表他們嗎？不，只能利用他們的天真於一時罷了。你真能「搞獨立」，你就試試，港人中的一般婦孺都會說，即使誰有三頭六臂，不用一兵一卒，斷他兩天水，兩天電，都得哭爹叫娘！何況「禽流感」一來，內地的活雞不來，雞商也要叫苦，就是寵物鳥暫停輸入，「雀仔街」的商戶就一直「吊鹽水」，也是形容靠輸液維持生命。想要權的，有的是，要當這個家，不易當啊！特區政府不尊「一國」，只聽你的，絕大多數港人，又答應嗎？

二十以下的十幾萬人，是六百萬港人的多少分之一呢？就是這十幾萬人，又是誰家的提線木偶？

不，絕非如此！

多處報導的，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瓜皮小帽，鳳冠霞披的准新郎、新娘的鄭先生和張小姐從金鐘太古廣場加入遊行隊伍，雖然他們回答記者說要「正視民意，體恤民情」，但那身穿戴在高溫下沒走幾步就汗透一身的禮服之刺激，確實很夠，也很合年輕人，尤其夠搞藝術策劃的鄭先生之情趣之「現代」的。那為么女生日帶著一家人參加遊行的林范彤先生之所說：「天氣好熱，但系好開心，因為好多人，好熱鬧！」（註九）我想，正是有不少人，以林先生相似的心態出來，才會推著嬰兒車，或牽著寵物狼狗，既有來看熱鬧的，也有嚇得鬼喊鬼叫的，同時循迴性地引來不知是在笑誰的笑聲，使這一遊行隊伍，並不像龍頭那麼嚴肅於他們的政見，而是帶著輕鬆的愉快，一路談笑，像我們鄉裡人去趕大集似的。

老外保羅(Paul Zimmerman)還請上港人同他合舉他那「FREE THE CROC! ——給

小鱷自由」的橫標。據說是小鱷由從元朗山貝河搬到嘉道理農場後吃得很少，願它回歸自然，老外冒熱遊行，是為他的「鱷道主義」。說他講那失去自由的小鱷是象徵港人，那是想象力太豐富的幻覺，也太意識形態化了。一支高呼「保護維港，停止填海——PROTECT THE HARBOUR STOP RECLAMATION」的隊伍，浩浩蕩蕩。有的說，它在遊行隊伍中所占的人數比例很重，我不敢這樣說。對於前後轉著看的旁觀者，凡涉及到具體數字，我只引用媒體已經公開的報導，不作個人評估。可是我可以說，即便人數不多，也不可低估它的力量。除了浩浩蕩蕩的氣勢，和他們昂揚的精神，還在於他們的環境保護意識，涉及每個港人的生存環境和品質，是排除生命所受之威脅的強力。填海，必然破壞生態。過去，港督是以填海賣地作為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特區政府也走不出這個怪圈麼？而那呼籲「還證於民」之「證」，乃是居港權的身份證。說它呼出「百萬」人的心聲，自然過於誇張，我想，香港不可能六個人中就有一個無證。但它確實涉及太多夫妻、父母與子女分居兩地或數地者的心靈深處之喜憂。可是，不論誰來主政，恐怕都只能有控制地，逐步分期地發「證」。當中，只要沒有腐敗受賄，或像臺灣的陳水扁，比起對其他地區的人士，對大陸新娘特別歧視，一再加長發證期限就很不錯了。香港只有那麼大點地方，不考慮它對人口的承受能力，出入人數完全自由化，也是對原有居民的極不負責。但是，出生率下降，是否又是那些呼籲「還證於民」者的福音呢？然而，由此中小學的生源減少而「縮班失業」的教師，連自己原來請來照顧家裡和孩子的非傭，也失業了。他們已經絕食抗議，遇到遊行，「超額教師」，當然上街。他們怪經濟下滑大家不願生孩子才失去生源。事實上，內地，尤其是經濟發達的大都會，「丁克家庭」猛增，而且至今

我還沒鬧明白，拒絕生育的年輕夫婦為什麼稱之「丁克家庭」。由此加速了社會的老齡化，也是國家之憂，他們不是養不起孩子，恰恰是中產化得太現代化，不願孩子「拖累」自己，女的怕生了孩子容易老，對社會，對自己，全不願負責任。它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為官者，都該考慮，本來，稍加留意，有些事就不算事了。如：歌星在紅磡體育場開演唱會，唱的，聽的，都高興了，超出了簽約所定的晚十一時半，請他補交管理費就行了，派出一張罰單來，歌星的發燒友還不上街麼？他不是在今日的香港嗎？再如，拓展署施工，打樁五個月，百姓的住房隨即出現多處裂痕，向警署和申訴專員公署投訴，沒有結果，他們怎不借此遊行發泄不滿？具體到要特區特首去過問誰家男女生不生孩子的事情，也不公平。說他是「傀儡」，那他的背後又是誰呢？尊「一國」者被你罵為「港奸」，那你後面又是誰呢？你既難於公開嚷叫推翻「一國」，又拚命將一切矛頭引向一國下的特區具體負責人，那不只是要取而代之的奪權之爭？他該不該讓權於你，我不知道，可拖著大家跟著窮折騰，沒勁，添亂。可惜，我沒遇到，就是遇到了，也不會認識的那位原為沒有領到參觀軍營的票而來遊行的先生，特首要知道了，看到了，不論怪不怪他，他又能怎樣呢？

這些人的訴求，各不相同，無非乘機搭車，借遊行作他宣泄的平臺擺了，能統計為哪一黨的人馬嗎？

進維園時，門口不遠就有人搖著一杆青天白日旗。有人說：「要在澳門，馬上有人過來勸阻，不聽，警察會來帶人！」我說：「這不是香港嘛，這裡更自由！」過去，逢雙十，九龍碼頭的圍欄，插滿了這樣的旗，從內地來，咋一看，恍如隔世。現在少到只有一杆，很不錯了。今天走在這裡，無論抄小路或選大道，不斷有人塞來宣傳品，五花八門，「多元」得

可以。宣傳法輪功的，從根本上講，也許跟那個什麼黨是一致的，但在這種場合，還是該有不同的身份認同。「雷霆881」，在地鐵只看它是「商業一台」，聽它在維園出口處一廣播，才知道「商業」只是它的另一重外衣。這些宣傳，看來，聽來，花花綠綠，大同小異，形似多元，卻太單一。這些宣傳品都作得很精緻，是肯花功夫，肯花錢的產品。有的單張漫畫、標語，用的是進口卡片紙，天熱，正好當扇子。有人塞來一張包裝精美的大碟，我也順手收下。對方趕忙捏著大碟的一邊：「多少隨意，可要捐錢羅！」這一來，我才湊近一看，上面除了幾首「民主歌曲」，多是一些「民主」「精英」的講話錄音。眉頭一蹙，只好說一聲：「你好好收起來吧，要錢我就不要了！」

這也是在香港的自由嘛！

自由哇，民主，民主哇，自由！

一位上身赤膊的壯漢，扛著一根竹杆挑起的大幅緞繡財神爺像。他赤膊，還披身大汗，遠遠看到褲腰都像泡在水裡一樣，他粗壯，財神爺都扛得他疲憊不堪，利用隊伍原地不動的空間就蹲坐在路上。有錢人為發了財謝祭財神，他扛著財神爺像，是窮瘋了吧，那看來被香燭熏過的緞繡，也都是從哪個廟裡拿來的。他到底是求神，還是靠遊行而求財呢？這也是鄉裡的遊神麼？組織遊行的，把他數點在自己麾下，準備怎麼滿足他的要求，予以何種政治許諾呢？

## 六、「您屁股大嗎？」這是問您還是問他？

年輕人舉起的大紙標，上面的大字是——

您老婆好嗎？

您個女親嗎？

您屁股大嗎？

人們看到它，無不發笑，我卻笑不起來。若說它是黑色幽默，不如更接近嬉皮士似的玩

世。這天幾乎把我撞倒的中學生，是營養過剩，胖得身材極不合比例而畸形的小女生。靠了拐杖站穩之後，我瞥了她一眼：

「細佬仔（小鬼），細心底（點）！」

她不服地昂起頭來：「我是『細佬仔』？」

「我七十幾了，我眼裡，你縱唔系（還不是）細佬？」

她隔一久，沈吟地點點頭，才想到我還沒說錯。有人見縫插針的插上來，想來是哪個媒體單位的：

「你為什麼要參加遊行呢？」

她像跟誰賭氣地噘著嘴：「我也要爭民主、自由哇！」

「你有什麼不『自由』嗎？」

「老爸老媽都不讓我打（遊戲）機，還有什麼自由？」

下面的話，我都不想聽下去了。

春天遇到在香港浸會大學客座的臺灣作家陳映真，他憂心忡忡地跟我說：

「這裡有的中小學生不知道到自己是中國人，只說自己是香港人嘅，這怎麼得了呀？若不是來香港親聞目睹，人家說給我聽，我也不會相信！」

他的心情，太好理解。同「台獨」的鬥爭，使他太懂得此中的利害。李登輝、陳水扁搞「台獨」都是從「文化台獨」下手，從中小學的課本上，就教育那些無邪的孩子拒絕民族和國家的認同。十幾年過去，他們都成了合法的選民了，人們才想到問題的嚴重。可這是香港呀，回歸七年了，怎麼還這樣呢？「五十年不變」，只是指「一國兩制」的原則，地球不停的轉，世上哪有不變的世事呢？再不變，也不能變回到殖民教育吧！《明報》刊出香港科技大學「EMBA」（工商管理碩士班）的一次調查記錄，二十九個學生問到中國首都在哪裡，竟有二十七個回答為「油麻地」、「官塘」、「北角」等等港九市內的地名，那兩位

# 您老婆好嗎？

# 您個女靚嗎？

# 您屁股大嗎？



「您屁股大嗎？」這是問您還是問他？  
原載於《東方日報》，七月二日。

的回答，也不是很確切、肯定。李政道的學生王向榮先生無法相信學校裡的學生會學成這個樣子。結果，他在自己教授的物理系一問，情況完全相同，只好歎氣搖頭。學生如此，是在做「您屁股大嗎」式的遊戲，還是接受英語教學而無知到capitan在母語中「首都」的基本概念呢？更甚者，是不久前「教統局」給學生們的「思考」題，如：中國的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照你對「民主」的認知，你認為這個人民共和國是民主國家嗎？請你以美國的三權分立加以對比……，叫學生如此的思考，是出題者早已代為「思考」好了，叫學生如此「思考」之所「思」，是要引往何處去「思」呢？不需要十幾年了，有的三五年後就是適

齡、合法的選民，那時，遊戲於「你屁股大嗎」的調侃，對他已太「小兒科」了，屆時他要遊戲政治時，其後果，今日在位的能說都沒責任麼？他們遊行「都是為了民主，青年人站出來」，完全看作投奔你來的一支大軍，則未必，他關心「您個女靚嗎」，雖不一定，倒有可能是打您靚女的主意；要他為你上陣，則可以肯定，沒有這個可能。要將他們統計在你們的隊伍裡，大可不必過急！

### 七、拒絕參加遊行，在我精神的長街 正邁進他的遊行大軍

為此，我想到一位孤零零的個體，他個頭不大，有些瘦弱，辛苦得近似枯萎的疲憊。他舉起的紙標，是在廢報紙上寫的兩行字：「我們工人只該受壓受欺，生活沒有保障？」在維園匯流成遊行隊伍的出口，他站一旁，稍不注意，極易忽視。

「站在這裡，別人看不見的，標語要舉到中間去才行！」

「我不到當中去，跟他們混成一堆，我要他們路過這裡也能看到我。」

可惜，很多人怕都不會注意到這不起眼的地方，何況天氣熱辣辣的，人群亂哄哄的，他個頭小，聲音小，又沒有擴音的喇叭。

「你怎麼啦，遇到什麼不順心的事？」

「廠子遷東莞了，老闆不管我們了！政府是向著富人的！」

我不想，也不敢問下去了。老闆要管他，廠子也不會內遷。內遷，不就為內地工價便宜，老闆可以多賺錢嗎？他走了，不管你，也是他的「自由」，可他那威脅工人生存的「自由」，對弱者也太可怕了。我到過去稱之香港工業區的官塘，看到內地人頗看得起的「鱸魚牌」廠也在大拍賣，要遷廠。留於記憶中印象較深的一座「工業大廈」，過去一層樓可以擠幾家廠，為外國的名牌生產加工，很熱鬧，現

在也是場子內遷，有點冷清。然而，與香港鄰近的地方，地方官是拼命的以各種「優惠」以招引外商。一個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國家，過分以勞力廉價招搖，完全是失去尊嚴的自辱。我讀過一首廣東惠州島打工仔的詩——

民工，一個時代最沈痛的名詞  
在某一夜間  
魔幻般地變成了  
共和國巨大的祭壇

絞肉機在方圓九州的工地上絞拌  
絞拌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  
混凝土  
同鑿砌起與資本主義接軌的  
立交橋  
橋上面，讓全世界的老闆們  
人欲瘋流

西方說，中國一夜崛起了  
但我知道那張國民經濟的底單：  
成千上萬中國民工  
正長眠在摩天大樓的基礎下  
正如憲法上最公正的開頭：  
「這是一個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  
社會主義國家……」

真是字字血，聲聲淚。過去什麼事都往「階級」上扯，確實愚蠢，若一講發展經濟，鑽在錢眼裡，一味媚富，向著富人，不說穿它，也不是與「階級」無關，絕非智慧的果實。遊行隊伍中我親眼看到「反對官商勾結」的標語，媒體無一報道。聽說還不像內地那種貪汙受賄、國有資產大量廉價流失於私人之手那麼惡劣。但房地產中的投機買賣，一遇樓價低迷，則設法寬減樓主的負擔，對其他的弱勢群體，則缺乏這種熱情。對於不涉及腐敗黑洞



警員、警車殿尾之和平、瀟灑的緩步。原載於《東方日報》，七月二日。

的，將經濟的沈浮，總看股市、樓價的氣溫，真是反科學的變態心態，明明樓房多得賣不出去，上市的公司並不景氣，還用許多人為的措施設法扶持上去，注以泡沫，以示經濟的興旺。在玩經濟的泡沫時還擔心泡沫經濟，唯物的精神已蕩然無存。而經濟的興衰，弱勢者都是受害者。過去，人們為之驕傲的尖沙咀新世界裡的「旺鋪」，不少也關門，整個鋪面都以巨幅五顏六色的，和這大廈的高貴氣派和諧的美女廣告封門。廚窗裡已打折優惠的女用鱷魚皮手包也仍以四五萬的標價孤獨卻傲慢地閃爍這裡不可動搖的價值觀念。生意在這裡也遇到「轉型」之難，可他們的財源還是不斷，進財之道，有他們祖先傳家之衣鉢。有的近似作坊的小廠，老闆很闊氣，常到歐美休假、看望子女，廠裡的工人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還不能按時領到地方以勞力低廉所招搖招商的那點工

資。不是傳說，電視新聞上就報導過，工廠起火，工人在老闆釘死了窗門的車間跑不出去而被活活燒死的慘劇時有發生。由於設備落後，工人失去勞動保護措施，超負荷的勞動，機器捲進他們四肢而致殘還得不到賠償者，已無以計數。資本原始積累式的野蠻，對勞動者身心的傷害，是他的勞動像《憲法》之法，得到「尊重」麼？他們為社會階級基礎的階級感情，該怎樣，和會怎樣呢？看似他們從那位香港工人兄弟口裡分了一口飯吃，其實，承受同樣的苦難。應該重提「勞資兩利」，否則，怎能解決想要解決，又無能於貧富差距迅猛加大的危機。有一次，和位國外的朋友在一個外資投入很熱的沿海城市，不時看到大片大片的人群聚在一些樓前，出租司機告訴我們，那都是被外資工廠扣發了工資的工人，現在沒活幹的多的是，你不幹，老闆馬上就招人補上了，只

能夥起來跟老闆好說，反而求他體恤自己要養家糊口，行行好，幫幫忙！

「他們一群群的，都聯合起來，不就得到整個世界了麼？」

我無言以對，只能沈默。在法律上有他主人翁地位的勞動者，經濟上又是弱勢群體，工會，對於已經到了這個地步的他們，起碼是具體到這個廠的工會，已是黃色工會，養了幾個也是媚富的幹部，此時此情的他們，又該怎麼做呢？從維園門口這位瘦弱的工人，自然想到這多舊事。我注意到他拒絕參加遊行的神態，更明白他希望得到理解的心情。但在我精神的長街，正邁進他的遊行大軍。

## 八、香港今日確有雷暴

為此，特別煩惱，還好，五點左右，維園裡的人，基本上出來完了，殿后龍尾的警員、警車，為開放行車線路錯落有致地排開，和平、瀟灑地緩步，真是一幅很美的圖畫。

原來一想到它就會緊張的遊行，卻是這麼和平的，在微笑中結束了。爭「民主」的遊行，能如此遊行，全過程就是民主在這裡民仕風度的敘述。

若將它看成是為哪一家揚威，那真是一大笑話，可這多人的訴求，除了「您屁股大嗎」式的語言遊戲，都是有氣要出啊！

上世紀六十年代，由於某些失誤，憋得人們心頭有股氣時，毛澤東提倡、陳毅元帥樂於張羅的「神仙會」，就是叫大家出氣發牢騷，它不是所謂的「陰謀」、「陽謀」，是真心地讓大家發發牢騷，舒緩心頭的悶氣，復蘇各自潛在的積極性。從這點看，不能不承認毛澤東是位大政治家，且是有人情味的。

這樣看，這場遊行也可以看作大型的「神仙會」嘛，這就未必是什麼壞事羅。

由此，不是輕鬆，還是放鬆了，不是無

憂，也還不悲觀地步行而歸了。

街上，車水馬龍，摩肩接踵，霓虹閃爍，依然如故。它不像早上在中環臨海看到時的那麼樸素，也沒遇到天氣預報的雷暴。軍營中似曾恍惚聽到雷聲，那是感覺中交錯的象徵，是與天象藝術的契合。

若遊行中真是雷暴來了，也許隊伍被它衝垮，也許是它趕走悶熱而帶來的驚喜，對於現代的年輕人，它也是夠勁的現代刺激。

可是，歷史是不能假設的，哪怕是才過去幾小時的事。

這時，我該何往呢？也許首先該沖個涼，像剛才想像的年輕人那麼浪漫地接受天雨的天浴，可是汗濕得身子已麻木得不知道汗臭，加以自己沒有開伙，上茶樓解渴充饑吧！

平日談股市、賽馬、粵曲的茶客，話題多已集中在當天的遊行了。耳邊飛來的各種議論，多在情理中，雖然都是那麼緩緩地說來，可這一聲：

「舊年遊行，今年遊行，再遊兩年，大家都忘了『七一』是回歸日了！」

我聽來真是警世的閃電，雷鳴。

香港今日確有雷暴！

2004.7香港 大亞灣◎

### 註釋

註一：見《信報》（2004.5.18）

註二：見《蘋果日報》（2004.7.2）

註三：見《星島日報》（2004.7.5）

註四：見《文匯報》（2004.7.14）

註五：見《東方日報》（2004.7.2）

註六：見《信報》（2004.6.29）

註七：見《蘋果日報》（2004.7.2）

註八：見《信報》（2004.7.2）

註九：見《東方日報》（2004.7.2）



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令中華民族傲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時代，也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在眾多英雄人物中，有工人、農民、學生、士兵，而作為共產黨領導幹部所表彰的英雄模範人物，只有焦裕祿一人。

焦裕祿（1922-1964），山東淄博人。1962年12月調入河南省蘭考縣任縣委書記。時值蘭考遭受嚴重的內澇、風沙、鹽鹼三害，糧食產量降到歷史上最低水準。農閒時節，農民們四處要飯成了最大的副業。焦到任後，與縣委一班同志，制定出改造蘭考面貌的規劃，忍受著肝病的痛苦折磨，將之付諸實踐。1964年5月14日，焦因肝癌不治病逝於鄭州。焦的事蹟經新華社記者報導，迅速在神州大地傳誦，被譽為「縣委書記的好榜樣」。此後，擔任蘭考縣委副書記、副縣長張欽禮成為發揚焦裕祿精神，帶領蘭考人民大幹苦幹，改變面貌的第一功臣。

張欽禮（1926-2004），蘭考縣南彰鄉張莊人。抗戰時期參加革命，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從人民解放軍轉業，任蘭考縣副縣長。由於他關心民間疾苦而不事權貴，由於他剛直不阿敢講真話，更由於他始終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受到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打擊迫害。多次被批鬥、軟禁，三次入獄，最長一次被判十三年徒刑。

如今的蘭考縣一片蔥蘢。治理沙丘後發展的泡桐木板加工業，成為全縣工業的龍頭；昔日的鹽鹼地、澇窪地，經過引黃河水淤灌，成了數萬畝良田（這引黃淤灌是當年張被判刑的罪名之一）。儘管有人將此歸功於所謂「改革開放」，但蘭考人民心裡有桿秤，他們知道誰是最可愛的人，誰是最可尊敬的人。

# 送行記

袁庚華

## 第一個送花圈的人

清晨5點多鐘，我就已經找到了省人民醫院太平間的地方。想找個地方存自行車時，兩位熟悉的工人指著太平間對面的一家鮮花、食雜店的門口空地說：「就放這，他們就是蘭考的。」老闆一位看上去十分忠厚的中年漢子——對我說：「我是第一個給張書記送花圈的人。」「哦？」我想起了。我聽欽禮同志的兒子說過。我忙用雙手握住了他的雙手。欽禮的親屬曾告訴我，他們的父親剛「走」，第一個送花圈的竟是他們相互之間不認識的太平間對面鮮花店的老闆，是蘭考人。還說他們子女還不知道農村如何燒紙的風俗時，是他們不認識的、在鄭州打工的許多蘭考年輕人天天守在太平間外，給他們的父親燒紙，擺香爐，也送來花圈，上面寫著：「蘭考人民永遠懷念您」。成群結隊的蘭考人民早就來這裡向老書記告別了。

欽禮同志在病重住院期間更有許許多多動人的故事，如果也用量化來說明問題的話，那麼至少是張欽禮同志在這所河南省最大的醫院裡突破了來看望病人的最高記錄，有成千人來看望了他，

而且很多是相互並不認識的，慕名而來。

打破我思緒的是早坐在店門口的一位老人，他對旁邊人說：「我得回家換鞋。早上四點鐘我起來，有只鞋穿錯了，不得勁。」大家都鼓勵他快去。而他胸前那一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卻吸引了我，這是一枚主席穿軍裝、有鮮豔紅領章的頭部像章。這是在鄭州到處可以看到的人們所戴的毛主席像章的又一種現象，不是去年新製作、發售的那幾類，而更可能是「文革」的遺物。

## 共鳴

到火葬場，將要進行的告別儀式在大門正對面的最大一間廳。據說，火葬場的工人知道是張欽禮同志時，提供了一切打破常規的方便，其他人的喪事活動也毫無怨言。廳外的大廣場上，今天是幾十年來少有的一次「大會師」，許許多多幾十年未見的「文革」老戰友、獄中難友，互相知道都幾十年未見過面的朋友們今天都在這裡重逢、相逢了，又相互給自己熟悉的人介紹，進入大廳內，許多人仍忙於此。有一位朋友說，來這裡的有一半都坐過牢。一位朋友準確說道：「除了蘭考來的，除了女的，恐怕會有一半。」

當浩浩蕩蕩的蘭考迎「靈」隊伍進廳時，前面哭泣聲立即連成一大片，使所有在後面說話的人，不得不限制住自己。隨著主持人在廣播裡宣佈：「張欽禮同志遺體告別儀式現在開始」，頓時全廳內鴉雀無聲，而隨即進行的「三鞠躬」就打開了「閘門」，那哭泣聲推起的悲痛浪潮湧向大廳的各個角落，在大廳後部看不到遺體的人群中，也有人跪下去了，哭伏在地……。

為了縮短時間，除了欽禮長子的「答謝辭」外，沒有生平介紹，沒有悼詞和其他的發言，但這個「答謝辭」一開始幾句就掀起了

我們胸中的萬丈波瀾，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幾十年的恩恩怨怨，幾十年來始終平靜不了的那心中的一切，剎那間在大廳內多少人的心中洶湧翻滾！

我看到多少淳樸的農民非得用磕頭的形式來表達他們的哀思，多少人在遺體前哭得站不起來。從告別遺體出來的老同志中，我又看到那些已經八、九十歲的「老紅軍」、「老八路」、「老市委書記」、「老市長」，文革中曾經風雨同舟的「老幹部」。我們緊緊地握住了手，現在應該說是近「二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了。包括主持人按慣例介紹的送花圈名單中的人物，按傳統的地位觀說，這些來送行的人中，僅擔任過省、部級、市（地）級領導職務的，就有近百人之多。他們及更多的另一些送行者中的多數人還有一頂通用的帽子，就是「造反派」，「三種人」。

一位新聞界的朋友向我介紹了新華社老記者××，1986年我在獄中讀《中國作家》創刊，蘇曉康的《洪荒啟示錄》時，就知道這位××。通過《內參》曾揭露過原河南省委的彌天大謊和河南實際存在的極其嚴重的陰暗面。而今天才知道，他後來遭報復，在獄中關了六年，至今沒有解決問題。

後來到張欽禮老家後又聽說，當年隨穆青、周原來採訪的一個小通訊員也來了。也就是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新聞人」都來了，今天是確有新聞可做了。

## 格格不入的兩種氣氛

我們乘坐的車到蘭考下了高速公路後，和前面已經先來到的幾十部車都被安排在路邊等候靈車等主要車隊，我看了已到的這幾十部車，大都是「紅旗」車，聽欽禮的子女們說過，他爸爸不喜歡進口車。

路旁，溝外的樹蔭下，有一群群的農民，大都年紀不大。據他們說，是一早就來這等老書記的。有位婦女說：「聽說『老書記』五月七號在鄭州『走』後，他們就天天來這裡等著『老書記』回來，後來我們進城後聽說，還有許多人今天早上三、四點鐘就來城裡等啦！」

一位農村婦女對我們說，今天沒來這麼多當兵的了，前兩天開大會（指官方紀念焦裕祿去世40周年的大會）把附近5個縣的武警都調過來了，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的，路上根本不准有人……，進城後，我們還聽說，開會那一天全城的商店都不讓開門，連機關幹部也不讓上班，在家裡待著，「不就是來了個政治局委員嘛！硬是把焦裕祿和人民拉遠了！」幾個月前，甚至幾年前，在各地遇到的蘭考人就直言告訴我：「張欽禮是比焦裕祿更好的幹部。」應該說是可以理解的，焦裕祿同志畢竟只在蘭考工作了一年多。近年來，一些小報刊都報導過穆青、周原等人的回憶有當年就是張欽禮把「焦裕祿」樹立起來的故事，焦的女兒也親口對我講過，「沒有張欽禮，就沒有我爸爸，她對張欽禮同志說過：『張叔，我爸不在了，你就是我的親生父親，沒有你，就沒有我們家……』」

而焦的那些事蹟也是他們兩位戰友一起幹的，焦身後更多的工作，更大的改變蘭考面貌的，是張欽禮領著蘭考人幹的。今天，聽說焦裕祿的女兒也穿一身孝服在張的孝車上。

### 「是非功過，自有公論」

約12點40分，「靈車」到蘭考後，整個「送靈」「接靈」的車隊開始進城，前面隨即傳來鑼鼓聲，但是很快車隊就走不動了，等一會兒我看到前邊幾十部車都下來，人跑步去前邊看去了，我也下車跟過去，看到的是一個黑色、白字的橫幅攔在「靈車」前面，上面醒目的大字寫著「忠誠於黨，情系人民，是非功

過，自有公論」。其他還沒有看到，車隊已經啟動了。我回到車上，打開車窗，路兩旁不少人含著淚和車隊的人們相互致意，哭的較痛的多是年紀大的人，也有許多年輕人，他們顯然是被這氣氛感染了，也感染了我們。在進地道口時，一個中年漢子先「嘿」二聲，然後大喊起來：「張欽禮的冤魂回來了，張欽禮冤死了。」車上的人都含淚向他表示敬意。

車隊又停住了，我立即下車，向前跑去，一直跑到隊頭，看到是張欽禮的「孝子、孝孫」們乘坐的車，被大批群眾包圍了，哭聲，喊聲，淹沒了其他所有的聲音，我好不容易擠到「孝車」的後面，看到欽禮的小女兒愛英已經哭得淚流滿面，喉嚨已經完全嘶啞了，只聽清半句：「我們做子女的，一定不會忘記……」多少雙手伸向她，拉住的都不想去，也有許多人是伸向孝車上的其他人的，幾位年輕的姑娘也在往這邊擠著，喊著：「愛英在那，愛英在那。」一位看上去身體很不好的老人，拉住孝車的車後幫，一直不鬆手，然後讓車拉住他走，一位老太太乾脆在車上人幫助下爬上了車。

車隊不時停下，是不少群眾硬要按風俗，在車前路上燒紙，磕頭，車的每一次啟動，每一次停，都會引起車周圍直至路旁形成的人海一次次的「湧動」。我問旁邊兩個女孩：「你們也熟悉張欽禮嗎？」「熟悉，從小大人們都給我們講。」她們快言快語回答。現在，即使作為一個旁觀者，你滿眼看到的從八、九十歲的老人到婦女懷裡抱著的孩子目光，以及大批的青、壯年，在這個天地裡，你不能不感慨「誰人不識君」呢？我還看到兩個坐輪椅的老人，同行也看到有的是在親屬舉著「吊瓶」打點滴來的，人們似乎都不願錯過這個歷史性的時刻。

在這人山人海，哭聲、呼聲、喊聲，甚至口號聲此起彼伏，很多是要求去縣委門口開

大會，要為張書記中冤一類。當一位婦女又主動給我宣傳：「張書記是冤死了……」的時候，我忍不住說了一句：「他不冤，因為人民從來沒有冤枉過他！」她立即接上了：「對，對，蘭考人民一直認為他是毛主席的好幹部。」

「學習張欽禮精神，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這是在孝車前出現的又一條20多米長的白色橫幅，特別醒目，一路上兩邊都有很多人在念著，我問舉橫幅的其中二個農民：「這是張莊支部搞的，還是你們自己搞的？」他們回答得很乾脆：「我們自己搞的。」自此，這條橫幅就成了這支車隊，已經看不到盡頭加上跟隨的群眾隊伍前的一面鮮明的旗幟。

快到縣委門口時，在這條「進行到底」的橫幅後面，一些憤怒的群眾高呼口號，只聽見幾句：「打倒貪官」、「打倒腐敗」、「打倒走資派」、「打倒帝國主義」、「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萬歲！」……

成千上萬的群眾圍著孝車，越來越多的人跟隨著這支隊伍，從馬路中的人群到兩邊路旁的群眾，歡迎的掌聲此起彼伏，路邊的表達多種多樣，譬如，一塊不大的黑板寫著：「欽禮同志，一路好走！」落款是：「張子田全家」一群孩子各拿一個汽球，一個汽球上一個字，只看見有「懷念」……等，在馬路中間一部分群眾舉著簡單的紙，上面寫的是「蘭考人民懷念您」，他們迎著孝車，久久不願意離去。

一位中年人又對我說：「全是自發的啊，沒任何人通知。」我問：「怎麼來這麼多的人？」我問了一下，「早超出了你們縣城的人口，有很多是鄉下來的嗎？」他說：「是的，消息傳得可快了，一傳十，十傳百……」

一位中年人說：「自毛主席去世後，還沒見過這陣式！」一個女孩接著說：「他們都說，這叫十里長街接書記啊！」另一個女孩

說：「毛主席也不如他。」我對他們說：「欽禮同志病危時，一個從國外回來的學生去看他，對他說：『張伯伯，您為蘭考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話沒說完，就被欽禮同志打斷，他支撐坐起，用手指著病床對面的毛主席畫像，意思是說，是毛主席領導的。他在病重，病危期間，胸前一直戴著毛主席像章。路過鄭州聞名來看望他的北京一位姓韓的大學老師緊握著張欽禮同志的手說：『我一定當好毛主席的學生，把你們奮鬥的革命事業進行到底。』此時不能說話的欽禮目不轉睛地長久地注視著這位已經哭得淚流滿面的青年老師……」

然後，我對低著頭的那個女孩說：「你們話也有道理，毛主席要教育出來的就是張欽禮這樣的好幹部。」周圍的人也七嘴八舌的附和著：「張書記就是毛主席帶出來的好幹部」、「現在都啥幹部，都是貪污犯……」

一位老漢說：「他們家親叔都不收禮。」我說：「在鄭州從醫院到靈堂，多少人去看他，但他們家從來不收一分錢的禮，欽禮對他們子女交待過：『我也沒有任何遺產，我走的時候是乾乾淨淨的，以後你們怎麼做人，毛主席著作已經講得很全面了，你們就照那樣做人。』」

## 縣委大門內外

路過縣委門口時，我有意走近幾步，兩個像是機關工作的年輕人在議論什麼事，從大樓裡出來幾個人，其中一個中年人打著官腔問：「這是弄啥呢？」這大概是我今天所遇到的成千成萬的人中第一個「不知道」這是啥事的。一個幹部模樣的人說：「外面怎不走啦？」另一個答道：「專門攔（停）這的。」大門外一些老百姓扭過頭來勸他們：「你們也出來看看老書記吧！」在場的這幾個人沒任何表情。

縣委外的大道上則是另一個世界。從蘭考

車站到縣委門口，到縣政府門口，到焦裕祿陵園前，形成一個又一個高潮。一聲聲「沖天雷」炸破白空，而置在路兩旁的一條條「萬頭」鞭炮迎著車隊到來震耳欲聾的響起，在一直不知疲倦的兩輛鑼鼓手和噴吶車後，又進來一支新的盤鼓隊和另一支軍樂隊，後者奏的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一輛專門採訪車上站著的記者向人們展示的是香港出版的《中國焦點》雜誌內的一幅幅張欽禮的畫頁，也成為群眾包圍、歡呼的中心。在車隊的最前方，又出現一條引路的黑色橫幅：「歡迎張欽禮魂歸故里」。

一路上還看到許多小商販把一箱箱飲料免費送到人群中，從箱中取走飲料的人們又立即擠進孝車前送給車上已太累太累的欽禮的親人們，尤其是站在車前面的三個兒子，一直高舉著欽禮的遺像，不停地向周圍群眾鞠躬作揖，嘴裡還不停地表達著他們真摯的謝意。

在小北關十字路口處停著一大片計程車，幾個司機在大喊：「去張書記家不收費啊！」我還注意到，就是在車隊還沒有到來之前的路兩邊所有人，所有的商店裡，目光注視的遠處還沒有到來的車隊，所有的言談都是今天這件大事和老書記這個人，一些年輕人對老人記述評論的細節都很注意，如此全社會的政治化，是幾十年來所有反映這個社會的文字中難見的現象，今天的這些現實——除了「文革」和「八·九」——也是僅見的。

## 陣線分明

在又一個十字路口處，又一支盤鼓隊迎上去還沒來得及「截住」。孝車突然向右邊路口拐過並急駛而去，整個車隊也緊跟上。我上車後，他們告訴我，順著原來的大路走，前面還有好幾個大鄉鎮，甚至好多個著名的村口，都早擺好了祭品，各處都有成千成萬的群眾早就

等在那裡，那麼到半夜也回不到欽禮的老家，若按風俗，天黑以前是要求回家的，再說，那些孝子孝孫們累得再也支持不下去了。「那麼，那些等待的老百姓怎麼辦呢？」我問。他們說：「已經安排好了。」

車上後排座上是兩位新上來的本地的婦女，其中一位對路邊的桐木加工業務很熟悉，她說，她十幾歲就幹這一行，十幾年前看廠不行就幹起「收破爛」。旁邊那位老×介紹說，她是收人家收上來的破爛，是「破爛王」，並說了一句笑話：「當了三年『破爛王』，給個縣長都不幹。」她笑了，對自己現在的業務是很滿意的，但是，話題隨著張欽禮轉到毛澤東時代，她們則十分深情地懷念。「那時人多好啊，爭著當模範，早上一起來，麥子割了一大片，誰都不知道是誰割的！」同樣的表情，在今天去火葬場路上的汽車裡，我在一個機關幹部模樣的蘭考女同志那裡也看到過。那是她在談到她的中學教育，每學期只交兩毛錢時。當時也是其父領導的老×說：「三年困難時期，張欽禮這個縣長家也餓得很，我們家還給他們送糧票。」我接上說：「一次在公車上，一個人說老毛那時窮的啥樣時，兩位紡織女工站起來回擊道：『那時候剛建國，底子薄，都窮，毛主席也窮，他老人家七個月不吃肉，自己腿也浮腫。』其實，換一個時代，再窮，餓死人再多，各級貪官還照樣揮霍，四十年代大災荒時，美國《時代》記者就揭露過宋美齡和蔣家王朝的貪污腐敗，前幾年公佈的千家駒日記，不也記載著他們這些文人在三年困難時期去內蒙等地時，地方幹部不也用山珍海味招待過他們……」

車上這些蘭考人還向我們介紹了就是在那些艱苦的條件下張欽禮這些幹部又是如何工作的許多事蹟。他們說，跟著張欽禮的那些幹部文革中被資反路線鎮壓，坐在監獄中還在研究

著改造蘭考的規劃，一出監獄還沒有平反就跑到治沙、治鹽第一線去了。但是多少好幹部都被整死了。焦裕祿生前樹立的四面紅旗在清查「四人幫」中除韓村的女支書逃出來外，其他三面紅旗都被抓到監獄，其中一個死在監獄，欽禮的弟弟也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無期徒刑，後來死在獄中。1980年時我們就聽說他的事蹟，說他在全縣判他的有線廣播大會上奮力掙脫出來，衝上主席台搶過麥克風對全縣人民演講，好一條漢子啊！在文革中及文革後的多次鎮壓中，僅其中一次就正式逮捕了1207人……

幾天前在紀念焦裕祿的官方活動中，官方媒體作為繼承焦裕祿事業而專門採訪的人，正是當年清查「四人幫」鎮壓張欽禮這一大批好幹部的劊子手，他本人還是1958年搞「浮誇風」的有名幹將，造成成千上萬人餓死，是民憤極大的。在河南，這個陣線更是十分清楚，當年被打成「右派」、「右傾」的，例如省委的「潘、楊、王」（其中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就是鄧小平支持吳芝圃整的），地市一級耿其昌等，縣委一級的張欽禮等，「文革」中都是跟著毛主席繼續革命的造反派，河南文革中起來造反的學生寫的第一個《緊急呼籲書》，就是揭露了「信陽事件」，造反派代表全省人民的意願幾下廣州要揪鬥吳芝圃——這位全國最著名的「浮誇風」幹將，和另一位著名幹將曾其聖一起，1979年在全面鎮壓造反派後，得到了最高級別（華、葉、鄧及全部政治局委員參加的）的隆重平反。

### 這就是中國的希望

車隊去往欽禮老家所選擇的這條偏僻的路，路旁也不時有肅立的人群，完全被截住的只有一次，落款為雙樓村委的黑色橫幅上印著：「沉痛懷念老書記」。另一條落款是南彰大

隊的橫幅寫的是「人民的好書記」。待我們後面的車也走過，幾個被扶住的老人仍在大哭。

前面鞭炮，鑼鼓聲響起，終於到家了。幾百名少年兒童每人手持一朵白花，肅立在村外路邊，進村前路上的某一個路口或拐彎處都聚集著大批老百姓。人路上空的橫幅除了「懷念」的內容，還有：

「防風沙，治鹽鹼，造福人民；一生清正，廉潔為黨，鞠躬盡瘁。

壽越七旬，睦鄰精神今猶在；含笑九泉，勤儉作風永世傳。」

我們幾個人先進了村，找到了張欽禮的家，也確實是很舊的老屋，這就是本地土生土長的縣委書記（還兼地委書記和省裡其他職務）的家。靈堂已擺好，兩邊對聯是：

與焦君豐碑竟焦君遺願四十年不曾止步，  
無愧親密戰友，莫憑恩怨作論。

恬百姓疾苦為百姓造福六十載未肯息肩，  
堪稱人民功臣，勿以窮達相觀；

橫批：一代風範，雖死猶榮。

當夜回去的路上又經過焦裕祿塑像時，我想起進城的路大家曾討論群眾集資買塊地也建個張欽禮塑像（堪稱雙壁）的問題時，有的同志說這不是花錢就能辦成的事，這是政治。也有人說：「對，是政治，可是用孫中山的話講，政治就是眾人的事情。那麼只要人民團結起來，齊心協力，又有什麼事辦不成呢？」今天一天在蘭考的感受，更使我們增強了這個信念。應該說，今天使我們感觸最深的就是這幾十萬蘭考人民從逮捕、判刑至今，張欽禮同志離開他們20多年了，而蘭考人民不僅老一代，中年一代那麼刻骨銘心地記著這樣一個毛主席的好幹部，而且還把他們的認識情感傳給了一代又一代蘭考人。這就是蘭考人，也是生活在中原腹地的一部分中國人的良心，這就是中國人的素質，這就是中國人的希望。◎

# 白色的青春，黑色的記憶（下）

一個與台大青年有關的「二二八」往事與「白色恐怖」的回憶

■陳英泰

## 韓戰發生

我半躲半避了一個多月，六月二十五日晴天霹靂地知道韓戰發生。接著美國派第七艦隊駐防與巡邏台灣海峽，說是把台灣海峽中立化，實際上是要保衛台灣，以防中共攻佔。我知道攻台「暫時」沒有可能，而我本能地擔心起那些已被抓的以及成為要抓目標的那些人的命運會怎樣？我知道他們會很淒慘，已被抓的要宰要割隨國民黨之使；成為要抓目標的，在此狹窄四面被海封閉無處可逃的台灣，成為甕中之鱉，將無處可逃。但萬萬沒有料到，那些人的下場比我所擔心的還要慘，他們盡數被捕，而其中大部分竟遭非常不人道的殘殺，比我預期的處置還要嚴厲，倖免慘殺的則大部分被長期監禁，這即是所謂的台灣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事件的大悲劇。而中共的攻台不是「暫時」拖延而已，甚至拖至半世紀後的今天仍遙遙無期，甚或成為不可能。

政府對其所犯下的白色恐怖罪行事後辯護說，政府之舉是合理、合法，是正當而不得已的。但我們看被屠殺或被監禁的人除了一小部份人或牽涉有武器或暴力外，極大部分的人對政府只有意識上的離異問題而已，對於未曾牽涉到暴力問題的，政府小題大作地把那些人屠殺或長期監禁，是極大的犯罪問題，而造成了世紀的大悲局。

政府更辯解說假若當時不採取那麼嚴厲手段，其政權就保不住。一個不代表人民，不得民心的政權是否有權為保護其一小撮特權的統治階級利益濫殺人民，實有爭議；而韓

戰發生，台灣由美國保護，絕對地安全，沒有被進攻與被顛覆的危險。把那些落在其手中的無望的人屠殺或者長期監禁，不是保衛台灣的必要之舉。祇是作為無理屠殺的託辭而已。韓戰使中共的解放台灣成為無望或遙遙無期。我們當時看不出這一點，幻想台灣不久很快就會被解放。

## 社會上風聲鶴唳

當時社會上一片風聲鶴唳。五月前後大逮捕所抓的人，大概漸漸就要由國民黨調查完畢，如何處置，一個一個將要定奪。處置的結果一個個出爐，國民黨就大刀闊斧地處以槍斃或長期徒刑。

一有人槍斃，國民黨的通訊社——大道社就發布通訊，御用報紙《中央日報》、《新生報》就大肆登載於報上。有時大幅地登，有時僅登於一角落。我被捕以前所登的大案有：吳石案、劉晉鈺案、李朋案、基隆中學案等。至於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北案、學生案、鐵路案、郵電案、蘭陽案等大案是我被捕以後才定奪的，故我錯過機會看到其中內容。這些都是震撼社會的大事件。

吳石案是以國防部次長吳石為主，軍方企圖叛變的案。據報導，國防部存有強大的臥底組織，明目張膽半公開地運作。結果吳石等被捕後當然被殺。劉晉鈺是台灣電力公司的總經理，受其在台大唸書相當活躍而已逃回大陸的孩子的連累，說是要響應中共的解放而被槍斃。李朋說是第三國際的間諜，政府握有證據

而給槍斃。唐志堂是台北二中早我二期的前輩，牽連基隆中學案被槍斃，林如埭也是台北二中的前輩，說什麼被捕後在台北監獄服刑時對別人講解共產理論而被槍斃。

我在英文報紙看到政府雖沒有公開但卻有白軍問題。所謂白軍則是蔣介石重金聘請過去日本將領以訓練其高級軍官圖以從根底改進其軍隊，使其脫胎換骨。本消息是得自香港的英文報紙。此舉得到了很大效果而使美國側目。這和美國的第七艦隊雙重地穩住了台灣的防備。

### 被捕到東本願寺（保安處）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我上班了約一個鐘頭，經理室來人叫我去一趟。我一進去看到兩個大漢坐在那裡和經理談話，一看到我進來，兩個人漢就站起來說我兵役上有問題，有事要問，要我一起去。我立即知道怎麼一回事，他們不明言要逮捕我，卻扯到兵役問題。可見他們知道我被兵役問題煩擾著，但兵役問題不是解決了麼？我不是取得了行政專校的學籍？於是跟著他們走出銀行，一出門，他們就摸摸我的口袋看看有沒有武器或危險東西。我們徒步往西門町方向走。我本能地想必定是要帶我到惡名昭彰的東本願寺去，那裡自從台灣光復以來一直被利用做為專門關押拷問政治犯的地方。果然我們走到了那裡。東本願寺是日治時代日人建的寺院。國民黨來台灣利用為關政治犯、思想犯的地方，稱為保安處，屬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它曾稱為情報處，後來改稱為保安處。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後來改名為台灣省警備司令部。

我一進東本願寺，雙手被銬，關進地下層大牢房前面的走廊。大牢裡面關有很多臉色蒼白、穿著紅色布製短袖囚衣褲的人，紅色的囚衣對應著蒼白臉色更使臉色顯得蒼白，可看出他們好久不見天日，給我的印象真不像現世的人間。我感慨虧國民黨會想出此紅囚衣以增加

此恐怖氣氛。他們看到在牢房前面的走廊蹲著的我，靠進牢房柵欄來問我這的那的，也問我有沒有帶香煙。我就把口袋裡的整包香煙丟給他們。接著被命令把口袋裡的東西與所帶的錢、褲子的皮帶拿出來寄存在看守那裡。這些就是他們收押人的手續。

### 我被關進二樓的獨房

接著我被帶上寺院原來做為本殿的上一層樓。一上去，只見走廊兩邊排有整列的單人小牢房。獄吏士兵打開左邊第三間房門要我進去而狠狠地關上厚厚的木門，上了鎖後走開。於是我的牢獄之災開始。頓時我覺得好像掉在黑洞的深底，再也脫離不了。不可能再活著出去，而且能活多久，一切未知數。

牢房比走廊高出半公尺釘有木板地板，前面有很粗的木頭角材做的柵監與同樣角材做的門。裡面暗暗的，什麼都看不清楚，片刻一定睛，可看清牢房呈細長狀，寬約八十公分、長兩公尺多、最裡面開有一小洞當馬桶用，高只夠一個人站起來不碰頭的程度，和兩邊鄰房砌有磚牆，磚牆頂端各開有一個使空氣可稍流通的孔。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我左右隔壁房關著軍人模樣的，一個是東北人，另一個是哪裡人我已忘記。

初進裡面覺得一切沒有希望，整天就在暗暗的那麼一點空間呆著，人既是落在殘忍出名的國民黨手裡，鐵定沒有希望活著出去。中共就快要攻來，那時再也無處逃跑的國民黨必定惱羞成怒不會放過我們。國民黨的高官逃離台灣到別國流亡，臨走時必定像撤離重慶、上海時一樣，把抓在手裡的政治犯來個機關槍掃射一個一個的屠殺。我就如此東想西想，但有時又會想也許有希望，台灣已是最後基地，無處逃跑。臨終時國民黨也就怕報復不敢屠殺吧。但又擔心起韓戰不知會怎樣？台灣的解決會不會是很遠的將來？



## 陳正宸被關在我斜對面的獨房

走廊斜對前面的獨房關著嘉義籍師範學院學生陳正宸。他比我只早來幾天，長得幾乎和我一樣高，聽說為逃避國民黨追緝藏匿在山地被抓來。因他是有受教育的大學生，又是因人同小異的事情被抓來，我像得到知心的朋友，我們一有機會就無所不談，講到案情，講到時局，講到等著我們的問案刑求，講到我們還有沒有的未來。我們講得很投機，彼此的觀點幾乎相差不遠。就中我們最關切的，是如何面對很快就要面臨的問案與刑求。我們想像訊問的內容與我們可講不可講的範圍。但老實說這種想像對彼此都很不利，我們應想到把一切法官所問堅決地否認才是。但好在我們不忘一個很重要的一點，除非法官所問，一切不能主動地講及。這點雖然好像不重要，但經過以後的坐牢與看到他人很多為這一點而失敗的情形就知道其重要性。又好我在保安處只是過境之客不久就被送去保密局，故沒有遇到鄭重而深入的訊問，故沒有出何訊問上的紕漏。

我比他早離開保安處，接著我被送去保密局南所、再北所而到軍法處。那時我和早我到那裡的他再同被關在十六房。我又先離開軍法處先到綠島，我在綠島後才看到他被送到綠島來。我由綠島送回軍監，他也一起送回。我們在軍監同在一段時間後，他卻被誣告又被送去保安處，然後卻再到軍法處而被宣判死刑，結束了其充滿憧憬卻不幸的短暫生涯。

## 原來林從周還是供出了我

我被捕時一直懷疑林從周有沒有供出我。我被捕，答案變為很清楚。他先前一再地向我保證組織非常嚴密，絕不會出事，萬一出事，組織也準備有許多藏匿處，特別是在山地有基地般的地方，可由城市往那裡避難，絕對安全。又即使出事個人上他絕不會供出我。但結果證明組織多脆弱而他的保證多空洞，組織崩

潰兵敗如山倒，他被捕很快累及到我。他沉默寡言做事認真，做地下工作絕不含糊，就把整個生命放在其工作上，他是絕對可信賴的人，但竟然對我犯此致命的錯！我在獨房裡想來想去不可理解。但能不能理解又有什麼用，面臨我的現實是一個對我只有凶沒有吉的生死鬥。

## 被捕後的頭一餐與頭一晚

很快到了開飯的時間。伙夫提著裝有飯菜的木桶到牢門前來，拿出鋤盆，把飯與菜一起打在盆裡遞進來，是白菜摻兩三個油豆腐。我沒有食欲，沒有吃。很快就是晚上，我就要就地睡覺。裡面沒有枕頭也沒有鋪蓋，我除了所穿襯衫外沒有帶任何東西。獄吏拿了一條薄薄的破毯子丟給我。於是我就把鞋子當作枕頭，蓋了那條破毯子縮捲著身子而睡。

我們沒有白天或晚上，周圍對我們都是一樣暗暗的。若不仔細的看透過走廊可窺見的一點天色，不知道一天又過去。至晚上聽到駐屯的士兵列隊集合點名，大唱「保衛大台灣」歌，才知道應是睡覺的時候。他們的歌是那麼地無助、悲慘，就像等著中共攻來消滅似的，在絕望中使出全力唱亡國之調。被關著的我反而對他們生出無限的同情。我聽那歌聯想到日本將要戰敗時流行的「直到最後一日」一歌，同樣無助與悲慘。後來聽說那一條歌是由一個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所作，後來被禁唱了。「保衛大台灣」歌名影射著「包圍打台灣」。

## 沒有衣服更換與沒有睡具

我被抓進的十月二十三日那一天雖已十月底，天氣相當暖，我只穿了一件襯衫上班而被抓走，沒有帶換洗的衣服，也沒有帶毛巾牙刷。十月底的台灣隨時都會刮西北風，風一吹就會忽然地變冷。兩三天後不可避免地風來了，氣溫劇降。我在牢裡能穿的全部只有那一件襯衫，睡覺只有獄吏給我的那一條破毯子

蓋，真是冷得受不了。那一條破毯子極薄，散發著奇臭的味道，我顧不得那麼多，現在對我卻是無比的重要，我蓋著它縮捲著身，努力入睡，但心裡總團團轉，我想那條破毯子以前不知幾個人蓋過，而那幾個人可能大多已不在人世。我也想，為何獄吏沒有發給我初進牢獄時看到大家穿著的那極為恐怖而噁心的紅色囚衣褲？有了它可緩和我目前的捱凍，但又想，即使如此我還是寧不穿它。我們不容許和家人或其他人聯絡，沒有管道送東西進來。事實上那裡是祕密機關，家人除了靠想像外不會知道我們的下落。因沒有毛巾與牙刷，早晚只能用獄方分給我的一茶杯的水用手擦擦牙齒就打發過去。當然也沒有內衣內褲更換，好在一個人在一個房間，可把內衣褲用少許水搓搓，等衣褲乾燥時，我可以光著身子。就這樣子我度過了在保安處的人約兩個禮拜的日子。

### 光復節與蔣介石生日的加菜

我到那裡兩天後，平常只浮著兩三小塊油豆腐與青菜的飯菜忽然地變為茭白筍炒豬肉。原來那天是台灣光復節，外面還不斷的傳來遊行的鑼鼓聲。我想光復節有什麼可慶祝的？日本戰敗走了後，台灣的苦難不僅一點也沒有稍減，反而更加厲害，事實上開始更多的苦難，先有二二八事件的屠殺，現在更有大批人批地抓人、殺人、關人事件，比二二八事件更變本加厲。再過五、六天忽然又有加菜，聽說是蔣介石的生日。我從不知他什麼時候生日。但在這種軍閥或國家軍隊都分不清的地方，他的生日比什麼都重要。

### 曹秀專託人帶東西

幾天後，忽然有一位台灣籍工作人員送些

食品與日用品到牢門前給我，真像及時的雨。原來那是受銀行同事曹秀專小姐之托而帶給我的。那個人是銀行同事李小姐（瑞雲）的男朋友，我在銀行時依稀聽過她有當特務的朋友，原來就是他，就在保安處做事。曹小姐和他連結上，其後每隔幾天就托送一次東西來，直到十多天後我被送離保安處為止。

他拿東西給我時總會稍站一會，和我聊天。聊天間他很想由我處挖出東西。我也很想由他口中打聽出他所知和我有關的消息，因為本人的案情我實在知道的太少。他問我曾群芳的消息，我當然回覆說不知道。但我內心暗自欽佩他對案情知道一個人概。

### 保安處是恐怖大本營 也是暗殺的大本營

在保安處我懷疑一九四九年間常有一卡車一卡車的人被載到景美十五份（註二），然後卸下轉運於一個車只能坐四個人的手推輕便車，被推到路的盡頭的山腹下，那裡挖有隧道，穿過隧道至對面有三個煤礦的地方。他們在那裡被卸下，然後被集體屠殺，就地埋在那裡。那些人是不是都由這裡保安處發送？當時大陸正在撤退，有很多人隨著國民黨來。好像只要有一點嫌疑就索性省麻煩而加以消滅掉。當時還沒有大費周章地來一個表演性的軍法審判，以包裝其暴行是合法，但現在不然，抓的人很大部分是在台灣有家的本地人，要屠殺也總不能不考慮做法律的包裝。如果一個政府對於只是有不同意識的管轄下人民，動輒以屠殺對待，能說是合乎人道，合乎民意的有為的政府的合法作為嗎？其違反人道之程度並非法律的外衣可矇騙的。

幾十年後，我聽到澎湖事件的故事，也是

>>> 註二：十五份處公館與景美中間。以前新店線火車沒有拆時設有十五份為名的火車站。代之現在原址設有捷運淡水新店線的萬隆站。

和十五份的祕密屠殺如出一轍，一九四九年間政府集中大批大陸來的流亡學生於澎湖而把他們拋進海裡加以祕密屠殺。一九九〇年間，做過國防部長的孫震也是那一批流亡學生之一，險遭填海之前遭緊急煞車，沒有成冤鬼。

幾十年後，由當時一九四九年間早期關在那裡的陳孟和（於一九四八年底第一次被捕，於一九四九年六月被釋放，再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被捕）、施顯華（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被捕）與周坤如（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被捕）聽到當時保安處的恐怖情形。他們都證實，常在清晨一批批人被綁著送走而沒有看到再回來。那很可能就是十五份屠殺的那些人。他們何曾想到會被送去集體屠殺。施、周兩個人都沒有聽到過十五份的故事。但他們聽到更多的屠殺方法都被該機關採用過。

我以為保安處的祕密屠殺只是後來採取軍法審判的法律包裝以前的過渡形態。不料幾十年後由邱堃堃聽到，他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間軍人監獄屠殺事件後，受其餘波，被送到保安處調查而轉關於六張犁靠山下面的保安處分所時，仍看到有整批的人似被要送去集體屠殺。可見祕密屠殺仍一直一再的重演。

### 最擔心會被刑得如何厲害

大家公認保安處是恐怖大本營。一進來大家都擔心會被刑得如何厲害，那也是我和陳正宸共同最關心的問題。陳正宸成為唯一做閒談的對象。我一有機會就和陳正宸隔著走廊偷偷地講話。國民黨訊問與逼供的殘忍是有名的。在社會上盛傳東本願寺裡不人道的種種傳說。心想，到時就全力以赴吧。我們兩個都非常擔心提訊時會怎樣，很快就要面臨的問案與刑求了。我們想像訊問的內容與我們可講不可講的範圍。我們共同的結論是，沒有被問到的不能主動講，絕不能講。這點雖然好像不重要，以後就知道這是多麼

地要緊，生與死往往就只在一句話。經過以後的坐牢與看到他人失敗的情形就知道其重要性。好在我在保安處只是過境之客，不久就被送去保密局，故沒有遇到鄭重而深入的訊問，也就沒有出何訊問上的紕漏。

人往往以為回答內容儘量充分就能表示坦白與合作，審問的人就不會厲害逼供。事實不然，講的太多易出紕漏，成為被追究的把柄，而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後來看到很多例子，槍斃不槍斃，關多關少，往往在於一兩句話之差。國民黨一抓人就忙著訊問，一方面要他供出更多的人，一方面使他罪狀加重。抓更多的人，罪加的越嚴重，辦案的人領的獎金也越多，升官越高。我常看到關在那裡的人被叫出訊問，回來時不能走路，必須由兩個獄卒挾著兩腋扶回來。

我以為一進來就會被審問拷打。但一天過一天都沒有什麼動靜。在保安處單獨被關在二樓獨房的，是被認為案情重大或需逼供的人，是拷打的主要對象。經過拷打後認為已沒有什麼東西可問的則被轉調，關在入口處的大房間去。我進來時比較幸運，因抓的人太多，除非案情比較嚴重，審問官不想也撥不出時間急於審問像我這樣案情可能不很嚴重的人。聽說早期，人一被抓進，立即就叫出去痛打，下馬威，而真正厲害的拷問還在後頭。

我們會有什麼命運，我在外面已由報紙看到，會經由軍法判刑，被認為嚴重的，一宣判立即押往馬場町槍斃，不嚴重的則被判徒刑而被送去軍人監獄執行。現在關我的地方東本願寺是屬於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聽說以前的名字為情報處，是一個調查機關。有嫌疑被抓的人先送來這裡拷打，使其供出更多人以便逮捕，且經訊問取得口供後送去青島東路也屬於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的軍法處，做名目上的軍法審判而加以槍殺或囚禁。我後來知道，其實所破獲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關係的訊問拷打的總

部還不是這裡，而是國防部的保密局。因此不管是哪一個機關逮捕的，都會集中到那裡做最後的訊問，做出口供才轉軍法處。抓人的機關很多，保密局、保安處，刑警總隊、憲兵隊、陸軍總部、海軍總部、空軍總部、聯勤總部等都是。我在這裡短時間後被送到保密局總部，坐落於延平南路。

### 保安處的訊問

我的腦裡始終離不開如何應付無可避免的訊問。事實上我對我的案情仍在五里霧中。我除了林外，不知和誰還有關係。我苦思我的案情，很想知道更多真相。我很想從那位台灣籍特務的李小姐男友談話間問出什麼東西來。他更是想由我這問出或釣出什麼東西以表功。他提及曾群芳的名字，看我的反應。但日後法官訊問時都沒有提到過曾的名字，可見他預先已對我的案情有所研究。我想他怎麼會知道曾的名字。他知道的事法官當然知道，但法官為什麼沒有問我？事實上，以前我一直不知曾群芳與有案件上的關係，直到林被捕後，他來銀行看我，才知道。訊問中也沒有提到過同樣被捕的鄭文峰。他雖在案件上和我沒有關係，但以他的活躍度來看，我想他應知道我有牽連，他沒有帶給我無謂的困擾。

我在那裡十多天被訊問了兩次。首先以為必定會被拷打得很厲害，但都沒有拷打，可能因我的案情已明瞭，沒有什麼嚴重，不值得打。我被收押兩三天後，偵查的「法官」（我們把訊問官如此稱呼）頭一次提訊我。他說林從周說我有參加組織。我否認，但「法官」說，既然有人講出就一定不會錯，他說世間那麼多人不抓為何要抓我？我說這個我就不知道，就像車禍吧，車為什麼不撞那麼多人而偏要撞我，難道是我的責任？我說我和他只是朋友間的來往，只不過是關心時局與政府的命運，偶而和他談起，但那也是大家關心談論的焦點，

和他談不足為奇。但我沒有參加過其組織。

於是，我證實由於林講出而讓我被捕的。他被捕前經常說萬一有什麼事，他寧死也不會交出我或什麼人。他不連累別人的神話，在我的腦裡徹底地破滅。法官要我寫自傳，我寫到，孫文說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因而，我才認為同情共產主義沒有錯。法官也許認為我的案情單純，再多浪費時間也擠不出什麼東西，就叫我不必繼續寫下去，但要我承認我有參加組織。我說我只有和林時而討論事情的關係，我沒有參加任何組織，除了林也不認識任何人。

我說我不否認自從二二八事件後我對政府失去信心，希望政府有所改善，變為民主的政府，或換別人主持。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持有同感。但我沒有做過加入黨的宣誓、也沒有交過黨費、更沒有領過黨證，怎麼說我參加其組織？我要求「法官」讓我和林當面對質以證實我言。但「法官」不理我要求，且不管我如何否定，說林既然供出，否定也沒有用。最後我在其恫嚇要用刑下，按照他意思在口供上簽字。

「法官」每次調我問話，總要我寫出我交往朋友的名單，我心想我一寫，他們豈不也被抓來？我只寫了林從周，說他是我唯一有來往的。我知道寫出朋友名字會連累他們，那是我最不願意做的，我自覺驕傲，從頭到尾沒有一個人因我受到連累的。

他問我有沒有參加二二八活動。我想這無論如何也不能講，不然豈不讓他咬定我有實際叛亂行為？我說沒有。他不再追問。

他要我填寫我持有的財產，我說沒有財產而不寫。我被捕得遲，常由報端看到，被判死刑的人或判徒刑的人總附帶地被沒收財產。我想我若寫有，將惹起不必要的麻煩。我想有的人其實案情沒有那麼嚴重，但因政府覬覦其財產，故意加重判其罪，加以謀殺，沒收其財產。

我詫異保安處問得那麼潦草，一點也不重視我的案件似的。事實上是如此。我在保安處十多天後被單獨地送到保密局，那裡才是正式要訊問我的地方。

## 保密局

接著我一個人被銬著手，坐上小卡車被送走。只行走幾分鐘光景至，總統府後面的一棟老舊鋼鐵水泥日式洋房，那就是國防部保密局，是國民黨最高情報機構軍統的大本營。一進大廳看到裡面隔著走廊排有兩列牢房，每一個牢房只有六個榻榻米大的面積。這裡在日治時代屬台灣軍司令部軍法局的看守所，故關人的設備齊全。牢門裝有厚厚的木板門，開有四方形的能送東西的小洞。牢房裡面關的人像被密封在裡面，看不到走廊。

我一到就被關進密密麻麻關有十多個人的房間，房裡面多人站著，我進去連坐的地方都沒有。裡面的十幾個人擁擠在坐也坐不下的地方勉強地豎著腳坐著。雖已是涼快的秋天，房裡卻是熱氣逼人。大家都穿著監方給的破爛不堪的藍色棉襖，個個沒有表情。在那裡，首次領教過牢房超級擁擠的滋味。這麼窄，關那麼多的人，怎麼忍得下去？但也要忍。日後被送到軍法處看守所才知道軍法處更擁擠，比起來保密局還是小巫見大巫，而在我十二年整個坐牢期間，幾乎都是在擁擠的環境渡過。

我一進去，大家照樣問東問西，因他們和社會隔絕有一段時間，我只敢輕描淡寫地講了一點，也告訴他們韓戰開打的消息。因我想他們的成份五花八門，說不定有政府派來臥底的。定神了後知道，所關的只有兩個台灣人，其餘都是外省人。台灣人中，一位為許燈炎，個子高高、文質彬彬的，是熱帶醫學研究所的醫務人員。他不願多講話，我只知他新婚不久，騎腳踏車上班的途中被抓來。一位為李凱

南，高雄縣人，彌陀國民小學教員。看起來草根性大，好像在農民工作上出過很大力。他是逃避國民黨的追緝在山上被抓的。他有一位名為李碩喈的哥哥，在二二八事件後因國民黨緝捕而逃到大陸（於一九九五年左右在大陸逝世）。我被關進去沒幾天，另有個名為王石頭台灣人被抓進來。他被逮捕時正在跑路且露宿在三峽大漢溪旁。

許燈炎整天擔憂著自己的命運，他當心自己很難逃出被殺厄運。王石頭一進來就非常達觀，他不幻想有出去的機會。李凱南也有心理準備，但他不甘心就這樣遭屠殺，始終想如何找機會脫逃。他向我打聽台北市下水道網的分佈情形。但慚愧，我沒有這種常識可供參考。他後來到軍法處再和我同被關在第十六房時，與當時關在那裡的台南案與于凱案等人一起策劃逃獄，但沒有成功。由他講話的架勢可看出，他和農民相處頗有一套。那三個台灣人後來都被槍斃掉。由他們講的案情，照當時國民黨亂殺人的行情來看，他們逃不掉—死是當然的。

後來我被調離南所，經過北所後到軍法處時又遇到了李凱南。我離開保密局經過軍法處再到內湖、綠島新生訓導處、軍人監獄等，但我始終沒有再遇到許燈炎與王石頭，也打聽不到他們的消息。我擔心一定是凶多吉少。一九九三年六張犁發現兩百多位當時被殺的一部份人的墳墓時，我終於證實我心底的擔心，他們果然遭殘殺。許燈炎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和台南案的徐國維一起被處死。當時和許燈炎同樣服務於熱帶醫學研究所被抓的，據我所知，還有謝湧鏡與葉耀瑞，前者被殺，後者後來和我在同一個判決書上，同樣被判十二年徒刑，一起在綠島的三隊。至於王石頭，則除了知道他已死外，其餘一概不知。幾十年後才知道他和後來在綠島同過隊的王阿青是同鄉，王知道他的家屬。

至於同房許多外省籍的，他們牽涉到的案情與後來的命運則不得而知。因為那時彼此素不相識，在那種恐怖環境也不敢無所保留地談，且已是離今半世紀以前的事，記憶已模糊，故除非後來在軍法處、監獄等處有機會碰到外，也就不清楚其後情形。但現在回憶起來，其中很多人好像曾屬於孫立人的新一軍。我推想其中很多後來沒有活下來，一般說保密局進得來出不去。

我們白天關在裡面，定時地放出去小便。我和大家在一起，在獄吏眼睛睜睜注視之下要小便，覺得非常不習慣而常解不出來。早上天還沒亮就吹哨子起床，大家在院子，在很短時間內都要把臉洗好、解好大便等，感覺壓力很大，大便都解不出來，老鬧便秘。我一到院子總向故鄉木柵的方向默禱。王石頭看到我很詫異，他對我說我應是無神論者，不會有遙拜什麼的舉動才是。我佩服王是徹頭徹尾的唯物主義者，是真正的共產黨員。

我在保密局本部的南所十幾天間竟始終沒有被訊問就被送走。這一次被一起送走的有二十來個之多。我們由延平南路往延平北路走，一直走到台北橋附近，被送進一家看來是一個工廠裡面。那裡原來是名為高砂鐵工廠的鐵工廠，臨時被做為關政治犯以拷打調查的地方。聽說其產權屬於辜振甫兄弟的太太辜顏碧霞的。她因資助也參加中共組織而在鹿窟基地被毒蛇咬死的社會主義文學家呂赫若，才被處了徒刑，並被沒收包括該鐵工廠的財產。於是該工廠被權充保密局關人的地方，俗稱保密局北所。相對於此，保密局本部被稱為南所或「延平南路」。

## 林從周

我對我的案情始終覺得在五里霧中，很想找機會找林從周談，但始終找不到適當時間。湊巧我倆都在甲班上課，利用上課互相談話不

愧為最好的機會。他平常沈默寡言，很少主動地找話題講。看他這樣，我也就很難開口問這個或問那個。

我很想和他深談被捕以前還在外面的事情，甚至於關於他被捕後招出我參加組織的詳情。因我還沒被捕以前，我是被禁止發問種種事情的，他絕對地向我保證即使組織發生問題也不會連累到我。但實際證明組織不堪一擊。他一出事，我隨則被捕。好在我被捕前眼看王明德導致組織的大破壞，致我對組織生出提防心，我認為我在明處，組織在暗處。我在不知受暗處的什麼人指揮與監督的情況下，我不敢完全地相信，故我的言行不能不有些保留，林所吩咐的事情，譬如要我多介紹人給他認識，進而加以吸收進組織，儘予敷衍，不敢放心去做。不然這一次組織由上而下瓦解，我的案情就會很嚴重，我將無法保住生命。現在看來，我當時沒有全盤地相信他們是對的。我和組織的關係上我只知道他與高懷國。至於其他人我都不知道。我被捕前沒有多久因曾群芳來找我，才知道他和組織有關係，被捕後才再知道陳廷裕也有關係，如我所猜，與鄭文峰果然也有關係。我本想問他更多，但一方面看到他沈默寡言，一方面看到他似有所顧忌，也就沒有問他，內心的疑問繼續成為疑問。

他似以供出我為苦，他說訊問他的人在其眼前擺了一張組織系統表說他上面的人供出他下面還有一個人。他被追問那是誰，於是他不能不供出一個人以做交代。他只好供出關係最單純的我。於是他知道必定會去逮捕我，故他從看守所中曾寄語「要陳長去養病」，暗示要我逃難。陳長指我，因我身長高的關係，去養病暗示要我逃難的意思。但我沒有接到此寄語。我告訴他，我曾被訊問和曾群芳與陳廷裕的關係，我當然否定。實際上我和他們沒有組織上的關係，但我沒有告訴他，他被捕之後曾群芳曾找過我一事。

我暗地裡對他供出我很不滿意，他對我都不提過去的事，而我很多地方都被蒙在鼓裡。過去然，現在仍然。他與曾群芳、陳廷裕關係怎樣，他與鄭文峰又怎樣，與他人又怎樣，他都不告訴我。當然本案件還不算真正地了結，若有新的事，隨時都會被調問，不僅會導致自身的加罪甚至被處死，也會連累別人。他不能把一切都攤開來。

我雖想知道案件上的人與人的關係，其實更想知道的是像在綠島的環境下，人與人應如何相處，對於當局的奴化教育與強制勞動應如何對應，而且中共就要攻來，到時國民黨會不會把我們機關槍點名，因此我們平常要如何提防等等的他的看法。那正是當時我最關心的幾個問題。他都不曾表示他的看法。我心底想，他怎麼對一切都變得如此消極而有些不滿。老實說，我那時比較偏激且杞人憂天，故覺得他太沒有責任感。現在回想起來他還是比較穩重，不做不負責任的行動與發言。

### 我新認識彭溫蕃、葉雪淳、黃雨霆

和林談話中，我發現他相當關心他被捕之前在社會上認識而現在一起關在綠島的彭溫蕃、葉雪淳、黃雨霆三個人。彭溫蕃，竹東人，是我和林在台大法學院專修科的後輩，林被捕前就認識他。葉雪淳，竹南人，台大地質系的學生。葉因和曾群芳同是竹南人，推想林因曾的關係被捕前就認識葉。黃雨霆是台北縣三重人，是林的台北二中同班同學，是這次事件被槍斃的黃雨生的弟弟。黃一經林介紹我就認出我是萬華老松公學高等科一年級時的同學。但我竟不記得當時的同學裡面有黃！讀高等科一年，為的是重考中學校，那時我住在木柵，要由木柵先騎腳踏車到景美，然後坐上新店線火車遙遠地到萬華讀書。為此一大早就花了很多時間才到學校。一放學又須趕快到萬華站坐火車回到景美，然後到木柵，在學校間又

被級任老師強灌書本，幾乎都沒有精神去關心同班有何人，我竟不記得在一起一年的同班同學黃！

### 曾群芳的哥哥營救他成功

曾群芳與陳廷裕於一九五〇年案件爆發後曾經一塊跑路。後來走投無路出來自首，一時相安無事，卻後來於一九五四年間因為別人的自首，牽連出他以前的案情而被認為自首不清，兩人雙雙被請到軍法處收押。這是相當危險的事，請他們去軍法處當然有嚴厲辦理他們的意圖。曾的哥哥曾培芳四方找尋營救的門路，一開始十分絕望，後來天無絕人之路，找到在學時當台大法學院訓導室主任，後來當大法官的蔡章麟先生。蔡乃提供其兄去找某先生（洪福增），告訴他是蔡叫他去的。如此一切順利，不日，曾、陳兩位沒事而被釋放回來，真九死一生。這件盛舉不牽涉關說問題，因沒有人花到任何金錢，大家都是憑良知做的。曾事後對於營救他的洪先生連道謝都未曾做過。這若在一九五〇、五一、五二年時，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 我慶幸活著出獄

我幸而無事地坐牢到期滿而出獄。但出獄後一直受政府的監控與百般限制，謀生不易。這期間，當局的迫害不亞於坐牢期間，實是白色恐怖迫害的延續。我真有小牢換大牢的感覺，整個台灣對我來說仍是一個大監獄，我們隨時有被國民黨抓回的威脅。事實上，我們出獄者發生幾件再被抓的事件，更有甚者，發生陳明忠事件，致使多人再被處重刑。

我當初認為，不是國民黨垮就是我們被殺死，我們就和他們做時間賽跑。沒有料到，我能活著出獄，國民黨仍不垮，出獄後仍是白色恐怖的延續。我們仍在它的鐵蹄下，它再不垮我們將永遠在它鐵蹄下，至死不能翻

身。從一個角度看他們贏了，他們不僅沒有垮，且還屹立著，但另一個角度看，我們贏了，能夠活著出獄而它的生態卻有了大變化，威權過去，政治隨著有了某種程度的正義化。它在現今社會雖憑其累積的政治能量與財力興風作浪，把台灣搞得烏煙瘴氣，但幾乎已由政治舞台銷聲匿跡。

一個人的命運真是偶然的累積，生死只是一紙之隔。我坐牢期間不知幾次和死神擦身而過，但總能脫險。

我案情雖單純，但存有小細節，任何其中的一小細節暴露，就會成我的索命符。顏姓竹南中學老師被抓，逃出警察所後，經我的朋友曾先生帶至我處，由我找摯友陳某藏匿他。這件事不可避免地必須有一個解決，有可能其中任何一個人先被抓另一個後被抓，或者兩個人一齊被抓，也可能兩個人一齊或個別地出來自首，那時應不可避免地會牽涉到我。曾某與顏某後來相繼地自首，但都不曾言及到我，因此也沒有火燒到陳某。那時我在坐牢，我不知他們何時會被抓或自首，故此不時引起我內心焦慮。

當王明德惹起《光明報》事件，招致組織廣泛被破壞，我為了幫鄭文峰避風頭，向黃校長介紹他到烏來裡面福山的山地小學任教。鄭被捕後，雖沒有講出我，卻輕描淡寫地講出他有建立基地的意圖。當時鄭若說是由我介紹，我的情形就會很嚴重。他被槍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沒有浮出檯面。幾十年後已解嚴，我和黃校長見面，提及鄭到山地學校任教的往事，發現他已把鄭的事忘得一乾二淨。

我活過來的過程就是我最好的人生，若人一死，有多高地位有多大財富又有何用？我們受難者有許多相同的想法。家住基隆陳金全有一次請多位難友到基隆說要「慶生會」。我自然地想就是要慶祝生日，卻是要慶祝大家尚活著的寶貴生存，慶祝大家尚生存的會，名曰

「慶生會」。

## 被遺忘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歷史， 「白色恐怖清鄉期」

國民黨藉長期戒嚴，使用國家暴力施壓、虐殺、監禁無數不苟同其政權統治的人民的一段歷史，是集反人權、反人道、反法律的大成，是見不得天日的白色恐怖時代。本來政府一直把這一段歷史真相隱瞞著不公開，史學家也視為禁忌不敢窺探或探討，以免惹禍於身。直至台灣解嚴，威權時代過去，史學家始嘗試究明此段歷史。政黨輪替後，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也相當重視這一段歷史。

然而學者也好，政府也好，講起白色恐怖時代，眼中只看到美麗島事件那一段時期，而每次提到國民黨在台灣迫害反對份子時，總講「二二八事件與接著的美麗島事……」。二二八事件與美麗島事件中間隔著三十年間，中間的這一段時間完全被遺忘或忽視掉。因此身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的我們，特別是這一段被遺忘或被忽視時代的我們提及白色恐怖時，總不忘加上「五〇年代」，以和美麗島事件以後的那一段區別並喚起大家的正視。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代的特點是，那一段時期處於反國民黨初期，台灣沒有統獨的區分，換句話說，台獨的思想與主張還沒有盛行，反蔣的思維是大家共同的思維。台灣是被包括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之內，只有國民黨與大陸的中國共產黨，故反蔣不能忽視中共，則自然和中共站在同一戰線，與中共為伍。反蔣就是為鄉土，為人民，為國家，為人權，而當時的受難者就是為了愛國愛民的大愛，走在時代的最先鋒的社會精英。直至美麗島事件時期，台灣人民已漸融入於國際社會，本土意識抬頭，才開始有獨立的訴求。另一方面，中共在大陸革命成功後有許多問題仍待克服，台灣人民認同反共體制，致使受五〇年代社會現況規



定而犧牲的受難者反被輕視乃至被遺忘，這是不公平的。那時代有它的時代背景，且不管那時代的背景如何，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佔有三十年長的歷史，被殺者數以千計，被關者數以萬計，不可被忽視與遺忘。

自從解嚴後，白色恐怖那一段歷史忽被重視，史學學者紛紛訪問當時倖免於被殺但經過長期牢獄之災的已年邁的受難者，進行口述歷史。我們過去主要有兩次接受口述歷史的機會，一次為前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所做的，一次為中央研究院所做的。本來我對口述歷史不重視，想來都是千篇一律地敘述與控訴政府當時對待我們的不人道與個人的離奇遭遇，很少觸及政府罪惡的本質，且也無法真正地呈現歷史的全貌。我並且認為，接受口述歷史訪問對受難者的平反與呈現歷史的真貌很少有裨益，加之我的遭遇很平常，沒有英雄事蹟可言。若口述歷史是為滿足採訪者的好奇與口述者個人的知名度，我接受訪問的興趣一向缺缺，因而沒有接受訪問。

然而，由於我們當中部分人特別努力的結果，〈補償條例〉立法通過後，我發現口述歷史對我們的平反某些部份是有利的，會幫助〈補償條例〉發揮一定的功效，給予對於白色恐怖事件不大有概念的相關人員或多或少有利的影響。〈補償條例〉雖附帶有排除條款，而我們很擔心該條款對我們有不小殺傷力。條例通過後，政權隨著移轉，排除條款幾乎成為具文，大多數人可拿到補償金。一些人拿到補償金後，對於口述歷史比較沒有以前的顧忌。但有些人以為拿到補償金就是平反的完成。事實上那是兩回事，我們應祈求真正的平反。可

是，大多數政治犯都瀕臨於行將就木的年齡，對是否能真正得到平反已心有餘而力不足，不大重視。

我本認為，對白色恐怖這段歷史，台灣史家總有一定的認識，不待我置喙。但我寒心地發現，我聽到的學者與政府官員對此的詮釋是那麼地昧於史實，並不亞於刻意加以隱瞞或曲解的先前統治主流的國民黨，故以前對口述歷史興趣缺缺的我改變心意，願自動接受口述歷史，並把我所寫的《回憶》披露於世。因為我覺得有充分責任盡我所能地呈現歷史真貌，匡正歷史詮釋。況且當時的受害者都已年邁，餘生無幾。隨著他們的凋謝，史實若沒有存留，將隨著消失，對於台灣將是很大的損失。

構成白色恐怖歷史前期的長至三十年以上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歷史，似被學者與政府忽視或遺忘。歷史不容忽視或遺忘，望此能改正社會視聽。

白色恐怖歷史至今尚無受到應有的重視與應有的定位與定論，如果一般人認為當對於政治犯的迫害是合法的與正當則已，若不然，牽涉到不法不人道不道德與責任問題，應弄清其是非與責任的歸屬。弄清責任不一定為要報復，我們可寬恕錯誤，但一個民族或國家不能沒有是非、責任與反省觀念，更不能含糊泥地使其不了了之，而一再地重現同樣的悲劇。這是有待台灣的居民反省與努力的課題。

我提醒學者與政府官員正視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代，給其應有的定位、應有的重視，並應給予適當的名詞，我提議命其名為「白色恐怖清鄉期」或稱「白色恐怖前期」。◎

摘錄自：作者手稿《回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見證》

本刊創刊後承蒙各界捐款贊助，謹申深摯的謝忱。

## 感受你熾熱的心

鍾先生 7000元 / 陳映真先生 5000元 / 阮桃園教授 5000元 / 董娟娟教授 5000元

# 《弱勢群體之聲》 第一集

共  
24  
首

浪淘沙

## 父親的腎，小東的大學

刀。人有刀  
我有頭，有肉，有內臟  
屠宰或割開一個想不通的念頭  
小東，這個黔南山區的青年  
就這樣讀了大學

科教興國，小東的父親  
這位掃盲班的中國農民  
操刀而起，千辛萬苦  
不能白費啊，小東的父親  
年收入只有七百元的農民  
衝進了城裡的大醫院

把腎交給有刀者吧  
小東，從刀口下變現了  
鮮血濕透的  
學費、路費  
和一件城裡地攤的新衣服

「娃兒，你要好好讀書哇  
我們死也不能再做魚肉呀！」  
小東，在日記裡默寫了  
千遍的父親的血淚  
寂然無聲地  
淹沒了中國的頭頂

同學們只發現  
小東不會電腦、沒有手機  
還不認識避孕套  
是個冬天不換衣服的貧困生

第二學期，貧困生小東  
找到了一份搬運垃圾的  
鐘點工  
從此，兩朵黑色的向日葵  
小東再也不能結痂的眼神  
開滿校園骯髒的垃圾桶

《新二二八史像》 編著◎曾健民 / 定價NT350

80篇歷史證書

首次大量出土新史料；事件當時大陸、香港報刊雜誌上的二二八評論、報導，以及詩、小說、創作

有初次公開的第一手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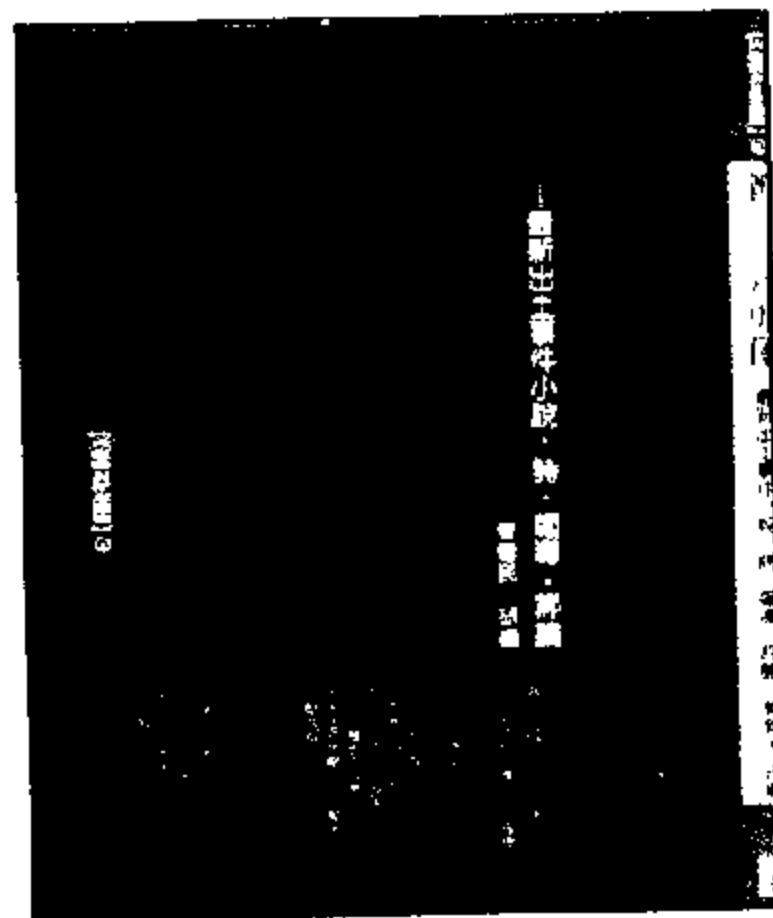
二二八女鬥士謝雪紅《告同胞書》

名記者范泉《記台灣的憤怒》

文匯報記者董明德《孤島一月記》

蘇新的《台灣的前途》

名作家郭沫若的《還要警惕著不流血的二二八！》



《天黑黑嘜落雨》◎詹朝立 / 定價NT350

——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傳真

「1123·與農共生」大遊行總指揮詹朝立親筆力作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推薦：

「這本著作，所記述的不只是一次大遊行的因果經緯而已，更是當今台灣農漁民和農漁會艱苦情況的紀實報告，充滿了理解與悲憫的抗議情懷。」



《走進台灣》◎周良沛 / 定價NT300

——光和影的心靈紀實

作者周良沛是一位大陸資深的進步作家，且在台灣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本書超越了兩岸的歷史糾葛和現實迷障，以更廣闊的視野和深刻的感情，用獨特的紀實散文風格，描寫了台灣生活底層中許多不知名的或知名的人和事。藝術地概括了九〇年代前後台灣複雜的社會變動中的光和影，有鮮明的時代感。



直接訂購 優待

郵政劃撥 / 19747069

■電話 / (02)87714051    ■傳真 / (02)87713801    ■電郵 / tssra@sinamail.com  
■地址 /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8巷2號2F

# 人間 台灣政治經濟叢刊

## 台灣戰後資本主義論 / 台灣社會性質論名著

□涂照彥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四八〇元

從日帝獨佔資本與以地主、佃農制為主軸的本地資本間之矛盾，解明殖民地台灣經濟形成的過程與本質……

□劉進慶

《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三五〇元

從「公業」、「私業」雙重構造，官商資本的支配，對美日經濟的附從化剖析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六五）的性質與構造……

□段承璞

《台灣戰後經濟》三五〇元

探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八五）中官僚資本、集團企業資本、僑資、外資、中小企業資本，分析台灣外貿與產業構造的變貌……

□谷浦孝雄

《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二五〇元

以六〇年代後高度成長的構造為焦點，解明做為美、日中心國家加工基地而發展的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之結構……

□陳玉璽

《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二四〇元

分析深層結構轉化及帝國主義體系功能變遷，以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之機序，並批判地探討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相應性……

□隅谷三喜男 / 涂照彥 / 劉進慶

《台灣之經濟》三六〇元

刻劃台灣「獨裁下的成長」和民間經濟向海外擴張的勢頭，從農業、工業、勞動、金融財政、貿易和經濟體質，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實相……

□Winekler等編

《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三八〇元

以西方當代保守派的、自由派的和激進派的社會發展理論，分析台灣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結構，並交互進行各派分析之分析，檢視三派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研究上的貢獻和極限。著名社會學者，除編者外，R. E. Barret、T. Gold、D. F. Simon之台灣資本主義論的總匯，向台灣在地社會學界提出無從迴避的詰問……

■杜繼平

《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三八〇元

——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

台灣戰後世代第一個接受完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育的學者杜繼平，在科學對待當前大陸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上，闡明當前台灣左翼應以克服民族在外力干涉下的分裂構造，追求祖國統一，並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揭發台獨運動的本質，批判即中「左」派陳芳明知識上的荒疏，振臂呼喊「做一個理直氣壯的統一派」……

/ 本書要目 /

1. 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台獨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2.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3.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  
——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
4. 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5. 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

凡 可享有以上書籍 優惠，郵撥時  
請填上訂戶編號。若須 則加收

出版社

郵撥帳號：一一七四六四七三 / 電話（〇二）二三二二二三五七